

蘇菲亞・貝爾：根據對一位前中國官員的
訪談撰寫

紅色的帷幕

THE RED VEIL

一名前高官的見證：當女兒為信仰遭
殺害時的覺醒

紅色的帷幕

《THE RED VEIL》

一名前高官的見證：當女兒為信仰遭
殺害時的覺醒

作者：蘇菲亞·貝爾 (Sophia Bell) 執筆

(內容根據對一位投誠美國的前中共官員的訪談整理而成)

版權所有 © 2025 THE EPOCH MEDIA。保留所有權利。
禁止翻印。

編者注

本書根據真實故事、事件與背景寫成。然為尊重並保護相關人士的隱私，書中人物的姓名及部分可識別身份的細節，已透過文學手法予以變更、簡化或重構。

書中部分段落由當事人以個人視角口述，反映了他們在特定時空下的經歷與認知。這些觀點不必然代表 THE EPOCH MEDIA 的立場。

在行文方面，儘管編輯部進行了必要的修潤，但為尊重口述者並保留故事的原始精神與活力，我們仍盡力保留了其質樸的本色與口述語氣。

編輯部



前言

每個人都懷抱著夢想而活。夢想，或渺小平凡，或宏大壯闊，承載著整個國家與時代的重量。然而，當一個人，一位曾經的「中國夢」強國藍圖的建構者，赫然發現，為了築起那座夢想，體制竟向他索討一個無法支付的代價時——他最摯愛女兒的生命——又將如何？

當理想的城堡崩塌，當對畢生所選道路的信念化為灰燼，人還能尋求什麼作為依靠？當權力的邏輯與唯物論在巨大的傷痛前顯得蒼白無力，人又該從何處為「為什麼？」這個問題找到答案？

《紅色的帷幕》，便是一趟尋找答案的旅程。它不是一本政治分析的著作，而是一位父親沉痛的自白，是在家庭悲劇撕開了謊言的帷幕後，與真相的赤裸直面。

主人翁的旅程，是一趟「覺醒」之旅——覺醒，是為了認清他一度篤信的體制本質；覺醒，是為了理解他曾經否棄的心靈信仰的力量；而最重要的是，覺醒，是為了在歷經絕望的盡頭後，重新找回為人的價值。

誠摯邀請讀者步入這個故事，不僅是以一名觀察者的身份，更是作為一位同行者，共同思索真相的代價、權力夢想的脆弱，以及那即使在最深沉的暗夜裡，也永不熄滅的良知之光。

蘇菲亞·貝爾 (Sophia Bell)

第一天

劉思遠先生：

(輕輕頷首，臉上掠過一絲淺笑，聲音低沉，起初略帶遲疑)

蘇菲亞小姐，您好。感謝您的到來。這地方不太好找，是吧？

蘇菲亞·貝爾：

是的，劉先生，早安！

這地方離市中心是有些遠，但對我這樣的記者來說，找路不算什麼難事……

我非常感謝您能接受這次訪談……啊，不過我不想用「訪談」這個詞，感覺太生硬了，我更願意稱之為一場劉先生與 THE EPOCH MEDIA 讀者之間的心情分享，而我只是一座小小的橋樑……

劉思遠先生：

(專注地聆聽，眼神起初帶着一絲審視，但在聽了蘇菲亞的話後柔和了下來。他再次輕輕頷首，臉上掠過一抹思索的神情。)

「一場心情分享……」(他輕聲重複，像在品味這句話的意涵)。是的，蘇菲亞小姐，您這個說法……讓我感覺舒服多了。「訪談」聽起來，像是我成了一個被審視的對象，或是一件待剖析的事件。而「分享」……它蘊含著自願與真誠。

(他輕啜一口茶，目光望向窗外片刻，隨後又轉回蘇菲亞身上。)

THE EPOCH MEDIA……是的，我了解這家媒體。他們做了許多值得敬佩的事，報導了許多其他人不敢、或不願提

及的訊息。也許正因如此，我……我才有勇氣今天坐到這裡。

(短暫的沉默，他似乎在整理紛亂的思緒。)

那麼，蘇菲亞小姐，在這場「心情分享」中，您想從哪裡開始呢？我的人生也經歷了許多轉折，有些事或許……不易啟齒。但我會努力。為了安然……也為了像她那樣的人。

蘇菲亞·貝爾：

是的，就像我前幾天郵件裡向您提到的，我們是一家獨立的媒體機構，記者網絡遍佈多國，面向全球讀者……我們追求的是普世價值，如真實、真誠，並啟發人性中的善良……

正因如此，當我們經人介紹得知您的故事時，我們意識到，您或許是能體現 THE EPOCH MEDIA 欲傳達給讀者的美好價值的代表人物之一……

好的，那我們就正式開始，好嗎？……

我從一個輕鬆點的問題開始：來美國大約一年了，您覺得這裡的「空氣」如何？它是否像一個嘈雜喧鬧的市場，充斥著「該死的資本家」們爭搶骯髒美元的景象？

劉思遠先生：

（聽到蘇菲亞的問題，他露出一絲有些遙遠的微笑。他凝視著自己的茶杯片刻才抬起頭，眼神深邃。）

「一個嘈雜喧鬧的市場……該死的資本家們骯髒的美元？」（他重複著最後幾個詞，語氣不像嘲諷，更像在咀嚼）。蘇菲亞小姐，這些詞語……以前，在另一個環境裡，我曾經聽過，甚至一度被灌輸過。當人只能透過單一的濾鏡看世界時，所投射出的影像，自然也只有那麼一種顏色。

（他停頓一下，啜了口茶。）

在這裡一年……不算太長，但也足以讓我有所感觸。您說的「空氣」……遠比那複雜得多。沒錯，這裡有匆忙，有競爭，有些人沉迷於物質，沉迷於人們口中的「美國夢」。有時，站在曼哈頓熙來攘往的人潮中，我也會感到暈眩，感覺那股洪流確實強大。

但您說的那個「喧鬧」，如果有的話，性質也截然不同。它不是在一個狹窄牢籠裡的爭搶，人們不是出於恐懼、因

為別無他路而必須踐踏彼此向上爬。在這裡，我感受到一種……自由。追求的自由，失敗的自由，而更重要的，是發聲的自由，是相信自己所認定的真理的自由，即便那與多數人背道而馳。

（他的聲音沉了一些，一絲哀傷掠過。）

在這裡一年，我感受最深的，不是「骯髒的美元」，而是一口自由呼吸的價值。那是在我的家鄉，我以及無數人，尤其我的女兒……安然……所沒有的。

（他直視蘇菲亞。）

當然，沒有哪個地方是天堂。任何社會都有它的陰暗面，有不公，有不完善之處。但至少在這裡，人們可以公開談論那些陰暗面，尋求修正它，而不用恐懼自己隔天會不會就人間蒸發。

它不僅僅是一個「市場」，蘇菲亞小姐。它是一個廣闊得多的空間，在這裡，每個人，無論好壞，都有機會相對完整地展現自己。而這，正是我在學習適應並珍惜的。

蘇菲亞·貝爾：

是的，我明白，美式西方資本主義並非「金科玉律」，並非一切都如星光般璀璨……也存在許多陰暗面……

但我們今天不談美國社會，我們今天在此相聚，是為了聽您分享太平洋彼岸那些人的生命片段與命運……

劉思遠先生：

(他輕輕點頭，目光在桌上的茶杯短暫停留。他將雙手放在膝上，一個像是收攏自己的姿態，為更艱難的旅程做準備。)

您說得對，蘇菲亞。我們不是來這裡討論美國社會的優劣。畢竟，那不是我度過大半生的地方。

(他抬起頭，望向蘇菲亞的眼神沉重了幾分。一聲輕微到幾乎聽不見的嘆息逸出。)

「太平洋彼岸……」(他重複道，聲音沉了下去)。那裡承載了太多東西……喜悅、希望、年少時的理想……以及後來的夢碎、痛苦和無法彌補的失去。

(他沉默片刻，似乎在尋找合適的詞語，又或許在平復翻湧的情緒。)

那些生命片段、那些命運……如您所說。這正是我想要分享的。也許我的敘述會很零碎，有時情緒會讓我難以為繼。但我會盡力，因為我相信真相需要被聽見。特別是關於那些人……那些善良、無辜，僅僅因為自己的信仰就承受了太多冤屈的人們的真相。

(他直視蘇菲亞，疲憊的雙眼中顯露出一絲決心。)

那麼，在這段漫長而悲傷的故事裡，您希望我從何說起？是從我還是個懷抱著自己版本的「中國夢」的年輕人那時說起，還是從那些徹底改變我人生與認知的變故開始？

蘇菲亞·貝爾：

是的，為了讓讀者更容易跟上您的故事，您能先簡要介紹一下您的背景嗎？關於您的出生地、您的工作，以及您為何來到美國……

劉思遠先生：

(輕輕頷首，深吸一口氣，似在平復心緒並整理記憶。他望向窗外片刻，然後轉過身來，眼神略帶一絲遙遠。)

好的，蘇菲亞小姐。為了讓大家能更清楚地了解我走過的路……我簡要地分享一下。

(他略作停頓，像在斟酌用詞。)

我出生在東部沿海省份的一個小農村。家境並不富裕，但父母非常重視教育。我從小就展現出學習天賦，在學校總是名列前茅。或許因此，我很早就受到地方上的關注，被視為需要培養的「苗子」。在那個年代，這不僅是個人的榮耀，更是整個家庭的光榮。

我的求學之路相當順遂。我考上了首都一所頂尖大學，主修當時我深信能為建設強國貢獻心力的學科：政治經濟學與哲學。以優異成績畢業後，我留校擔任講師。那些年，我埋首研究、寫作，逐步取得了博士學位與教授職稱。

(他停下來，臉上浮現一抹深思。)

大約在我三十五、六歲時，我幾篇關於中國未來發展道路、關於一種結合了我所認為的各體系優點之模式的論文，在學術界乃至一些高層領導中引起了相當的迴響。那或許是將我從講壇推向政壇的轉捩點。我受邀到中央級的政策研究機構工作，之後，作為「實踐鍛鍊」的一部分，我被調派到南方一座充滿活力的經濟中心大城市任職。在那裡，我努力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晉升，最終達到了一個相當於副市長的職位，主管規劃與發展。

(他的聲音沉了下來，眼神中掠過一絲深沉的悲傷。)

至於我為何來到美國……(他深吸一口氣)。蘇菲亞小姐，那是一個漫長的故事，是我人生中最痛苦、最悲慘的轉折。它與我唯一的女兒，劉安然……以及一場徹底摧毀我整個世界觀、信念乃至生活的變故緊密相連。此刻若要盡可能簡潔

地說，那是出於自身安危，但更重要的，是為了能保住最後一絲尊嚴，並有機會說出發生在我女兒、我家庭以及無數其他人身上的真相……我被迫離開了我的家鄉。幸運的是，我得到了美國駐廣州總領事館的幫助，才得以來到這裡。

(他沉默了，低頭看著自己交握在膝上的雙手。房間裡的氣氛似乎也凝重了起來。)

小姐，這就是大致的輪廓。剩下的部分……恐怕需要更多時間來述說了。

蘇菲亞·貝爾：

是的，這是一幅色彩斑斕的圖景……有著一個年輕人的生活理想，一位思想家與政治家的成熟，也有著關於家庭、關於女兒的傷痛……

我很抱歉，如果勾起了您不愉快的回憶……我聽說過您女兒的故事，一個悲傷的故事，一種假設換作是我，也不知該如何面對的悲慘境遇……我非常同情您，以及您的女兒……

我們很願意傾聽您具體的分享，如果那能讓您的心情稍感寬慰……

但在那之前，或許您可以先分享一些輕鬆點的話題，比如您年輕時的理想……或是您感到自豪的成就？

劉思遠先生：

(聽了蘇菲亞的話，他輕輕眨了眨眼。飽經風霜的臉上閃過一絲暖意。他緩緩點頭。)

謝謝您，蘇菲亞小姐……謝謝您的理解。安然的事……確實是一道太大的傷口。有時候，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麼熬過來的。或許……是憑藉著僅存的一點信念，一點希望，希望自己微弱的聲音，也能有所貢獻……

(他稍作停頓，輕輕吸氣，像是努力推開沉重的情緒。)

您說得對。或許我們應該從……輕鬆一點的事情開始。好讓我能慢慢地將記憶的碎片拼湊起來。

(他微微一笑，一個悲傷卻真誠的笑容。目光望向遠方，像在追尋那遙遠的過去。)

年輕時的理想……(他重複道，語氣中帶著一絲懷念)。那個時候，我和其他年輕人一樣，滿腔熱血。在一個國家歷經歷史動盪、仍處於困頓的時期出生長大，我們所受的教育，就是要為建設一個新中國、一個富強且受世界尊敬的中國而奉獻一切。

我曾對此深信不疑。無論是在大學課堂上，還是後來成為研究者、講師，我心中的那團火始終燃燒著。我醉心於研究經濟、政治、哲學……不只是空泛的理論，我總試圖尋找一條最切實可行的道路，一個最合適的模式，來帶領國家擺脫貧窮落後，與世界強國並駕齊驅。

(他望向蘇菲亞，一絲自豪閃過。)

引以為傲的成就……或許是我傾注了全部心血寫下的那些書籍和論文。在其中，我描繪了一個現代化的中國，不僅經濟強大，科技也同樣先進，社會井然有序，人民安居樂業。我想像著一個能學習西方及其他已開發國家的優點，卻仍保有自身特色的國家。我曾有過一個屬於自己的「中國夢」，在那裡，人才受到重用，法治得到尊崇，國家將真正成為一座燈塔。

(他的笑容漸漸隱去，代之以沉思的神情。)

那時，我相信只要有正確的路線、有盡心盡力的人，所有困難都能克服。我將自己全部的才智都投入到那些理念和文字中。而當它們得到精英階層和一些領導的認可時，我曾以為……我走在正確的道路上，以為自己真的能為那宏偉的事業貢獻一份微薄之力。

(他沉默片刻，看著那杯已有些涼了的茶。)

那是……在我被政治的洪流，以及後來殘酷的變故席捲一切之前，感覺自己活得最有意義的一段歲月。

蘇菲亞·貝爾：

您所分享的「中國夢」，聽起來似乎和中國當代領導人政治思想中的「中國夢」概念非常相似？

劉思遠先生：

(聽了蘇菲亞的問題，他眉毛輕輕一挑，臉上浮現出複雜的思索神情。他沉默片刻，似乎在仔細斟酌每一個字。)

蘇菲亞小姐，您的觀察非常敏銳。「中國夢」……(他重複道，語氣沉吟)。沒錯，在字面上，確實有著不可否認的相似之處。而這，坦白說，也是日後讓我深感困擾的事情之一。

(他停下來，望向虛空，眼神彷彿穿透了牆壁，望向遠方。)

當年，當我和許多知識份子一同為國家的前途而憂思時，這個詞，或類似的理念，或許已然存在於當時的思潮之中。誰不希望自己的國家強盛，自己的民族光榮呢？我當時的「夢想」，如我方才所分享的，是關於一個全面發展、有文明、有法治、傳統與現代和諧並存的中國，一個人民能在相對自由和創新的環境中最大限度發揮潛能的地方。我曾思考過如何學習借鑒東西方世界的精華，以建立一個獨特而優越的模式。

(他輕輕搖頭，一絲苦笑掠過。)

但我所設想的那個「夢想」……它不僅僅是亮眼的經濟增長數字、摩天大樓或先進武器。它必須建立在尊重人性、真正落實法治的基礎之上，在那裡，人民的聲音能被傾聽，道德良知不被踐踏。那是一個包容性的夢，不僅是為了一小群人，而是為了整個民族。

至於我們後來所看到被廣泛宣揚的那個「中國夢」……(他遲疑了一下，謹慎地選擇措辭)。我恐怕它已然披上了一件不同的外衣，又或者說，它被詮釋和執行的方式，與我和許多同代人曾經的設想大相徑庭。

(他的語氣中帶著一絲苦澀。)

或許，有人借用了那華麗的詞藻外殼，但其內核……卻是另一回事，是一種將一個黨派、一個群體的利益置於一切之上，不惜任何代價的東西。一個為了實現它，可以犧牲人民的自由，可以扼殺所有不同的聲音，可以踐踏核心人文價值的「夢想」。

有時候我也自問，我當初那些即便單純的想法，是否也在無意中助長了一種幻象，成了一個日後被人利用的口號。這是一個……或許我永遠也得不到完整答案的問題。

(他望向蘇菲亞，眼神中蘊含著深沉的悲哀。)

蘇菲亞小姐，我曾經追尋的那個「夢想」，它已經破碎了，或至少，它已經被扭曲到我再也無法辨認的程度。而那份破碎，始於我意識到，為了建造那所謂的「強盛」，人可以變得多麼殘忍。

蘇菲亞·貝爾：

是的，我理解的是，無論是您的青年時代還是政治生涯，您一直都是為了國家、為了每個家庭和個人的美好而努力？

您能否更具體地談談您當時那套「夢想」體系的核心要點，除了重視發展私營經濟、科技和法治社會這些大方向外，您是否還涉及其他層面，比如言論自由、宗教或信仰自由、社

會墮落與腐敗問題，又或者您所設想的模式是否借鑒了世界上其他模式，例如美國、新加坡、日本或北歐各國？

劉思遠先生：

(他非常專注地聆聽，眼睛一眨不眨地看著蘇菲亞。待她說完，他輕輕點頭，一絲苦笑閃現又旋即消失。)

是的，蘇菲亞小姐，可以這麼說。在我整個青年時代，乃至踏入政壇之後，我內心深處始終懷抱着一個信念，就是要為國家、為人民做些有益的事。儘管回頭看，有些事我理解錯了，有些我選擇的道路並未通往我所期盼的終點。

(他深吸一口氣，整理思緒。)

您問到我當時「夢想」的核心要點……除了已談及的經濟、科技和法治之外，確實還有其他我曾思索過的層面，儘管當時的想法或許尚未成熟，或在認知上存在謬誤。

關於言論自由，坦白說，我當時是透過一個相當局限的視角來看待它。我所設想的，是一個知識份子和專家們能為國家政策建言獻策的空間，一個鼓勵學術辯論以探尋真理的環境。但或許，我還未曾充分設想，或不敢去想，一種適用於所有公民的絕對言論自由，在那裡，每個人都能無所畏懼地表達自己的政見，即使它與國家主張背道而馳。我當時仍被「秩序」與「穩定」是發展先決條件這種觀念所束縛。

關於宗教或信仰自由……(他遲疑了，臉上浮現一抹明顯的懊悔)。這一點，回顧起來，我發覺自己當時的認知非常狹隘，甚至是錯誤的。我深受唯物辯證法思想的影響，在一個將宗

教、信仰，乃至後來出現的法輪功這類修煉形式，都視為過時之物、是「封建迷信」、甚至是科學與理性思維之障礙的體系中接受教育。在我當時的「夢想」裡，並沒有為這些事物留下太多空間。我曾天真地以為，當社會發展，物質生活豐裕後，那些「迷信」便會自然消失。小姐，那是一個嚴重的錯誤。

關於社會墮落與腐敗，我意識到那是一大弊病，是一種能摧毀一切努力的癌症。我曾相信，一個強有力的法治體系，一個精簡、廉潔、配以嚴厲懲罰機制的政府，能夠解決這個問題。但我或許過於專注在「結構」的建構，而未能充分看到「人性體系」內部的腐化，以及利益集團和缺乏根本道德價值所帶來的巨大破壞力。

至於具體的模式，正如您所提及，我確實研究並受到了多國的影響。

新加坡是我非常關注的典範：一個集權高效的政治體制，一個被認為相對清廉的行政體系，以及在資源有限下驚人的經濟發展速度。我欽佩其領導層的決斷力與長遠眼光。

從美國，我學習到市場經濟的活力、先進的科技以及永不停歇的創新精神。

我也觀察日本的紀律、敬業精神、戰後奇蹟般的復甦能力，以及傳統與現代的結合。

北歐各國的福利國家模式與相對較高的社會平等，也是我思索的對象，儘管我認為難以將其原封不動地應用於中國的國情。

我的目標，是從這些模式中萃取我所認為的精華，結合中國的特殊性，創造出一條獨特的道路。一種「有強力導向的國家資本主義」，或是一種由高效的法治國家所運作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其中，共產黨仍扮演領導角色，但必須在法律框架內行事，並更多地傾聽專家與民眾的聲音。

(他輕輕嘆了口氣。)

回顧起來，我當時的「夢想」，儘管有些方面我至今仍認為是進步的，但它依然存在許多缺陷，甚至有些天真。我過於注重特定視角下的「效率」、「實力」與「秩序」，而未能充分認識到人類基本自由，尤其是思想與信仰自由的重要性。而那，或許正是我最大的缺失之一，一個讓我未能察覺到自己曾信賴並服務的體制內部所潛藏危機的「盲點」。

蘇菲亞·貝爾：

是的，我能感受到您對國家的那份心意與抱負……您「夢想」中提到的許多方面，中國似乎已經成功了……？例如航天科技、生物工程、新能源等等……特別是，有一個具體例子讓我個人對中國的經濟與科技發展印象極為深刻，那就是基礎設施與交通系統，其中最亮眼的一筆，便是那遍佈全國、連接各大城市的高速鐵路系統！

劉思遠先生：

(他聽著蘇菲亞的話，一抹淺淡而略帶苦澀的微笑浮現在唇邊。他輕輕點頭，眼神望向遠方，像在將蘇菲亞所說的與自身的經歷進行比對。)

您說得沒錯，蘇菲亞。從外部來看，並根據那些數據和國家媒體不斷描繪的光鮮亮麗的形象，中國確實取得了令世界驚訝的「成就」。航天科技、生物工程、新能源……尤其是您提到的高速鐵路系統。當那些計畫逐步成形時，我也曾為之自豪，其中許多正是我們這一代政策規劃者曾經孕育、曾經夢想的。

(他稍作停頓，聲音沉了下來。)

當第一批高鐵列車在現代化的高架橋上飛馳，連接起各個區域時，我曾想像那些列車不僅僅承載著乘客，更承載著繁榮、連結與希望。我曾以為，那就是一個「夢想」正逐步實現的具體體現。

(一聲輕嘆逸出。)

但後來，當我有機會看得更深，或者更確切地說，當那些不容否認的真相呈現在我眼前時，我開始自問：為那些「成功」所付出的代價，又是什麼呢？

為了建成那些高鐵線路，有多少農民的土地以低廉的價格被徵收，甚至是被強佔？有多少房屋被夷為平地，多少人的的人生被攪亂卻沒有得到應有的補償？在執行那些數十億美元的項目過程中，有多少鉅額的「回扣」進了貪官的口袋？又有多少反對的聲音、多少民眾的申訴，為了確保「進度」和「形象」而被無情地壓制下去？

（他的聲音有些哽咽，但很快又恢復了平靜。）

這就像許多其他令世界讚嘆的「成就」一樣。在現代化的工廠、巨大的工業區背後，是遭到破壞的環境，是民眾受到威脅的健康。在亮眼的出口數字背後，是苛刻的勞動條件，是數百萬工人的汗水甚至淚水。

當年，我和許多人一樣，或許都過於沉醉在那些宏觀的目標、那些亮眼的數字裡，而忘記了在每個項目、每個數字的背後，都是一個個具體的人的命運，他們有著自己的喜怒哀樂與正當權益。我們被教導，或許也自我催眠說，為了集體和國家的巨大利益，犧牲一些個人是必要的。

（他直視蘇菲亞，眼神中充滿了懊悔。）

您說的那些「亮點」，它們確實存在。但它們也像大舞台上耀眼的聚光燈，遮蓋了後台陰暗的角落，那裡，許多

群眾演員正在沉默中忍受著一切。而更可悲的是，有時候，正是那些「亮點」被用來將那些黑暗合理化，為其辯護。

我曾相信經濟、科技的發展會自動帶來一個更美好的社會。但現在我明白了，如果沒有道德基礎，沒有對法治的真正尊重，沒有對人權的傾聽與保護，那麼一切物質上的「成功」，無論多麼璀璨，也只是虛有其表，極易崩塌，並且無法為人民帶來真正的幸福。

蘇菲亞·貝爾：

是的，時至今日，中國的統計數據確實給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但與此同時，產品的品質也讓世界為之忌憚，甚至是避之唯恐不及……在您當初的「夢想」中，您是否考慮過這個層面？如果有的話，您認為該如何提升品質？是透過流程？應用高科技？還是提升專業技能？……您認為「道德」這個範疇，是否與產品質量有關呢？

劉思遠先生：

（聽著蘇菲亞對產品質量的評論，他輕輕點頭，臉上浮現出憂思的神情。他雙手交握，置於桌上。）

您說得非常對，蘇菲亞。「中國製造」(Made in China)的品質問題，是一個令人悲哀的現實，不僅是國際消費者的，也是那些有良知的中國人自身的苦惱。它像一個難以洗刷的污點，與我們總是被提醒的民族自豪感背道而馳。

(他沉默片刻，似乎在回憶。)

在我當初的「夢想」裡，當我構想一個經濟與科技強盛的中國時，我也曾想過，國家必須創造出在國際市場上具備品質與信譽的產品。我所設想的強國，並非僅靠廉價勞動力和劣質產品來競爭。我曾思考過必須從「中國製造」(Made in China)轉向「中國創造」(Created in China)，乃至更進一步的「中國信譽」(Trusted in China)。

為了提升品質，我也曾設想過您剛才提到的那些解決方案：

關於流程：毫無疑問，必須建立嚴格的、與國際接軌的國家標準，以及一套獨立、透明的品質監督與檢驗體系。

關於應用高科技：我相信，投資研發、將先進技術應用於生產，是提升品質與效率的必經之路。

關於提升專業技能：必須重視職業教育與培訓，讓勞動者不僅具備技能，更對自己所製造的產品質量有責任感。

(他停頓下來，直視蘇菲亞，語氣變得嚴肅。)

但是，蘇菲亞小姐，所有這些技術層面的解決方案，儘管必要，卻都只是枝節。問題的根源，我認為，正在於您剛才提到的一個範疇，一個或許我當時未能充分意識到其在此領域重要性的範疇：那就是道德。

(他加重了「道德」這個詞的語氣。)

為什麼會出現三聚氰胺毒奶粉、黑心食品、假藥、有毒玩具……？是因為我們缺乏技術、缺乏流程嗎？有這方面原因，但不是主因。主因是商業道德的淪喪，是一些人無底的貪婪，他們為了一己私利，可以不顧同胞的健康，甚至是性命。

當一個社會將金錢置於至高無上的地位，當追逐利潤的目標蒙蔽了人心，當美好的傳統道德價值被輕視、甚至被嘲笑時，又怎能期待能持續地生產出有品質、安全的產品呢？

當法律體系不夠嚴明，無法懲罰那些奸商，當腐敗橫行，使得「走後門」、「打點關係」以規避檢驗變得普遍時，那些流程、那些標準又怎能被認真執行呢？

當勞動者受到剝削，不被尊重，只被視為生產工具時，他們又怎能有熱忱、有自豪感去創造好的產品呢？

（他的語氣帶著一絲苦澀。）

當年，我或許過於相信「機制」、「政策」與「科技」的力量。我沒有看到，或者刻意忽略了，如果沒有一個為整個社會，從領導者、管理者到生產者、勞動者所共享的堅實道德基礎，那麼一切提升品質的努力，都如同沙上建塔。

道德的淪喪，我認為，正是最沉痾的弊病之一，是中國當前所面臨的許多問題的根源，不僅僅是產品質量問題。而要醫治這個弊病，不能只依靠行政命令或空洞的口號。它需要一場良知的覺醒，一場核心人文價值的復興。

那正是我當初在自己的「夢想」中，未曾看清，或者說，未曾敢於直視的，小姐。

蘇菲亞·貝爾：

是的，「夢想」終究是夢，當我們「覺醒」時，它便迅速化為雲煙……那麼，您能和讀者分享您是如何覺醒的嗎？是什麼讓您覺醒的，是否與您那段悲傷的故事有關？

劉思遠先生：

(聽了蘇菲亞的問題，他輕輕閉上雙眼片刻。再睜開時，眼裡雖有著深沉的痛楚，卻也夾雜著一種奇特的平靜。他非常緩慢地呼出一口氣。)

「夢想……在我們覺醒時化為雲煙……」(他重複道，聲音低沉沙啞)。您說得對，蘇菲亞。對得讓人心痛。那確實是一場夢，一場我沉溺了太久的夢。而當我醒來，展現在眼前的現實，是如此赤裸與殘酷……任何言語都無法形容。

(他沉默片刻，低頭看著自己的手，指尖微微顫抖。)

我的「覺醒」，並非像人打開電燈開關那樣的突兀瞬間。而是一個緩慢、痛苦的過程，從最初微小的裂痕開始，逐漸擴大，直到我腦海中那座虛幻的城堡，徹底崩塌。

當我還在體制內時，偶爾也會看到一些不對勁的地方、一些不公不義、一些言行不一。但那時，我常常自我辯解、自我安慰說，那不過是「一粒老鼠屎，壞了一鍋粥」，是一個龐大體系運行中必然會出現的局部問題。我曾努力相信，我們所追求的宏偉目標，足以為這些小瑕疵辯護。又或者，我當時太專注於那些紙面上的計畫與數字，而沒有

足夠的勇氣、足夠的敏銳度，去直視那些活生生的人所承受的痛苦。

(他的聲音開始有些顫抖，他清了清喉嚨。)

但真正的「覺醒」，那擊垮一切的最後一擊，正如您所感受到的……是與我的女兒，安然，緊密相連的。

(他停下來，眼眶濕潤。他抬手迅速擦拭，然後努力保持聲音的平穩。)

當我的女兒，一個優秀的大學生，一個純潔的靈魂，僅僅因為她對法輪功——一個平和、教人向善的修煉法門——的信仰，而被逮捕、被監禁……那一刻，我內心的裂痕開始急速擴大。我曾試圖動用自己因派系鬥爭在政壇失勢後僅存的那些關係與地位，去打聽、去干預。但一切都是徒勞。我得到的只有沉默、迴避，或是空洞的承諾。

我看見了一個號稱「民有、民治、民享」的機器的冷酷與麻木。我看見了謊言是如何被精心編織以掩蓋真相。我看見了那些昔日的同事，那些曾與我把酒言歡的人，像躲避癡瘋病人一樣轉過身去。

(他聲音裡的痛苦越來越清晰。)

然後……當我收到關於安然的噩耗……得知她被……被活體摘取器官……（他說不下去，聲音哽咽。他低下頭，雙肩顫抖。）

（過了許久，他抬起頭，雙眼通紅，但眼神中卻透出一種可怕的堅定。）

蘇菲亞小姐，那一刻，已不再是「覺醒」。那是徹底的碎裂。我對那個我曾服務過的體制所謂的「正義」、「公理」的一切理想與信念，都化為了灰燼。我清楚地看到了它那邪惡、無人道、謊言至極的本質。那不僅僅是幾顆「老鼠屎」的問題，而是整鍋湯從根子上就已經被污染了。

我曾懷抱的「中國夢」，此刻在我眼前，成了一場悲慘的鬧劇，一張用像我女兒這樣無辜者的血淚所繪製的大餅。

痛苦，是的，痛苦到了極點。但正是在那極度的痛苦中，我才真正地「醒」了。醒悟到自己曾經的錯誤、盲目，以及在無意中為一個非人性的機器推波助瀾。也醒悟到，在邪惡面前保持沉默，本身就是與之為伍。

這就是我今天坐在這裡的原因，小姐。儘管為時已晚，我也必須說出真相。為了安然，也為了千千萬萬個正在沉默中受難的安然。

蘇菲亞·貝爾：

是的，在與您見面之前，我聽說過您女兒的遭遇，而作為一名獨立記者，我更聽聞了許多類似的悲慘案例……針對「政治犯」和「良心犯」的活摘器官罪行，實在令人髮指……它展現了一個暴虐政權的極致邪惡……

我理解，在這樣的情況下失去孩子，那份傷痛是任何言語都無法形容的……想必此刻，已經覺醒的您，一定有很多懊悔、很多希望能重來的事情……

但當您還在職時，作為一位主管思想領域的政治家，您對宗教，以及對法輪功，抱持著什麼樣的觀點？

劉思遠先生：

（聽著蘇菲亞的分享，他輕輕點頭，眼神遙遠，充滿沉重。當蘇菲亞提到「政治犯」、「良心犯」以及活摘器官的罪行時，他臉上浮現出清晰的憤怒與痛苦，但他很快又將其壓下。）

是的，蘇菲亞小姐……「極致邪惡」，您用這個詞一點也沒錯。當那樣的罪行發生在自己最摯愛的親人身上時，真相所展現出的赤裸與恐怖，是任何詞彙都無法描述的。

(他深吸一口氣，努力保持聲音平穩。)

失去安然的痛……確實會伴隨我的餘生。也正如您所說，我有太多的懊悔，太多希望能重做、重說、重想的事情……如果我能早點意識到，如果我沒有那麼相信我所被教導的一切，如果我能多聽聽我女兒的話……也許……(他的聲音有些哽咽)。

但過去無法改變。我現在唯一能做的，就是面對它，並在餘生中努力去做正確的事。

(他停下來，整理著對那段遙遠時光的記憶，那段他的認知還截然不同的時光。)

您問我當年在職時，作為一個從事「思想」工作的人，對宗教和法輪功的觀點……老實說，在那段時期，我和我的許多同事一樣，都深受偏見與單向宣傳的嚴重影響。

對於宗教，我所受的教育，以及我自己當時也相信，那是特定歷史階段的產物，是馬克思所說的「人民的鴉片」。我將宗教視為一種屬於過去的事物，或許有其一定的文化、

道德價值，但基本上與一個現代、科學、唯物的社會格格不入。我相信，當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提高，教育程度改善後，宗教的影響力便會自然衰退。在我參與規劃的發展計畫與項目中，宗教通常被視為一個需要「管理」、「引導」的因素，以確保其不妨礙整體發展，而很少被看作是正當的精神需求，或是對社會有益的積極力量。

至於法輪功，當 1999 年鎮壓開始時……(他遲疑了一下，臉上閃過一絲尷尬)。那時，我正處於研究生涯的巔峰，準備踏入政壇。我所能接觸到的信息，和體制內許多人一樣，主要來自官方的媒體渠道。那些新聞、報導和宣傳材料，都將法輪功描繪成一個「邪教」，一個披著氣功外衣、危害社會穩定與人民健康的反動政治組織。

坦白說，我當時沒有深入了解。我正忙於自己那些宏大的項目與計畫。我理所當然地接受了那些資訊，視其為無需查證的事實。我本身也帶有一種唯物主義者的偏見，認為那些追求修煉、相信神佛的人是「迷信」、「落後」的。我曾想，如果法輪功真的那麼好，政府為何要如此嚴厲地鎮壓？想必有它的道理。

(他的語氣中帶著一絲懊悔。)

當我成為一名省級官員後，儘管有了一定地位，我所收到的關於鎮壓的資訊依然是單向的。那是來自中央要求「加強鬥爭」、「堅決處理」的指令，或是下級關於「轉化」法輪功學員的「功績」報告。我從未有機會，或許也未曾主動去尋找機會，去接觸那些修煉者，去傾聽來自他們一方的聲音。

我當時的觀多點，如果有的話，也只是一種漠不關心，一種「政府這麼做，想必有它的道理」的默認。頂多，有時會覺得某些措施似乎過於嚴苛、沒有必要，但隨後又告訴自己，那是「專責機關的事」。我沒有看到，或者說不想看到，問題的本質：那是一場針對善良民眾的殘酷迫害，只因為他們有著不同的精神信仰。

（他嘆了口氣，眼神中流露出深切的悔恨。）

那是一種盲目，一種應受譴責的麻木不仁，蘇菲亞小姐。而我，為自己的那份盲目，付出了過於慘痛的代價。直到悲劇降臨到我自己的家庭、降臨到安然身上，我才驚覺自己錯得有多離譜，又是如何被欺騙，並自我欺騙的。

蘇菲亞·貝爾：

您的意思是，您所得到的關於鎮壓法輪功的資訊完全是單方面的，而以您這樣一位高級官員的身份，也無法掌握實際情況？甚至在您在職時，可能從未聽任何人提過活摘器官的罪行？

劉思遠先生：

（聽了蘇菲亞的問題，他緩緩地點了點頭，目光下垂，隱藏着一絲苦澀與羞愧。）

是的，蘇菲亞小姐。正如您所說。聽起來很難相信，是吧？一個身處我這樣位置的人，一個理應能接觸到多方資訊的人，對於一場正在自己國家發生的大事件、一場悲劇，竟可以如此茫然無知。

（他抬起頭，直視蘇菲亞，語氣中帶著一絲酸楚。）

「單向資訊」……這已經是個委婉的說法了。事實上，我們活在一個受到嚴密控制的資訊泡泡裡。我們在報紙上讀到的、電視上看到的、會議中聽到的……全都經過篩選和引導，以符合某種特定的意圖。下級呈報上來的報告，也往往只是為了迎合上級、或是掩蓋棘手問題而被粉飾過的「漂亮」數字和政績。

即便在內部，對於像法輪功這樣的「敏感」問題，討論也極為有限。人們通常避而不談，或只是重複官方的論調。誰敢提問，誰敢表示懷疑，就可能給自己惹禍上身，被認為是「思想有問題」、「立場不堅定」。恐懼，儘管沒有說出口，卻已滲透到每個角落。

我並非為自己的無知辯解。我本應主動去了解，本應更有責任心。但那時，我被工作的洪流、個人的野心所裹挾，或許，也有一份自滿，認為自己知道的已足夠多，理解的已足夠對。

至於活摘器官的罪行……（他的聲音沉了下去，眼神中浮現出明顯的憎惡與驚駭）。小姐，當我還在職時，我一次都未曾從任何官方渠道，甚至是內部的竊竊私語中，聽說過這件事。

（他一字一頓地強調。）

或許它被保密在更高的層級，或者僅限於某些特殊部門。又或者，知情者因其駭人的性質而不敢洩露半個字。我不知道。

我第一次聽聞這個罪行，是在我失去所有職務、在我女兒被捕之後。一些法輪功學員找到了我，他們與我分享了他

們所知道的情況，以及他們收集到的證據。起初，坦白說，我不信。我無法相信一個政權，無論多麼獨裁，竟能做出如此野蠻、非人性的事。我曾以為那是被誇大的指控，是出於憤恨的產物。我對邪惡的「底線」還存有一絲渺茫的幻想。

(痛苦再次浮現在他臉上。)

直到……直到那無法想像的悲劇，發生在我的安然身上……直到一位昔日的下屬，憑著他僅存的良知與巨大的勇氣，秘密告知我她死亡的真相……我才徹底崩潰。所有幻想，哪怕是最微小的一絲，也煙消雲散。

那是一個過於恐怖的真相，遠遠超出了我作為一名「思想官員」時的所有想像。它也讓我明白，我曾服務的那個體制，不僅控制資訊，更有能力用一張厚厚的謊言帷幕，來掩蓋最駭人聽聞的罪行。

(他沉默了，憤怒與悲痛似乎讓他無法再多說一個字。)

蘇菲亞·貝爾：

是的，我聽起來像一齣悲喜劇……如果我的話有些重了，我很抱歉……但想必在您覺醒之後，回看自己的人生，您一定也意識到了其中的悲喜交加之處……

劉思遠先生：

(聽了蘇菲亞的評論，他沒有絲毫愠怒或不悅。相反地，一抹苦澀、近乎自嘲的微笑浮現在他唇邊。他輕輕點頭。)

「一齣悲喜劇……」(他重複道，聲音低沉而充滿思索)。不，蘇菲亞小姐，您的話一點也不重。恰恰相反，它非常準確。當我「覺醒」後，如您所說，再回顧自己此前的人生，我也覺得那和一齣戲沒什麼兩樣。一齣我既是演員、也是觀眾，或許，還是在不知不覺中，為那齣悲喜劇添磚加瓦的編劇之一。

(他停頓下來，目光望向遠方，像在重溫自己人生的每一幕。)

其中的「喜」劇部分，或許是我的天真與幻想。一個來自鄉下的年輕人，懷抱著建設國家的偉大夢想，埋首書卷，相信那些崇高的理論與美好的承諾。之後成了一位知識份子、一位官員，自以為掌握了真理，正在為整個民族擘劃未來，陶醉於那些計畫、數字與慷慨激昂的演說。自詡為

啟蒙者、引路人，卻不知自己不過是個被牽線的木偶，或者更糟，是一個領着另一群瞎子走向黑暗的瞎子。

那份「喜感」的苦澀之處在於，我後來才意識到，那些我曾視為崇高、視為理想的東西，實際上可以被利用、被扭曲，以服務於黑暗的目的。我那些嘔心瀝血寫就的文章，或許也只是為那座日後壓垮了我家庭的謊言城堡，貢獻了幾塊磚罷了。

（他的聲音沉了下來，「悲」劇的成分開始顯現。）

而「悲」劇的部分……正是為那份幻想與盲目所付出的代價。是家庭的破碎，是安然的冤死。是所有我曾追尋的信念與價值的崩塌。是在一切都已無法挽回時，才 belatedly 意識到真相的悔恨。

悲劇在於，我，一個理應從事「思想」工作的人，在關於人與社會的核心問題上，思想卻是如此空洞與錯誤。我，一位父親，卻無法保護自己唯一的女兒，免於那邪惡的魔爪，而我自己，卻曾是那邪惡的一部分，儘管是無意的。

悲劇在於，當我試圖為女兒尋求公道時，我才發現，在那個體制裡，「公道」本身就是一種奢侈品，是另一場鬧劇。

（他嘆了口氣，臉上顯露出深沉的疲憊。）

您說得對，那是一齣悲喜劇。而我是其中的一個角色，一個或許因其天真而引人發笑，也因其痛苦而催人落淚的角色。當我人生舞台的帷幕在舊的一幕落下，而在這片自由的土地上開啟新的一幕時，我回首過去，只看到心酸與悔恨。

但或許，即便在悲喜劇中，人也能學到教訓，不是嗎？關於真相、關於良知，以及關於在邪惡面前保持沉默所需付出的代-價。這正是我現在努力在做的事，至少，讓我的餘生，不再是命運的一場玩笑。

蘇菲亞·貝爾：

是的，過去的已經過去，無法重來……但如果假設，是的，我強調「假設」這個詞，假設給您一個機會回到大約兩三年前，並且可以改變一件事，您會做什麼？為了您的女兒、您的妻子……您會怎麼做來幫助她們？我還不太清楚您的家庭背景，如果這不至於太過冒昧和私人，您能分享一些嗎？

劉思遠先生：

(聽了蘇菲亞的問題，他沉默了許久，雙眼低垂，陷入了深沉的思索。他的手不自覺地握緊。這個問題觸及了他內心最深、最痛的角落。)

「如果能回到過去……改變一件事……」(他重複道，聲音近乎耳語，然後長長地、沉重地呼出一口氣)。蘇菲亞小姐，這是一個我問過自己無數次的問題。在那些漫長的失眠之夜，在那些孤獨的時刻，過去的影像總是不斷浮現，而那個「如果」的問題，總是不斷折磨著我的心。

(他抬起頭，眼神有些迷離，彷彿真的望向了那遙遠的記憶。)

如果……如果我能回到大約兩三年前……當安然還在，當一切還未到最糟的地步……(他的聲音有些顫抖)。我會毫不猶豫。

我唯一想改變的事，不是我的事業，不是我的地位，而是我對我女兒、對她信仰的態度和行為。

我會……我會坐下來，真正地傾聽安然。聽她談論法輪功，談論她所感受到的美好，談論她所追尋的「真、善、忍」價值。我不會置之不理，不會用一種強加的姿態，以「為她前途著想」、「怕影響家庭」為由來勸退她。我會拋開

所有偏見，拋開一個被體制洗腦太久的人所懷有的那些無理的恐懼。

我會和她一起去了解。我會去讀那本我後來、在為時已晚之際才有緣讀到的《轉法輪》。我會努力去理解，為什麼一個如此平和的修煉法門，會讓當權者恐懼至此。

而最重要的，我會站在她那邊。我會用我所擁有的一切，不是去逼她放棄信仰，而是去保護她，保護她正當的信仰自由權利。哪怕必須面對任何後果，哪怕必須放棄我所建立的一切。因為沒有任何東西，比我孩子的安全與幸福更珍貴。

(淚水再次輕輕滑過他的臉頰。他沒有立刻擦去。)

至於我的妻子……(他的聲音沉了下來，另一種悲傷，雖較為輕柔卻同樣深沉，浮現出來)。我的妻子，她叫淑娟。一位溫柔賢淑、盡職盡責的小學老師。她已經過世十多年了，因癌症，那時安然才十一歲。

(他苦澀地笑了笑。)

如果能回到她還在世的時候……或許我想做的，是花更多的時間陪伴她，更多地傾聽她，更多地與她分享。那時，我太專注於事業，專注於那些「宏大的理想」，以至於時

常忽略了身邊最平凡、最親近的事物。淑娟是個心靈非常純淨、直覺很好的人。或許，如果我當時能對她多做開心扉，她能給我一些明智的建議，幫助我更均衡地看待一切。

她過世後，我試圖將所有的愛都彌補給安然。她是我的一切。正因如此，失去她的痛苦才變得如此難以承受。

(他真誠地望著蘇菲-亞。)

關於家庭背景……沒有什麼太特別或複雜的，小姐。我們曾經是一個平凡、相親相愛的小家庭。我的父母在鄉下，是純樸的農民。我是獨生子。淑娟過世後，就只剩下我們父女倆相依為命。安然從小就非常懂事、乖巧。她學習很好，考上了首都的名牌大學。那曾是我最大的驕傲。

但正是地理上的距離，或許還有當時認知上的差異，讓我在風暴來臨時，未能及時地理解和保護她。

(他嘆了口氣，充滿了無盡的悔恨。)

如果……如果我能重來一次。但人生沒有「如果」，不是嗎？我們只能努力用剩下的生命，活得更好一些，並希望自己的錯誤，能成為別人的教訓。

蘇菲-亞·貝爾：

也就是說，當您得知女兒修煉法輪功時，您認為自己錯失了及時理解女兒的機會，也沒有任何具體的方案來幫助她？

您是否認為，如果您不是政府官員，如果您沒有政治對手，或許您的女兒就不會陷入那樣的悲劇？我的意思是，您的女兒似乎在某種程度上，是那場您未能及早察覺的權力鬥爭的犧牲品？

劉思遠先生：

（聽著蘇菲亞的每一句話，他的臉色沉了下來，皺紋更深地刻在臉上。他緩緩點頭，一種苦澀的承認。）

是的，蘇菲亞小姐。當安然第一次與我分享她修煉法輪功的事時，我當時的反應……現在回想起來，我感到無比羞愧和懊悔。我不是用一顆開放的心在傾聽，而是用一名官員的恐懼、用那些已深植於潛意識的偏見在聆聽。我擔心她的「前途」，害怕會「影響」我的事業，害怕那些宣傳機器所散播的種種模糊的威脅。

我沒有去了解，沒有去試圖理解，為什麼像安然這樣一個聰明、有見識的女孩會選擇那條路，反而急於勸阻，甚至

帶有幾分強迫，儘管我努力表現得溫和。我錯失了與她同行、理解她的黃金機會。那是我最大的悔恨之一。當時，我沒有任何「具體的方案」能以她所需要的方式去幫助她，因為我自己也不懂她需要什麼，不懂問題的本質。我只想到如何以我那狹隘的眼光來確保她的「安全」，也就是，放棄法輪功。

(他停下來，深吸一口氣。蘇菲亞的第二個問題觸及了另一個層面，一個他也必須面對的殘酷事實。)

至於我的女兒是否是那場我所捲入的權力鬥爭的犧牲品……(他的聲音沉了下去，帶著明顯的悲憤)。這件事，是後來，當一切都已敗露，當一位昔日的下屬冒險向我揭示了來龍去脈後，我才痛苦地意識到的。

正如您所說，或許安然，在某種程度上，成了我的政敵用來發動致命一擊的棋子。當他們得知我被列為更高職位的「規劃」人選時，他們便急於尋找打倒我的方法。而在鎮壓正激烈進行的背景下，安然修煉法輪功這件事，成了再好不過的藉口。

他們刻意將事情鬧大，向上級報告，製造壓力。安然被如此迅速而嚴厲地逮捕，以及隨後我在短時間內被開除黨籍、

撤銷所有職務，這一切都 nằm trong 一個精心策劃的計畫中。他們的目標是將我從政壇上剷除，而他們成功了。

（他握緊拳頭，眼神中流露出憤怒與無力。）

當時，我過於專注在專業工作、在自己的「理想」上，對於官場的陰謀詭計，不夠敏銳，也不夠警惕。我沒有意識到，我的晉升，我的「不站隊」，本身就是許多人的眼中釘。我太天真了，以為只要自己好好工作，盡心奉獻，就會得到認可。

而安然……我那無辜的女兒……卻為她父親的政治遲鈍與天真，付出了代價。如果我不是一名「官員」，如果我沒有成為那些人的「目標」，或許……或許安然不會那麼引人注目，不會那麼迅速、那麼殘酷地成為目標。儘管鎮壓法輪功是事實，任何修煉者都可能面臨危險，但她的案子，顯然因為針對我的政治因素而被加速、被加重了。

（他嘆了口氣，帶著無限的哀痛。）

那是一個苦澀的真相，一份我將終生背負的罪惡感。我不僅未能保護女兒免於政權的邪惡，更無意中將她推入了骯髒的權力鬥爭漩渦中。

我確實沒有及早察覺，蘇菲亞小姐。而當我察覺時，一切都為時已晚。

蘇菲亞·貝爾：

是的，法輪功被迫害二十多年的情況我也有所了解，但根據我的觀察，並非百分之百的學員都被公安逮捕，儘管幾乎百分之百的人都受到監控。看來他們似乎只針對某些「重點案例」，例如扮演重要角色的學員，或是他們所謂的「頑固份子」，或像您女兒那樣的其他特殊情況……

劉思遠先生：

（聽著蘇菲亞的分析，他緩緩點頭，神情專注。）

您說得有道理，蘇菲亞。您的觀察非常貼近我後來才有機會了解和意識到的現實。對法輪功的迫害，儘管是全面且殘酷的，但他們的執行方式確實有著一定的「戰術」和「重點」。

確實不是百分之百的修煉者都被立即逮捕。但正如您所說，幾乎百分之百的人都處於被監控、被管制、在不同程度上被刁難的狀態。從被轄區公安頻繁「問候」、在工作單位被施壓、被限制出行，到被沒收書籍資料、被威脅家

人……那是一種他們必須日復一日生活在其中的緊張、窒息的氛圍。

至於逮捕，確實，他們通常針對您所分析的那些「重點案例」：

第一，扮演重要角色的人：也就是他們所認為的各地學員群體的「協調人」、「負責人」。逮捕這些人，他們的目的是瓦解修煉群體、切斷聯繫，並在其他人中製造恐慌。

第二，所謂的「頑固份子」：這些是堅定自己信仰的學員，無論遭受酷刑、利誘還是威脅，都拒絕「轉化」（也就是放棄修煉並寫下保證書，甚至誣衊法輪功）。他們被視為「頑固份子」，需要被嚴厲懲罰以儆效尤。其中許多人被判處重刑，或被長期關押在勞教所、洗腦班。

第三，敢於發聲、揭露真相的人：這些是勇敢的學員，他們收集關於迫害、關於酷刑和虐待的證據，然後設法將其送往國外或在國內傳播。他們是當局尤其憎恨並想方設法要封口的對象。

以及第四，其他「特殊案例」：就像我的女兒安然。她並非「協調人」，在學員群體中也不是什麼特別突出的角色。但她是一位正處於「風口浪尖」上官員的女兒。逮捕安然

帶有多重目的：既是為了震懾其他修煉者，也是對我本人的直接打擊，同時也是那些想向上級邀功請賞之徒的一份「政績」。

（他嘆了口氣，一絲苦澀清晰可見。）

他們擁有一套龐大而精密的監控系統。他們建立名單，對學員進行分類。他們有必須完成的「轉化」或逮捕的「指標」。有時候，逮捕也帶有隨機性，或是為了「完成指標」，或是在某些「嚴打」運動的高峰期。

在一個法律僅為工具、缺乏獨立監督的體制中，任意和殘暴隨時可能發生在任何他們認為「有問題」的人身上。

我的女兒安然，或許就落入了那個「特殊案例」的範疇。一位優秀的大學生，一位（儘管已部分失勢的）官員的女兒，卻堅定自己的信仰。她成了一個對那些想立功和想剷除我的人來說，過於「完美」的目標。

（他沉默片刻，望向窗外，眼神遙遠而痛苦。）

那是一場力量懸殊的較量，蘇菲亞小姐。一方是整個龐大的國家機器，有公安、特務、監獄、媒體……而另一方，只是手無寸鐵的普通百姓，心中只有對「真、善、忍」的信仰。而在那場較量中，像安然那樣的人，就成了犧牲品。

蘇菲亞·貝爾：

我聽您剛才分享的，還不是很明白，如果當時您更理解您的女兒，支持她修煉，甚至您自己也和她一起修煉……那麼您會怎麼做來保護她和您自己？或者，當您具備更強的「政治經驗」或「政治敏感度」，能看清您政敵的真面目，預知他們的陰謀時，您又會怎麼做？與他們妥協，甚至主動申請退出官場？還是有某個更明確的解決方案？

劉思遠先生：

（聽著蘇菲亞的假設性問題，他沉吟了許久。這些也是他曾反覆苦思、折磨自己的問題。他雙手交握，低頭凝視，然後緩緩抬起。）

您提的問題非常深刻，蘇菲亞，這些問題觸及了我人生未能走上、或無法走上的那些「岔路」。很難確切地說在那些假設情境中我會怎麼做，因為現實總比想像複雜得多。但基於我後來的經歷與認知，我可以分享我的想法。

如果我更理解女兒，支持她修煉，甚至與她一同修煉……

（一絲苦澀的微笑掠過他的唇邊。）

這是一個美好，卻也充滿挑戰的「如果」。

首先，在精神層面：我相信，如果父女倆有共同的信仰，走在同一條修煉路上，我們之間的連結會更加深厚。我們可以互相分享、彼此鼓勵，共同面對困難。那將是巨大的精神力量。安然不會感到孤單，而我也會更早地找到內心的平靜與生命的真義。

關於保護：這是最困難的部分。

第一，我會更謹慎：如果清楚了解了迫害的本質，我們在所有行動上都會更加小心。或許不會在容易引人注目的地方公開修煉，會更仔細地保管書籍資料，限制與不可信之人的接觸。

第二，我會尋求（儘管希望渺茫的）法律援助：雖然知道中國的法律只是工具，但若能事先準備，或許可以找到那些勇敢的人權律師（儘管他們人數極少且自身也面臨巨大危險）進行諮詢，以防不測。

第三，我會為最壞的情況做準備：或許我們會考慮更早地設法離開這個國家，在一切變得為時已晚之前。這是一個極為艱難的決定，因為離開故土從非易事。但如果將安全與信仰自由置於首位，那或許是唯一的選擇。

第四，我會揭露真相：如果有機會和準備，暗中收集關於迫害、關於侵犯人權的證據，並設法公諸於國際社會，也是一種自我保護的方式，儘管風險極高。因為當事件受到國際關注時，當局或許會有所忌憚。

如果我具備更強的「政治敏感度」，能看清對手的陰謀……

這又是另一種情況，更側重於權力鬥爭的層面。

主動退出官場：這是一個極大的可能性。如果我意識到自己只是一枚棋子，我的「清白」和「不站隊」反而成了弱點，且那些鬥爭可能危及我的家庭，我或許會選擇及早退出。可能會申請調往一個較不重要的職位，甚至放棄政途，回歸純粹的研究或教學工作。家庭的安全，特別是安然的安全，將是最高優先。

妥協？：這是一個困難的選項，我不確定自己能否做到，特別是當那種妥協違背我的道德原則時。但如果某種程度的「妥協」（例如，不那麼出風頭，不與他們爭權奪利）能換來我和家人的安寧，或許我也會不得不考慮，儘管心有不甘。然而，以那些人的本性，很難相信任何長期的「妥協」。

尋找同盟（如果可能）：在政壇中，並非人人都是壞人。如果能找到志同道合、同樣對現狀不滿的人，聯合起來或許能形成一定的制衡力量，儘管這非常困難且危險。但這是一條風險極高的路。

準備退路：與任何行動並行的，是準備好一個「B 計畫」——也就是在情況變得極度危險時尋求離開國家的途徑。政治敏感度不僅是用來應對，也是用來判斷何時需要「逃離」以保全性命和更重要的價值。

（他嘆了口氣。）

說起來容易，蘇菲亞小姐。當身處實際情境中，面對無數的壓力、混亂的資訊和複雜的牽絆時，要做出正確的決定是極其困難的。

但我確信一點：如果我能重來，我會將安然的安全與幸福，將她的信仰自由，置於所有事業野心或我曾追尋的虛幻「理想」之上。或許，那才是一位父親、一個人，最需要具備的「敏感度」。

或許，如果我能那樣做，儘管人生會截然不同，不會有「地位」、沒有「權力」，但至少，我就不必像現在這樣，活在無盡的折磨與悔恨之中。

蘇菲亞·貝爾：

是的，我能理解在當時的實際情況下，很難找到兩全其美的解決方案……但在剛才的假設情境中，您能優先考慮將女兒的安全與幸福、她的信仰自由，置於所有事業野心或「理想」之上……這是一個需要付出巨大代價的決定，我想，會這麼選擇的人可能並不多……

劉思遠先生：

（聽著蘇菲亞的話，他輕輕點頭，一絲苦澀的微笑浮現在唇邊。他的眼神遙遠，蘊含著對人時常面臨的抉擇的理解與傷感。）

您說得非常對，蘇菲亞。像那樣的決定，將親人的安全與自由置於所有個人野心、所有被粉飾的「理想」之上，確實需要巨大的犧牲。而在我曾生活過的那個社會，一個將事業、地位、「前途」置於首位，一個教導人要為「大我」犧牲「小我」、為集體犧牲個人的社會（儘管那個「集體」究竟是什麼，又是另一個問題）……確實不會有太多人做出那樣的選擇。或許應該說，沒有太多人敢那樣選擇。

（他稍作停頓，語氣沉吟。）

當我還在體制內時，我也曾目睹，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也是那種思維模式的一部分。人們願意犧牲健康、犧牲與家人相處的時間，甚至犧牲良知，來換取更高的職位、更多的權力、更大的利益。人們害怕落後，害怕被認為「沒有上進心」，害怕達不到「組織的期望」。

那個漩渦會把人捲進去，讓人迷失方向，讓心變得麻木。人會逐漸忘記生命的真正價值，忘記對至親的愛與關懷。孩子可能變成對未來的「投資」，家庭可能變成服務於事業的「後方」。

（他嘆了口氣，帶著深沉的悲傷。）

在某種程度上，我也曾是那樣的人。我曾為自己的事業成就感到自豪，也曾將安然視為一種延續，對她寄予厚望。而當安然選擇了一條「不同」的道路，一條在我看來，按照那個社會的標準是「危險」且「沒有前途」的路時，我的第一反應是恐懼，是希望她改變。

直到我失去了一切，失去了最寶貴的東西，我才痛苦地意識到，所有那些「崇高」的東西，那些我曾追尋的「野心」和「理想」，如果它們不能為我所愛的人帶來真正的幸福與安寧，那麼它們就毫無意義，如夢幻泡影。

(他直視蘇菲-亞，眼神真誠而多了一分坦然。)

做出那樣的犧牲，確實需要付出很多。它需要人放棄自私的「自我」，放棄對名望、地位的幻想。它需要足夠的勇氣去逆流而行，去接受在世俗的標準下，可能會被視為「失敗者」。

但現在，當我「覺醒」後，當我嘗盡了痛苦與悔恨的滋味後，我相信，如果真能重來一次，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那樣的犧牲。因為，歸根結底，什麼才是真正重要的？是高官厚祿，是虛名浮利，還是女兒的笑容，親人心靈的安寧？

或許，只有當人經歷了巨大的失去之後，才能更清楚地看清，何者為金，何者為土，何者為永恆的價值，何者又只是曇花一現的浮華。

我也相信，儘管在當時的環境下，不會有太多人那樣選擇，但依然有些父親、母親，有些平凡的人，為了愛，為了他們的良知，不計任何風險，默默地做著非凡的事。他們正是那晦暗社會中閃爍的微光。而他們的故事，也需要被講述，需要被世人知曉。

蘇菲亞·貝爾：

是的，這麼說來，對您而言，要做出那樣的選擇，似乎在您覺醒、看透許多事情之後，會更容易決定……

但有一個問題，當讀者讀到您剛才的分享時，或許大多數人會問：為什麼您在讀了法輪功的書籍後，世界觀會發生改變？為什麼像您女兒那樣的人，會在一個被禁止、被打壓，隨時面臨被捕和被活摘器官風險的環境中，依然堅定地修煉？換句話說，法輪功究竟有何價值，能讓那麼多人願意為之付出一切？

劉思遠先生：

（聽了蘇菲亞的問題，他緩緩點頭。一抹平和而又充滿思緒的淺笑浮現在他唇邊。他知道，這些是關鍵問題，是許多局外人會感到困惑，甚至懷疑的地方。）

您提的問題非常重要，蘇菲亞。那也正是我在真正開始了解之前，曾經問過自己的問題。我明白，對於那些從未接觸、從未體驗過的人來說，很難想像一個修煉法門為何能讓人產生如此深刻的改變，為何那麼多人願意面對危險，甚至犧牲生命來捍衛自己的信仰。

（他稍作停頓，似乎在謹慎地選擇最恰當的措辭。）

關於為何我的世界觀在讀了法輪功的書籍，特別是《轉法輪》之後會發生改變……

在此之前，如我所分享的，我是一個徹底的唯物辯證論者，在一個推崇實證科學、將所有靈性與信仰之事都視為「迷信」的環境中接受教育並工作。我的世界觀，是建立在階級鬥爭、歷史線性發展、以及人能憑藉智慧與意志主宰自然和社會的理論之上。

當我讀《轉法輪》時，起初是出於好奇，想去了解究竟是什麼讓我女兒和那麼多人如此投入，又是什麼讓當局非要下此狠手鎮壓。但越讀下去，我越感到震撼。

那本書為我打開了一個全然不同的世界，一個我前所未聞的宇宙觀與人生觀。它不僅僅談氣功、談健康，它深刻而系統地闡述了宇宙的起源、不同空間層次的存在、神佛的存在、物質與精神的關係、人生的真正目的、因果報應、輪迴轉世……

這些道理，起初，或許會讓像我這樣的唯物論者難以接受。但書中的論述卻極具邏輯、十分嚴謹，並且解答了許多現代實證科學至今仍束手無策，或刻意迴避的人生終極問題。它與真正的科學並無矛盾，恰恰相反，它為人的認知開拓了新的天地。

更重要的是，《轉法輪》教人如何做一個好人，一個真正的好人，按照宇宙的標準——「真、善、忍」——去做。

當我將這些法理與我所生活的社會現實，與我曾目睹甚至參與其中的那些謊言、詭計、自私和爭鬥進行對照時，我看到了巨大的反差。我意識到，法輪功所倡導的道德價值，正是當下中國社會所急需的良藥，是建立一個真正文明、和諧社會的基石。

那並非一種被迫的「改變」世界觀，而是一種發自內心的自然「啟迪」。我過去所信奉的唯物哲學，頓時顯得膚淺而狹隘。我開始更深刻、更多維度地看待事物。我明白了，在有形的物質表象背後，還有無形卻無比強大的規律在主宰著一切。

至於為何像安然那樣的人，會在如此嚴酷的環境下堅定修煉，我認為有幾個主要原因：

第一，親身體驗到法輪功的益處：絕大多數走入法輪功的人，都感受到了身心兩方面明顯的積極變化。疾病減輕或消失，心性變得平和、開朗，家庭與社會關係變得更好。當人真正體驗到這些美好之後，他們的信念會非常堅定。

第二，對真理的認識：如我所說，法輪功不僅是祛病健身的氣功，更是性命雙修的大法，能幫助人洞悉生命的意義、宇宙的法則。當人認識到那是真理、是回歸的正確道路時，任何艱難險阻都無法動搖他們。他們明白自己所追尋的是無比崇高與珍貴的。

第三，「真、善、忍」的力量：正是這些原則給了他們面對迫害的力量。「真」讓他們不說謊，不屈服於無理的要求。「善」讓他們即使面對迫害自己的人也能心懷慈悲，不以暴還暴。「忍」讓他們能承受巨大的苦難與殘酷的折磨，卻依然堅守信仰。

第四，對社群與未來的責任感：許多法輪功學員感到自己有責任說出迫害的真相，讓世人不再被謊言宣傳所蒙蔽，為後代守護美好的價值。他們相信，自己的堅持，有助於讓邪惡退卻，讓正義得以伸張。

總而言之，蘇菲亞小姐，法輪功不僅帶來健康，更重要的，是帶給人道德上的覺悟、精神上的昇華，以及對未來的希望。它回答了我們每個人或多或少都在思索的、關於人生與宇宙的最深層問題。正因為這些巨大而真實的價值，才使得許多人，像安然一樣，願意付出一切來捍衛自己的信仰。

那不是盲從，而是基於深刻理解與體驗的有意識的選擇。而這，也正是我在真正了解之前，所無法理解的。

蘇菲亞·貝爾：

是的，感謝您提出了既有分析又有總結的回答……我個人對您所說的深有同感，我也曾讀過《轉法輪》這本書，它確實給我的心靈與思想帶來了深刻的觸動……但我們的許多讀者還未曾讀過此書，因此，僅憑幾句簡短的分析就能讓所有人都理解，這恐怕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

那麼，是否有更易懂、更生動的表達方式呢？例如，透過您所目睹的法輪功學員的哪些行為、言語或事件，讓您對他們心生敬佩？……當您的女兒被捕時，您是否從他們那裡得到了任何具體的幫助？

劉思遠先生：

（聽著蘇菲亞的顧慮，他輕輕點頭。他明白，要向未曾接觸過的人解釋一個修煉法門的深刻價值，絕非易事。）

您說得非常對，蘇菲亞。的確，僅憑幾句分析，很難讓未曾讀過《轉法輪》、未曾接觸過學員的人，完全感受到法

輪功的深度與力量。或許，一些我親眼所見的具體故事與實際行動，能幫助大家更清晰地描繪出輪廓。

(他沉默片刻，像在回溯那些變故之後走進他生命中的記憶與人物。)

安然被捕後，特別是在我被撤職、被朋友同事疏遠之後，我的人生陷入了一片黑暗與絕望。我感覺自己像是被全世界拋棄了。正是在那些時候，一些法輪功學員，一些我過去甚至不曾留意，或對他們抱有錯誤看法的人，卻主動找到了我。

他們身上最先讓我敬佩的，是那份勇氣與無私。他們知道我是誰，知道我曾是那個鎮壓他們的體制的一部分，知道與我接觸可能給他們自身帶來風險。但他們還是來了，沒有絲毫畏懼。他們不是來指責，不是來要求，而是來分享、來安慰。

另一點，是他們的耐心與慈悲。當他們與我談論法輪功、談論迫害的真相時，他們絲毫沒有強加於人，也沒有表現出怨恨或仇恨。他們平和、從容地交談，耐心地提出證據和道理，即便我當時仍充滿懷疑，甚至起初言語並不友善。他們似乎毫不在意我的態度，只專注於幫助我明白真相。

當安然被捕時，他們確實盡力給了我很多幫助，儘管他們自己也面臨著無數困難。

一些學員努力動用他們自己微薄的關係，去打聽安然的消息，看她被關在哪裡，情況如何。他們還為我介紹了幾位勇敢的人權律師，那些願意接手這類「敏感」案件的人，儘管他們明知勝算渺茫，且自身將面臨巨大風險。

在我最消沉的日子裡，他們時常來看望我，帶給我一些食物，靜靜地聽我傾訴，或僅僅是陪伴在我身邊。有些人只是普通的勞動者，生活並不寬裕，但他們願意分享自己所擁有的一切。那份真誠與質樸，觸動了我的心。

正是他們中的一位，一位看起來非常慈祥的中年女士，把那本《轉法-輪》遞給了我。她說，或許讀讀書，能幫助我找到內心的平靜，找到心中困惑的答案。她沒有絲毫勉強，只是溫和地建議。

我記得有一次，當我陷入絕望，幾乎想放棄一切時，一位年輕的學員對我說：「劉叔叔，您別灰心。光明總會到來的。我們要相信正義，儘管它可能會遲到。重要的是，我們要守住心中的善念，不能讓邪惡把我們變得和它們一樣。」那番話，出自一個正身處殘酷迫害中的年輕人口中，讓我極為觸動，也思考了許多。

還有一位學員，一位年長的男士，曾在獄中遭受野蠻的酷刑，但見到我時，他沒有流露出絲毫怨恨。他只說，他希望那些作惡的人能早日醒悟，因為他們也在毀掉自己的未來。那份寬容，在那樣的處境下，真的讓我由衷敬佩。

那些行為、那些話語，儘管或許微小，卻展現出一種非凡的內在力量，一種任何事物都無法撲滅的善良。他們不只是談論「真、善、忍」，他們正在最嚴酷的環境下，踐行著這些原則。

正是這些，蘇菲亞小姐，逐漸融化了我內心的冰層，讓我不得不重新審視一切，並最終有勇氣去嚴肅地了解法輪功。他們讓我看到，即便在最絕望的黑暗中，也總有一些人，心中懷揣著信仰與善良的光芒。而正是那份光芒，才具有最持久、最能撼動人心的力量。

蘇菲亞·貝爾：

那麼，與中共關於法輪功的宣傳相比，您認為您實際體驗或見證到的情況，有何不同？

劉思遠先生：

(聽到這個問題，一絲悲哀而近乎嘲諷的微笑掠過他的唇邊。他輕輕搖頭。)

「不同」……或許這個詞還不足以形容，蘇菲亞小姐。應該說是完全相反，如同白晝與黑夜，白與黑。我實際體驗和見證到的法輪功學員的情況，以及後來我自己走入修煉後的感受，與中共日復一日喋喋不休的那些謊言與捏造，形成了絕對的對立。

(他深吸一口氣，像是準備揭示那些對立之處。)

關於所謂的「**迷信、反科學**」：

中共的宣傳：他們將法輪功描繪成一種違背科學的封建迷信，誘使人們拒絕醫療而導致死亡。他們試圖塑造修煉者愚昧、落後的形象。

我所見證與體驗的現實：我看到許多學員是知識份子，擁有高等學歷，包括科學家、醫生、工程師、教授……就像我的女兒安然一樣。他們走入法輪功並非因為愚昧，而是在經過審慎的思考與探究之後。我自己，一個曾從事科學研究的人，在閱讀《轉法輪》時也發現，其中的論述與真正的科學並無矛盾，反而對宇宙和人體有更深刻的洞見。法輪功強調修心性，同時練習舒緩的功法，全面改善健康。

許多人修煉後絕症痊癒，這是我親眼所見的事實。他們從不排斥現代醫學，而是理解修煉是另一條、在更高層次上獲得健康與精神昇華的途徑。

關於所謂的「**政治組織、顛覆政權**」：

中共的宣傳：他們不斷誣衊法輪功是一個圖謀推翻共產黨、受「境外敵對勢力」操控的政治組織。這是他們用來將鎮壓合法化的主要藉口。

我所見證與體驗的現實：法輪功根本沒有政治黨派那樣嚴密的組織結構。沒有成員名冊，不收費用，沒有官階，沒有辦公室。人們來煉功學法完全是自願的。創始人李洪志師父的講法，也都是公開的，並且只專注於指導人如何修煉心性、提升道德，沒有一句煽動顛覆或反對政府的話。學員們發聲反對迫害、講清真相，是受害者正當的自衛權利，並非「搞政治」。他們只希望有一個自由的修煉環境，僅此而已。正是中共無理的鎮壓，才將他們推到了必須發聲的位置。

關於所謂的「**擾亂社會秩序、危險**」：

中共的宣傳：他們炮製了諸如「天安門自焚偽案」等事件來抹黑法輪功，將極端、暴力的行為強加給學員，以此宣稱他們危害社會。

我所見證與體驗的現實：我所接觸的法輪功學員都是祥和、善良的人，他們努力按照「真、善、忍」的原則生活。他們善待他人，對家庭和工作負責。即便遭受不公對待、被毆打、被酷刑折磨，他們依然保持和平理性的態度，不以暴力還擊。他們只是和平地請願、拉橫幅、派發真相傳單。這樣的人怎麼可能「擾亂社會秩序」？真正製造動盪、恐懼與社會分裂的，正是中共的鎮壓機器。

關於所謂的「**洗腦、精神控制**」：

中共的宣傳：他們聲稱法輪功對學員「洗腦」，讓他們痴迷，拋棄家庭和工作。

我所見證與體驗的現實：法輪功恰恰相反。它讓人變得更清晰、更有智慧，更明白生命的意義。修煉人依然在社會中過著正常的生活，依然工作、照顧家庭。甚至，因為心性提高了，懂得為他人著想，他們會把這些角色扮演得更好。沒有人被強迫去相信、去追隨。一切都是自願的，基於每個人的認知與體驗。真正實施「洗腦」的，正是中共

的宣傳系統，它向民眾的頭腦中灌輸了歪曲的資訊和無端的仇恨。

（他嘆了口氣，一絲悲傷掠過。）

這種差異，蘇菲亞小姐，巨大到讓我為自己曾一度相信（哪怕只是一部分）的那些謊言而感到厭惡。它也讓我看到了宣傳機器的可怕力量，它能顛倒黑白，能將善良的民眾在許多人眼中塑造成人民的敵人。

而最令人痛心的是，正是這些謊言宣傳，製造了一層厚厚的迷霧，掩蓋了真相，使得從法輪功學員及其他良心犯身上活摘器官的罪行，能夠長期存在而未被廣泛揭露。

這也是為什麼，說出真相，儘管艱難與危險，卻變得如此重要。

蘇菲亞·貝爾：

是的，這些也都是我曾讀到、聽聞的關於中共的謊言……而這場迫害，至今已超過四分之一個世紀了……

我腦中突然冒出一個新問題：如果假設您是中國現任領導人的政策顧問，您會建議他怎麼做呢？……

以我一名記者的外部觀察來看，我看不出他對迫害法輪功一事有何明確的立場……儘管發起者不是他，但他對邪惡的姑息縱容，似乎也是一種助長……

劉思遠先生：

（聽了蘇菲亞的問題，他沉默了許久。臉上浮現出複雜而凝重的神情。他輕輕按了按太陽穴，彷彿這是一個極其棘手、重如千鈞的難題。）

「如果我是中共現任領導人的政策顧問……」（他重複道，聲音低沉而充滿思索）。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假設，蘇菲亞小姐。而且坦白說，在當前的局勢下，我並不認為像我這樣一個「叛逃者」，一個以他們不樂見的方式「覺醒」的人，所提出的建議，能夠被聽進去。

（他嘆了口氣，然後直視蘇菲亞，眼神嚴肅。）

但如果，僅僅是「如果」，我有那樣的機會，而且那位領導人心中還存有一絲善念，一絲希望為歷史留下美好印記的願望，而非僅僅是不擇手段地鞏固權力，那麼，我會大膽地提出以下建議，特別是關於法輪功問題：

第一，勇敢面對真相，立即停止迫害：

這是最首要、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我會勸告他，這場持續了二十多年的對法輪功的迫害，是一個嚴重的歷史錯誤，一個無法洗刷的污點，它完全違背了人文、道德與法治的價值。它不僅給數以百萬計的無辜民眾帶來了苦難，也嚴重損害了中國的國際聲譽，在社會中散播了恐懼與不信任。

無論以何種形式繼續這場迫害，都只會讓問題更加嚴重，製造更多敵人，並為後代留下惡劣的遺產。

具體行動：立刻下令停止所有針對法輪功學員的非法抓捕、酷刑與監禁。釋放所有被冤枉關押的人。

第二，全面調查並公布活摘器官的罪行：

這是一樁不可饒恕的反人類罪行。我會建議他必須成立一個獨立的調查委員會，必要時可邀請國際專家參與，以查明從法輪功學員及其他良心犯身上活體摘取器官的全部真相。

那些主謀、那些執行這項罪行的人，無論級別高低，都必須受到公開、嚴正的法律審判。絕不能有任何包庇或縱容。

這不僅是為了還給受害者一個公道，也是重建對法律與良知僅存信心的方式。

第三，為受害者恢復名譽並給予賠償：

必須為這場錯誤的迫害，向法輪功學員及其家屬所承受的痛苦與損失，進行公開道歉。

必須為法輪功恢復名譽，承認這是一個有益於身心健康與社會道德的祥和修煉法門。

必須制定合理的政策，對受害者及其家屬在物質與精神上所遭受的損失，給予應有的賠償。

第四，允許真正的信仰自由：

我會強調，信仰自由是人的基本權利，也記載於中國的憲法之中（儘管只是形式）。允許人民自由選擇自己的信仰，包括修煉法輪功，將有助於社會穩定、道德回升，也會讓人民對國家更有歸屬感。

一個真正強大的國家，不是一個控制人民思想的國家，而是一個尊重其多元與自由的國家。

第五，必須朝向透明化與真正的法治，進行政治與法律制度的改革：

法輪功問題只是體制深層問題的一個表徵。如果沒有真正的改革，類似的悲劇仍可能重演。

必須建立一個真正的法治國家，法律必須凌駕於一切之上，包括共產黨。必須確保司法獨立、新聞自由，以及有效的權力監督機制。

(他停下來，臉上浮現一絲疲憊。)

關於您提到的現任領導人的態度……確實很難看出一個清晰的立場。或許他正試圖在內部維持某種「平衡」，或許他有其他自認為更緊迫的優先事項。但正如您所說，對邪惡的姑息縱容，本身就是邪惡的一種形式。歷史不會寬恕任何一個手握大權，卻不敢站在正義一邊、不敢糾正歷史錯誤的人。

這些建議，我知道，在當今中國的政治環境下，可能會被認為是「天真」、「不切實際」。但我相信，如果想帶領這個國家走出謊言、暴力與不公的泥潭，這些都是必須做的正確之事。

如果那位領導人有足夠的勇氣與遠見來實現這些變革，他不僅能解決一個棘手的問題，更有可能為中國開啟一個更美好的新篇章。否則……我恐怕他正在努力建造的那個

「中國夢」，也終將只是一座建立在沙土上的城堡，在真相與正義的風暴前，不堪一擊。

蘇菲亞·貝爾：

是的，我明白，像這樣的建議，即便真是金科玉律，在中共領導人的眼中，也只不過是一個擅長理論卻缺乏足夠「政治敏感度」的人，所說的「不切實際」之言……

劉先生，很抱歉，我們的分享已經超過中午 12 點了……或許我們先暫停，明天早上再繼續，您覺得如何？

劉思遠先生：

（聽蘇菲亞提到時間，他看了一眼手錶，然後輕輕笑了。那笑容在他分享了許多心事後，顯得輕鬆了些。）

噢，是嗎？已經過中午了？（他輕輕搖頭，像是不曾留意）。我們談話的時候，時間過得真快。確實，當人能敞開心扉，說出積壓已久的心事時，往往會忘記時間。

（他點了點頭。）

您說得對，蘇菲亞。「不切實際」、「擅長理論卻缺乏政治敏感度」……如果他們有機會聽到，那或許就是他們會給出的評價。而且，從那些掌握權力並只關心如何不惜一切代價維繫權力的人的角度來看，他們或許也不完全是錯的。

(他帶著感激的神情看著蘇菲亞。)

感謝您整個上午都耐心聽我說。說真的，我感覺輕鬆多了。有些事，如果總壓在心裡，會變成無法承受的重擔。

先在這裡暫停，明天早上再繼續，是個很好的主意。我也需要點時間沉澱一下，或許您也需要休息。畢竟，這些故事，並不是那麼容易聆聽和消化的。

(他從容地站起身。)

那麼，我們明天早上八點，還是在這裡見，好嗎？我會準備一壺新茶的。希望明天，我們也能有像今天這樣有效率的分享。

再次感謝您，蘇菲亞。感謝您的到來，而更重要的，是感謝您用心傾聽。

蘇菲亞·貝爾：

好的，明天早上見……

還有另外一點想聽聽您的意見：在我們 THE EPOCH MEDIA 的記者團隊裡，我有一位同事名叫朱利安·李 (Julian Lee)，他是一位專門研究政治、哲學和領導人思想等議題的記者……因為您本是哲學教授，後來又在中共政府內從事政策與路線的相關工作，而現在您的人生觀又有了更廣闊的啟迪……所以我突然想到，或許可以請朱利安·李先生明天早上和我一起來，繼續與您對談，不知道這樣是否合適？

劉思遠先生：

(聽了蘇菲亞的提議，他有些驚訝，眉頭輕輕一蹙。他沉默片刻，看著蘇菲亞，眼神轉為思索。)

另一位記者，專攻政治、哲學和領導人思想……他的名字是朱利安·李，是嗎？(他重複道，像在記下與權衡。)

這是一個有些突然的提議，蘇菲亞小姐。您知道，我們的分享帶有很強的個人色彩，包含了我努力埋藏了很久的經歷與痛苦。對一個人敞開心扉，對我來說已是不小的努力。

(他停頓下來，看著桌上那杯已涼的茶。)

然而，我也明白您的意思。我的過去，我的思索，或許也觸及了朱利-安·李先生所關心的領域。一位在哲學與思想領域有深厚專業的人，或許能提出更銳利的問題，幫助我們挖掘一些可能尚未觸及的層面，或者讓我對意識形態、對我認知轉變的分析，能更清晰、更有條理地呈現給讀者。

(他抬起頭，帶著一絲探詢的目光看著蘇菲亞。)

如果這位朱利安·李先生，真的像您一樣，對這個故事懷有一份善意、理解與尊重……那麼我想，我可以考慮。

我不怕面對尖銳的問題，小姐。我最關心的是這次分享的真實性與其良善的初衷。如果他是懷著那樣的精神而來，那麼他的出席或許是件好事。

您能再多和我談談這位朱利-安·李先生嗎？關於他的工作方式，或者如果方便的話，他的一些代表作品？不過，無論如何，我相信您的介紹與判斷，蘇菲亞。您最清楚這個故事的性質，以及我們正在努力實現的目標。

所以，如果您覺得這是應該做的，我願意明天早上與你們兩位對談。

蘇菲亞·貝爾：

是的，我明白，像這樣的建議，即便真是金科玉律，在中共領導人的眼中，也只不過是一個擅長理論卻缺乏足夠「政治敏感度」的人，所說的「不切實際」之言……

劉先生，很抱歉，我們的分享已經超過中午 12 點了……或許我們先暫停，明天早上再繼續，您覺得如何？

劉思遠先生：

（聽蘇菲亞提到時間，他看了一眼手錶，然後輕輕笑了。那笑容在他分享了許多心事後，顯得輕鬆了些。）

噢，是嗎？已經過中午了？（他輕輕搖頭，像是不曾留意）。我們談話的時候，時間過得真快。確實，當人能敞開心扉，說出積壓已久的心事時，往往會忘記時間。

（他點了點頭。）

您說得對，蘇菲亞。「不切實際」、「擅長理論卻缺乏政治敏感度」……如果他們有機會聽到，那或許就是他們會給出的評價。而且，從那些掌握權力並只關心如何不惜一切代價維繫權力的人的角度來看，他們或許也不完全是錯的。

(他帶著感激的神情看著蘇菲亞。)

感謝您整個上午都耐心聽我說。說真的，我感覺輕鬆多了。有些事，如果總壓在心裡，會變成無法承受的重擔。

先在這裡暫停，明天早上再繼續，是個很好的主意。我也需要點時間沉澱一下，或許您也需要休息。畢竟，這些故事，並不是那麼容易聆聽和消化的。

(他從容地站起身。)

那麼，我們明天早上八點，還是在這裡見，好嗎？我會準備一壺新茶的。希望明天，我們也能有像今天這樣有效率的分享。

再次感謝您，蘇菲亞。感謝您的到來，而更重要的，是感謝您用心傾聽。

蘇菲亞·貝爾：

是的，我明白，劉先生……您透過我這座小橋，與 THE EPOCH MEDIA 讀者所做的分享，本質上是個人的，是關

於那些已發生的痛心之事、關於中共的邪惡，以及關於法輪功之美好的肺腑之言……

我想，明天上午我們可以再花點時間，將上述內容的某些層面闡述得更清晰、更生動些……之後，我的想法是，希望您能進一步分享關於中華未來之路的看法，這是您窮盡畢生心血研究的課題，而如今，在您走入修煉、得到法理之光的照耀後，我相信您的世界觀已有了更廣闊的啟迪……這也正是我聯想到朱利安·李的原因，因為我看到了你們兩位在為人、思想以及所關心的領域上，有著一種同頻。我的想法很單純，只是想作為一座小橋，為兩位同心、且是真正意義上的「同志」之人牽線搭橋……

劉思遠先生：

（聽著蘇菲亞的解釋與想法，他的神情逐漸舒展開來，一抹帶着理解與珍視的淺笑浮現。他輕輕點頭。）

是的，蘇菲亞小姐，您非常準確地掌握了我希望能分享的精神。我今天坐在這裡的目的，的確是為了說出我們所經歷的苦難真相，說出中共邪惡的本質，同時，也為了讓世界能更了解法輪功的美好與純正——那也是我的女兒和千千萬萬人所堅定守護的。

我們明天上午再花些時間，把已分享的內容闡述得更清晰，這是非常有必要的。我希望能確保那些最重要的訊息，能盡可能清晰、生動地傳達出去。

(他稍作停頓，帶著思量的目光看著蘇菲亞。)

至於您提議邀請朱利安·李先生在後續部分，也就是當我們探討中華未來之路時加入……(他重複道，語氣沉吟)。這確實是我傾注了畢生心血去思索的課題，從年輕的研究員時代，到踏入政壇，乃至今日，當我從法理中有所領悟後，我的視角已有了過去絕不可能有的改變與啟迪。

如果這位朱利安·李先生，真是一位懷有同樣憂思、同樣渴望為未來尋找出路的人，並且能與我在更深的層次上探討這些問題——不僅是單純的政治、經濟分析，更能觸及道德、心靈層面，以及傳統價值的復興——那麼我認為，他的出席或許能帶來一定的價值。

您說您看到了「同頻」，並想為「同心」、真正意義上的「同志」牽線搭橋……(提到「同志」這個在家鄉已被過度染色的詞時，一絲苦笑掠過他的臉龐)。我明白您的意思。在一個充斥着虛偽與私利的世界裡，能找到真正志同道合、懷着一顆向善之心、為人類福祉而期盼的人，是極其珍貴的。

那麼，蘇菲亞小姐，我同意您的提議。我們明天上午的前半段，先繼續釐清今天未完的部分。之後，如果您覺得合適，我願意與朱利安·李先生見面，就我們共同關心的問題進行交流。或許，在您的引導下，與一位像朱利安·李先生這樣「同頻」的人對話，能為我們彼此，也為讀者，帶來一些有趣而深刻的見解。

我相信您的安排與善意。

蘇菲亞·貝爾：

好的，那麼，劉先生，明天早上見！

劉思遠先生：

（他笑了，一個比訪談開始時真誠、輕鬆了許多的笑容。他點點頭。）

好的，蘇菲亞小姐。明天早上見。非常感謝您，這是一個充滿意義的上午。

（他送蘇菲亞到門口，眼神中仍帶着一絲憂思，卻已然閃爍著新的希望之光。）

第二天

[場景：次日早晨，依然是在劉思遠先生家那間溫馨的客廳裡。劉先生已泡好一壺新茶，茶香裊裊。蘇菲亞·貝爾先到，片刻之後，朱利安·李也抵達了。劉先生親自到門口迎接，禮貌地與朱利安握手，但依舊保持著他慣有的沉思神情。]

蘇菲亞·貝爾：

劉先生，早安。感謝您繼續為這次重要的分享撥冗。

劉先生，如我們昨天所說好的，今天將有我的同事，朱利安·李先生，一同參與。他是 THE EPOCH MEDIA 裡深入研究政治與人權議題的記者。

朱利安先生，這位就是我跟您提過的劉思遠先生。

劉思遠先生：

(劉先生的氣色比昨天好了一些，但仍舊帶著一絲憂思)

蘇菲亞小姐，早安。朱利安先生，早安。請進，兩位。我已經泡好茶了。

(三人在客廳坐下。劉先生為客人倒茶。)

朱利安·李：

(我，以朱利安的口吻，禮貌而專業地)

感謝劉先生的招待。您的居所真是寧靜而溫馨。蘇菲亞已和我分享了許多您昨天的談話內容，我真的很期待能聆聽您今天的分享。

蘇菲亞·貝爾：

昨天，我聆聽了您作為一名活生生的見證人，以一位父親、一個男人，以及一名前中共官員的心態，所分享的故事……

我也了解到，您已走入法輪功修煉，至今大概有一年半到兩年左右的時間了……因為，據我所知，對於修煉人來說，他們看待生活與事物，往往既平和淡然，又深刻透徹……

因此我想提議，在今天的分享中，我們是否能聆聽您以一位修煉人的心態來分享，您覺得如何？

劉思遠先生：

（劉先生聽了蘇菲亞的提議，輕輕點頭，一抹平和而淡然的微笑浮現在他唇邊）

蘇菲亞小姐，這是一個非常有趣且深刻的提議。您說得對，當一個人走入真正的修煉之路後，他的世界觀、人生觀都會發生巨大的變化。看待事物的方式、面對人生起落的方式，也會變得截然不同。

（他稍作停頓，目光望向窗外那灑落的晨光，然後轉回，看著蘇菲亞與朱利安。）

是的，在我經歷了人生的巨大變故後，確實有緣走入了法輪功的修煉。時間雖不算太長，如您所說的大約近兩年，但我從這部法中所學到、所感受到的，已真正從根本上改變了我。

以前，我雖然是個知識份子，一個從事思想工作的人，但我依然是基於常人的理論，基於世間的得失與輸贏來看待一切。遇到不順心的事，容易陷入怨恨、痛苦與絕望。稍有成就，又容易產生自滿之心，看不起別人。

但自從修煉後，我逐漸學會了用一顆更寬廣、更平和的心去看待一切。我明白了，人生中發生的任何事，都有其因緣，沒有什麼是偶然的。我所經歷的苦難，儘管無比痛苦，但那也正是我反觀自身、洗淨錯誤觀念、得以如您所說的「覺醒」的機會。

我學會了向內找，也就是遇到問題時，不怨天尤人，而是首先看看自己有什麼不對的地方，有什麼不好的心需要去掉。這幫助我在風浪面前保持平靜，也幫助我自身日益歸正。

法輪功所教導的「真、善、忍」法理，已成為我所有思想與行為的指南。說真話、與人為善、在逆境中能忍——這些看似簡單，實則無比深刻且不易做到的事。

(他輕輕一笑。)

所以，蘇菲亞小姐，朱利安先生，我非常願意以一位修煉人的心態來與兩位分享。或許，當我們用這個視角來重新審視發生在我自己、我的家庭，乃至國家那些重大問題時，我們會有一些新的理解與更深的感悟。

我會盡力用我的真誠與從法中所悟到的，來進行分享。請您儘管提問。

蘇菲亞·貝爾：

是的，透過昨天的分享，我聽您談及了關於您女兒那令人心碎的故事、關於對法輪功的迫害、關於您的道路與事業，以及那薄情險惡的官場……

我能感受到，從一位修煉人的心態出發，提及這些，並非為了一個不幸之人尋求他人安慰的呻吟……而是為了捍衛正義、揭露邪惡、頌揚善良而發出的聲音……

劉思遠先生：

(劉先生眼神平和，卻蘊含著一種堅定)

蘇菲亞小姐，您說出了我內心真實的想法。的確，當我決定坐在這裡，分享這些故事時，並非為了訴說個人的不幸，或尋求同情與安慰。那些，對一個修煉人來說，已不再是主要的目的了。

（他稍作停頓，真誠地直視蘇菲亞與朱利安。）

當一個人走入修煉之路，特別是修煉「真、善、忍」大法之後，他會明白，自己所承受的苦難與不公，無論多麼痛苦，那也是錘鍊心性、償還過去所欠下的業債、並提升自己境界的過程。怨天尤人，只會增加業力，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因此，當我重述安然的故事時，失去女兒的痛楚依然存在，無法抹去。但如今，我看待它，已不僅僅是我個人家庭的悲劇。我的女兒，以及千千萬萬的法輪功學員，他們是一場基於謊言與仇恨的、殘暴而非正義的迫害的受害者。他們被迫害，只因堅守對美好價值、「真、善、忍」的信念。

所以，我說出真相，並非為了「訴苦」，而是為了：

第一，揭露這場迫害以及中國共產黨的邪惡本質：我希望世界能更清楚地了解他們已經和正在犯下的罪行，從造謠

誣陷，到酷刑、虐殺，乃至駭人聽聞的活摘器官罪行。一個建立在暴力與謊言之上的政權，不可能長久。

第二，捍衛公理與真相：真相需要被世人知曉。必須為那些承受了太多苦難的無辜者討回公道。在邪惡面前保持沉默，就是與之為伍。

第三，頌揚法輪功修煉者的美好與堅定：我希望大家能看到，在黑暗與殘暴之中，依然有這樣一群人，堅韌地守護著他們對良善價值的信仰。他們展現出的非凡的忍耐、慈悲與堅定，是任何暴力都無法摧毀的。那也正是法輪大法、真正的修煉者的美好之所在。

第四，喚醒人們的良知：我希望，透過我的故事，透過我所見證的一切，能有更多的人，無論在中國還是在海外，能重新審視、重新思考，不再被那些歪曲的宣傳所欺騙。每個人內心的良知與善念都無比珍貴，需要被喚醒。

（他輕輕一笑，一個平和卻充滿力量的笑容。）

從一個修煉人的角度，我理解，揭露邪惡，並非為了散播仇恨，而是為了幫助人們明辨是非，從而能選擇站在善良的一方。這也是慈悲的一種體現。

所以，蘇菲亞小姐，朱利安先生，我非常願意以這樣的心態，繼續分享。希望我所說的，能對澄清真相、捍衛美好價值，有所裨益，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一點點。

蘇菲亞·貝爾：

是的，感謝劉先生……

還有……關於朱利安先生……作為同事，我知道您不僅熱衷於研究哲學、領導人思想、國家政策或體制……您還勤於閱讀各宗教的經典，而且我也知道您也喜歡閱讀法輪功的書籍，並對法輪功抱有許多好感……那麼，您是否也同意以一位求道者或從宗教的視角，來參與今天的分享？

朱利安·李：

（朱利安起初對蘇菲亞提及他閱讀法輪功書籍一事略感驚訝，但很快便轉為坦誠與真摯的神情）

感謝蘇菲亞的介紹。是的，除了作為一名專注於政治與人權議題的記者工作外，我個人也對哲學問題、思想體系，特別是精神與宗教價值在形塑社會及人類行為中的角色，有著深厚的興趣。

(他稍作停頓，帶著淺淺的微笑望向劉先生。)

在我的探索過程中，我閱讀了世界上許多主要宗教的經典。也正如蘇菲亞所說，我確實有機會閱讀法輪功的書籍，包括《轉法輪》。書中的內容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真心對法輪功所倡導的原則與價值抱有許多好感。

我發現，在最深的層次上，許多正統的宗教與修煉法門，都引導人走向善良的價值，走向自身的完善，並尋求超越日常物質憂慮的、更深遠的生命意義。

(朱利安用嚴肅的神情看著蘇菲亞與劉先生。)

因此，蘇菲亞小姐，劉先生，我完全同意，並非常樂意不僅以一名記者的身份，更以一位正在探尋「道」的旅程上、一位珍視精神價值並渴望探索我們所討論的事件與問題之更深層意義的心態，來參與今天的分享。

我相信，當我們不僅能從政治、社會的角度，更能從普世原則、道德價值的角度來看待問題時，我們的對話將會更加豐富且有深度。

能聆聽劉先生——一位有著極其特殊之親身經歷、如今又走在修煉道路上的人——以那樣的視角來分享，對我來說

是一個非常寶貴的機會。我也希望能從一個正在了解並珍視這些價值的人的角度，貢獻我的思考與提問。

感謝兩位。我已經準備好了。

蘇菲亞·貝爾：

好的，感謝兩位……那麼我們就正式開始第二次的分享……

是的，我想先從中共的邪惡這個主題開始……如果我們回顧歷史，我們會看到中共曾犯下的種種駭人之事……離我們最近的，便是 1989 年的天安門事件，以及從 1999 年至今對法輪功的迫害……

能否請兩位從觀察者的視角，簡要分享一下對這兩起事件的感想？首先請劉先生……

劉思遠先生：

（劉先生聽了蘇菲亞的問題，臉上掠過一絲憂傷與沉思。他凝視著面前的茶杯許久，才開口說話，聲音帶著記憶與感悟的重量）

蘇菲亞小姐，朱利安先生，是的，回顧起來，這兩起事件都是悲慘的里程碑。

關於 1989 年的天安門事件，當時我是大學二或三年級的學生，主修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在那之前不久，20 歲時，我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對當時像我這樣一個在黨的教育與引導下長大、將能躋身黨的行列視為巨大榮耀與肯定的年輕人來說，我的思想完全信賴黨的領導，信賴國家正在走的社會主義道路。

正因如此，當學生運動爆發時，以我一名年輕黨員、一個相信穩定與黨的領導角色之人的立場，我主要透過官方渠道接收資訊。我們所聽到的，是一小撮學生被「煽動」，提出了「不當」的訴求，製造「暴亂」，影響了「社會穩定」。

坦白說，我當時完全不清楚大多數學生訴求的真正本質，也無法想像所發生事件的嚴重程度。關於軍隊被調動的消息，我也只是單純地理解為那是「維持秩序」、「保衛革命成果」的必要措施。那些傷亡的畫面與數字……幾乎完全沒有以客觀、完整的方式傳到我們這裡。一切都被描述為政府為「平息暴亂」而採取的「果斷」行動。

後來，當我畢業、成為講師，再到踏入政壇，天安門事件幾乎成了一個禁忌話題，不被允許公開討論。即便我已是一名省級官員，關於那起事件詳細、多維度的資訊，依然超出我的認知範圍。

直到後來，我到了美國，有機會接觸到自由的資訊、未經審查的歷史資料，以及許多見證人的口述……我才真正地驚覺在天安門所發生事件的規模與殘暴。那時，我才理解那些失去親人、那些被迫流亡的人們的痛苦與憤慨。我也為自己長久以來的無知與冷漠感到羞愧，儘管那或許完全是我個人的錯，而是一個封鎖資訊的體制以及年輕時幾近盲目的信任所造成的後果。

至於從 1999 年開始對法輪功的迫害，如我所分享的，我的認知過程也經歷了類似的階段：從相信單向的宣傳，到漠不關心，再到悲劇降臨家庭時的初步懷疑，並最終在親自了解與走入修煉後徹底「覺醒」。

與天安門事件相比，對法輪功的迫害或許被掩蓋得更為精巧，雖是暗中進行，卻在更廣泛的規模上極其殘酷且系統化。也正因如此，許多人，即便在中國國內，也完全不知道或不相信正在發生的罪行，特別是活摘器官的暴行。

這兩起事件，對現在的我來說，都是清晰的明證，證明了一個獨裁政權可以如何控制資訊、扭曲真相，並犯下駭人聽聞的罪行而未受應有的懲罰，至少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是如此。這也凸顯了尋求真相、傾聽不同聲音的重要性，而這正是我在人生大半輩子裡，直到為時已晚才學會去做的事。

這就是我的感想，小姐，當我從一個曾身處資訊「迷霧」之中、並對黨懷有極大初始信任的人的角度，回顧這兩起事件時。

蘇菲亞·貝爾：

好的，那麼朱利安先生，請您分享。

朱利安·李：

（朱利安眼神專注地聆聽著劉先生，在蘇菲亞邀請他分享時，他輕輕點頭。他清了清嗓子，坐姿挺直而專業）

感謝蘇菲亞小姐，也感謝劉先生非常真實與深刻的分享。從一名記者的角度，一個多年來觀察中國政治與社會演變的人的角度，我對這兩起事件也有一些感想，或許能補充幾個層面。

關於 1989 年的天安門事件，對國際社會與研究界而言，這通常被視為一個黑暗的轉捩點，它揭露了中國共產黨在面對其絕對權力受到挑戰時的真面目。天安門事件有以下幾個主要特點：

第一，經過精心算計的殘暴行徑：那場鎮壓不僅僅是偶發的反應，而帶有高層領導經過深思熟慮後所做決策的跡象，其目的是徹底撲滅民主運動，並向未來任何有類似意圖的人發出強烈的威懾訊息。它表明，對中共而言，「穩定」（按他們的理解，即不惜一切代價維護政權）比人民的生命與願望更重要。

第二，資訊封鎖與歪曲宣傳：事件發生後，中國的宣傳機器便全力開動，扭曲真相，將和平的示威者誣衊為「暴徒」、「反革命」，並掩蓋真實的傷亡數字。正如劉先生剛才所分享的，這不僅在一段時間內成功欺騙了國內輿論，甚至也矇騙了一部分國際輿論。這也是獨裁政權如何控制資訊流的一個典型案例。

第三，長遠的後果：天安門事件不僅撲滅了中國民主運動多年的火種，也造就了日後一代更為警惕、對任何異議跡象都更為強硬的領導層。它也使得許多有改革思想的知識份子，不得不沉默或遠走他鄉。

對於從 1999 年開始對法輪功的迫害，我認為這是一場針對一個基於信仰的和平群體，在精神上，乃至肉體上，帶有滅絕性質的、系統性的大規模運動。這場迫害有以下幾個主要特點：

第一，該政權的非理性恐懼：法輪功的迅速發展，全國有數千萬人修煉，以及其「真、善、忍」的道德價值體系（這本不與任何良善的政權相衝突），卻被中共（特別是當時的江澤民）視為意識形態上的威脅。他們害怕一個獨立於黨控制之外的精神力量，可能會削弱其意識形態的根基。

第二，動用整個國家機器來進行鎮壓：中共動員了整個國家機器，從公安、法院、監獄，到媒體機構、群眾組織，來執行這場迫害。成立凌駕於法律之上的專職機構「610 辦公室」，來指揮並實施迫害，這本身就顯示了其嚴重程度與對法律的蔑視。

第三，仇恨宣傳與對受害者的「非人化」對待：最殘酷的手段之一，便是利用媒體抹黑、誣陷法輪功，在民眾中煽動對學員的恐懼與仇恨。將受害者「非人化」（如稱其為「邪教」、甚至「不是人」），為酷刑、虐殺等行為的發生創造了條件，使其較少受到社會良知的阻礙。這是種族滅絕政權的典型伎倆。

第四，反人類罪：關於酷刑、非法監禁，特別是我們已提及並將深入討論的、從活著的法輪功學員身上摘取器官的罪行，相關證據已超越了所有罪惡的底線。這已不再是中國的內政問題，而是反人類罪，需要國際社會的譴責與干預。

我認為，這兩起事件都展現了中共一貫的行為模式：當其感到受挑戰，或出現某個其無法控制的因素時，便會毫不猶豫地使用暴力與謊言來予以消滅。差別或許只在於掩蓋手法的精巧程度與殘暴的規模。

也正如劉先生所說的非常正確，資訊控制是他們極其有效的工具。它不僅欺騙國內民眾，也讓外部世界難以接觸真相，難以做出及時、強有力的反應。這也正是為什麼，獨立記者、敢於說出真相的人們，他們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

蘇菲亞·貝爾：

那麼，兩位是否注意到，這兩起駭人聽聞的事件，都與某個人有關？

劉思遠先生：

(劉先生聽了蘇菲亞的問題，眉頭輕輕一蹙，一絲銳利的目光閃過。他沉默片刻，像在思量著什麼，然後緩緩點頭)

蘇菲亞小姐，您的問題非常直接，也觸及了一個或許許多人都曾想過的點。當我們回顧這兩起事件的歷史時，確實，有些關鍵性的決策與印記，似乎都與權力高層的某個特定個人，有著密切的關聯。

關於 1989 年的天安門事件，鄧小平在做出使用武力的最終決定上所扮演的角色，已被許多歷史分析家提及。然而，直接的受益者，並在事件後被推上總書記位置的人，如我們所知，正是江澤民。可以說，天安門事件為他登上了權力之巔鋪平了道路。

然後，十年後的 1999 年，正是江澤民，以黨、政、軍最高領導人的身份，不顧政治局其他許多人的反對，單方面發動並指揮了對法輪功的殘酷迫害。他成立了「610 辦公室」這個擁有無限權力的特別機構，來執行這場運動。

從一名觀察者，以及後來一名真相探尋者的角度，我看到了一種無法否認的關聯。似乎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恐懼、一種妒忌，以及一種鞏固絕對權力的渴望，在驅動著那些決定。

在天安門事件中，或許是整整一代舊領導層對失控風險的恐懼，而江澤民抓住了那個機會。

在對法輪功的迫害中，許多分析指出，那是江澤民個人對法輪功的迅速發展與聲望的妒忌，以及他害怕一個基於「真、善、忍」的價值體系，可能會使黨的意識形態黯然失色。他利用這場迫害來考驗官員的忠誠度，鞏固自己的派系，並製造一個「敵人」，以轉移公眾對其他內部問題的注意力。

無論具體動機為何，很明顯，在一個缺乏權力制衡機制的體制中，一個獨裁領導人的個人決定，可以為整個民族帶來災難性的後果。歷史已多次證明這一點。

朱利安·李：

（朱利安點頭同意劉先生的分析，然後以更銳利的口吻補充道）

劉先生的分析非常準確。從新聞與政治研究的角度，江澤民在這兩起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儘管直接程度不同，卻是無法忽略的。

關於天安門事件：如劉先生所說，江是最大的政治受益者。他被選中以取代對學生持溫和態度的趙紫陽，這本身就顯

示了江與黨內保守派在事件後所期望的強硬路線的「契合度」。這也塑造了他日後的領導風格。

關於 1999 年迫害法輪功：這顯然是一個帶有濃厚江澤民個人印記的決定。許多內部消息與國際分析家都指出，江當時面臨著來自政治局常委會其他委員的不贊同，甚至是暗中反對，他們認為鎮壓一個龐大的和平民眾群體既無必要，也可能引發不穩。然而，江動用了個人權威、在軍隊與安全系統中的影響力，並煽動「亡黨」恐懼，來強行貫徹自己的意志。

那句據傳是江所說的「我就不信共產黨戰勝不了法輪功」，便清晰地展現了他的好鬥與對權力的偏執。

發動這場迫害，也被視為江澤民樹立個人政治「遺產」、在交權前鞏固權力並安插親信的一種方式。

一個個人，特別是一位擁有最高權力的領導人，與這類造成嚴重後果的轉折性決策的關聯，是獨裁體制中常見的特徵。它凸顯了將權力集中於一人或一小撮人之手，而缺乏監督、缺乏制衡與反對機制的危險性。

當一個人可以將自己的主觀意志凌駕於國家利益、凌駕於人民的生命與自由之上時，像天安門事件或對法輪功的迫

害這樣的悲劇，便是難以避免的。而澄清這些個人的角色與責任，也是尋求歷史正義的重要一環。

蘇菲亞·貝爾：

是的，兩位提到江澤民是天安門事件後最大的受益者，但讓他受益的原因是什麼？鄧小平又為何選擇了他？

劉思遠先生：

(劉先生輕輕點頭，眼神流露出對過往那複雜權力算計的思索)

蘇菲亞小姐，這是一個深入探討當時中國高層政治動態的問題，一個或許連當事人都會有不同解讀的問題。不過，根據後來公開的資訊以及學界的分析，我們大致可以描繪出原因。

是的，江澤民是天安門事件後最大的受益者。他從上海市委書記的位置，被鄧小平及其他元老選中，以取代因對學生運動持同情與溫和態度而失勢的趙紫陽。

那麼，為什麼是江澤民？

第一，在上海對學生運動的強硬態度：這或許是最關鍵的因素。當北京的局勢非常緊張時，在上海，江澤民在控制局勢上展現了堅決且手段上更高明一些的態度。他下令查封了有改革傾向並支持學生的《世界經濟導報》，同時也採取措施阻止了示威活動的擴大，而沒有造成像北京那樣的大規模流血（至少在屠殺發生之前是如此）。

江的這一舉動，據說讓鄧小平及黨內強硬派元老感到滿意。他們在江的身上，看到了一個有能力「維持穩定」的人，一個在捍衛黨的權力上不會猶豫的人，而這正是他們認為趙紫陽所未能展現的。

第二，相對「清白」且較少捲入中央派系鬥爭的履歷：與在北京的其他潛在候選人相比，江澤民當時被認為較少捲入中央複雜的派系鬥爭。這或許讓他成了一個更「安全」的選擇，一個在危機後能夠調和不同派系的人。

第三，經濟管理經驗：儘管江並非傑出的經濟改革家，但他也具備管理像上海這樣一個大經濟中心的經驗。在中國經歷政治動盪後仍需繼續經濟改革的背景下，這一因素也可能被納入考量。

第四，元老們的支持：最終的決定權仍在鄧小平及一小撮元老手中。他們需要一個既能確保政治上走強硬路線的穩

定，又能繼續鄧所開啟的經濟改革事業的人。江澤民在上海的表現，在他們眼中，似乎滿足了這些要求。

總而言之，我認為，江澤民之所以被選中，是多種因素結合的結果，但他在處理上海局勢時的堅決態度，特別是果斷處理自由派報刊和控制示威的行為，正是鄧小平及強硬派眼中最大的「加分項」。他們需要一個立場堅定、為捍衛黨的專制權力而願意使用強硬手段的接班人，而江澤民證明了這一點。

朱利安·李：

（朱利安點頭，補充了分析性的視角）

劉先生已非常完整地分析了主要因素。我僅從政治觀察的角度，再強調幾點。

第一，趙紫陽的倒台創造了權力真空：趙紫陽因在處理示威問題上意見不合而被罷黜，這在最高領導層造成了權力真空。鄧小平需要迅速找到替代者以穩定局勢並展現控制力。

第二，江澤民是「鄧的人」：儘管江並非鄧最核心的親信，但他被認為是忠於鄧的路線的人，特別是在維持黨的領導

同時推動經濟改革這一點上。江在上海的強硬態度，更鞏固了這一信任。

第三，上海的「忠誠度測試」：江處理《世界經濟導報》與上海示威的方式，被視為一場對其忠誠度與控局能力的「測試」。江在此事上遵循了中央領導的意圖，不顧知識界的負面反應，這表明他是個「聽話」且願意執行艱難命令的人。

第四，比其他候選人更少「帶刺」：當時政治局中的其他一些人物，可能野心更大或派系更強，這或許會讓鄧及元老們對日後的內部穩定感到擔憂。江澤民在某種程度上，在當時的黨內，似乎是一個爭議較小的選擇。

因此，江澤民被選中不僅是個人運氣，也是中共在危機時期一系列複雜政治算計的結果。也正如劉先生所說，他在上海的「果斷」，正是決定性的因素，表明他是鄧小平可以信賴的、能守住黨的「堡壘」的人。

蘇菲亞·貝爾：

我通常不願在我的寫作或書籍中點名批評任何個人……但我為何會提到江澤民？……因為從我個人的視角，我察覺到他正是邪惡的代表！

劉思遠先生：

(劉先生聽了蘇菲亞的話，緩緩點頭，眼神中閃過一絲認同，卻也帶著幾分沉思)

蘇菲亞小姐，我理解您不願在作品中點名批評個人的顧慮。這是一位新聞工作者、寫作者審慎和專業的態度。然而，當我們面對系統性的罪惡與悲劇時，若想探究真相的根源，釐清那些決策者、那些最高層的責任，有時是無法迴避的。

您說，從您的個人視角，您認為江澤民是「邪惡的代表」……(他停頓，思索)。這是一個非常強烈的論斷，而我可以理解您為何會有這樣的感受，特別是在看待對法輪功的迫害時。

對我而言，一個曾身在體制之內，後來又成為間接受害者，如今又成為真相探尋者的人，我也認為，江澤民時代的決策與行徑，特別是關乎對法輪功的迫害，帶有一種極其黑暗與殘暴的色彩。

第一，個人的妒嫉與恐懼：許多分析指出，江澤民決意消滅法輪功，源於他個人對李洪志師父日益增長的聲望與影響力的妒嫉，以及他害怕一個基於「真、善、忍」的道德價值體系，可能會削弱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基礎，進而削弱他的絕對權力。這不是為國為民的擔憂，而是為個人與派系權力的擔憂。

第二，罔顧法律與集體意見：他無視政治局其他多位成員的不贊同，成立凌駕於法律之上的「610 辦公室」，這本身就展現了極致的專權與獨裁。

第三，煽動仇恨並殘酷地運用宣傳機器：在他指揮下的宣傳機器，用以抹黑、誣陷法輪功，在民眾中散播恐懼與仇恨的方式，是將媒體用作犯罪工具的典型例子。

第四，「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截斷，肉體上消滅」的政策：這項據信源自江澤民指令的滅絕性政策，導致了無數的悲劇，從酷刑、虐殺，到活摘器官的罪行。它展現了一種毫無底線的殘忍。

當一個人，手握大權，僅僅出於自私的個人動機，就能給數千萬人帶來苦難，摧毀美好的道德價值，並為整個民族製造一道無法癒合的傷口時，將其視為「邪惡的代表」，並非沒有根據。

然而，從一個修煉人的角度，我也理解，邪惡不僅僅存在於某個個人身上。江澤民或許是發起者，是主要責任人，但那罪惡也是由一整個體制、由無數其他人共同執行的，從那些阿諛奉承之徒，到那些盲目執行命令的人，再到那些沉默的同謀。

而追根究底，那邪惡也是整個社會道德淪喪、低下的慾望戰勝一切、良善價值被遺忘的表現。

因此，指出江澤民的角色，對於釐清歷史責任是必要的，但同時也需要認識到，邪惡之所以能如此猖獗，需要有滋養它的「土壤」。而改變那片「土壤」，重建道德價值，才是根本的解決之道。

朱利安·李：

（朱利安在劉先生說完後點頭，然後以分析的口吻接話）

我同意劉先生剛才提出的觀點。蘇菲亞小姐感覺江澤民像「邪惡的代表」，這是一種非常容易理解的情感，特別是當面對法輪功受迫害的規模與性質時。

在政治學與對獨裁政權的研究中，我們時常看到「強人」或「最高領導人」在形塑政策與引發巨變上，扮演著至關

重要的角色。江澤民，在迫害法輪功一案中，其行為舉止正是一個典型的「強人」：

第一，集中權力：他鞏固個人權力，並用其將個人意志強加於全黨，不顧不同意見。

第二，製造敵人：「發現」或「製造」一個敵人（在此案中即法輪功），是鞏固權力、團結（即使是強迫的）內部、並轉移對其他問題之注意力的經典策略。

第三，動用國家暴力：他毫不猶豫地動用整個國家的暴力機器，來碾碎被其認定的「敵人」。

第四，隱性的個人崇拜：儘管不像毛時代那樣公開，但政策帶有強烈的個人印記，以及對領導人個人的忠誠度成為重要的衡量標準，也是一種表現。

然而，正如劉先生也已指出的，一個個人，無論權力多大，都無法獨自犯下如此大規模的罪行。它需要一整個體制的參與、共謀，或至少是沉默。該體制包括：

第一，官僚體系：命令的執行者。

第二，安全與軍事力量：暴力的工具。

第三，宣傳機器：洗腦與煽動仇恨的工具。

第四，公眾的冷漠或恐懼：這為邪惡的蔓延創造了條件。

因此，當我們說江澤民是「邪惡的代表」時，或許應該理解為，他是被獨裁政權所滋養和執行的一種「有組織的邪惡」、「系統性的邪惡」的化身，是其發起者和最高責任人。

記者、研究者，以及像劉先生這樣的見證人，敢於指出像江澤民這樣的具體個人的角色，是抵抗遺忘、要求問責的重要一步。這不僅僅是「個人批評」，而是對權力如何能被濫用以犯下滔天罪行，進行科學而負責任的分析。

蘇菲亞·貝爾：

談到中共通過迫害法輪功所展現的邪惡，從您的個人觀察以及您所知的獨立國際調查來看，您能否更清晰地分享，好讓讀者能更深入地了解？關於證據、數字，以及規模……

在美國或歐洲，按照常規，當一位病人需要器官移植時，通常需要等待數月甚至數年，醫院才能找到合適的捐贈器

官……但我聽說，在中國，他們能在短短幾天內就為病人找到匹配的器官……這說明了什麼？

朱利安·李：

(朱利安的神情變得更加嚴肅，他拿出一個小筆記本和筆，像在整理重要的資訊)

蘇菲亞小姐，劉先生，您剛才提出的問題——中西方在器官移植等待時間上那令人難以置信的差異——正是最關鍵的間接證據之一，一個警示著中國器官移植產業正發生著極其不尋常和驚人事件的「紅色警訊」。

正如您所說的非常正確，在像美國或歐洲這些擁有基於自願、透明且受到嚴格管理的捐贈體系的已開發國家，等待一顆匹配的腎臟、肝臟或心臟，可能需要數月，甚至數年。這是因為與需求相比，捐贈的器官來源稀缺，且尋找醫學上相容的器官本身就很複雜。病人會被列入等待名單，而器官的分配則基於客觀的醫療標準。

那麼，為何在中國，人們可以「訂購」器官，並在短短幾天或幾週內就得到？

這說明了一個恐怖的事實：中國必然存在一個龐大的「活體器官庫」，其中的「供應者」是活生生的人，他們可以應需求而被殺害，以提供器官給病人。

為了讓讀者更清楚，我願引述一些我所研究過的獨立國際調查的要點，特別是來自大衛·喬高（David Kilgour）、大衛·麥塔斯（David Matas）和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的報告：

第一，關於中國器官移植產業的爆發性增長：

自 2000 年後，中國的器官移植手術數量呈爆炸式增長。中國迅速成為全球器官移植數量第二多的國家，僅次於美國。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爆發性增長，發生在中國完全沒有一個有效的公民自願捐贈體系的背景之下。按照傳統文化，中國人通常不願在死後捐贈器官。自願捐贈的數量微乎其微，根本無法支撐如此龐大的移植規模。

第二，關於無法解釋的「官方」器官來源：

起初，中國政府聲稱器官主要來自被處決的死刑犯。然而，死刑犯的數量（儘管依然很高）也遠遠無法解釋移植手術的數量。況且，使用死刑犯器官也違反了國際醫學倫理標準。

在國際壓力下，中國宣稱將建立自願捐贈體系，並逐步停

止使用死刑犯器官。但移植手術的數量依然居高不下，等待時間也短得令人起疑。

第三，關於短得不合常理的等待時間：

正如蘇菲亞小姐所提及的，這是最有力的證據之一。中國的醫院、宣傳器官移植旅遊的網站（在壓力下被移除前），都曾公開廣告說他們能在幾週，甚至幾天內就為病人找到匹配的器官。如果沒有一個龐大的囚犯庫——這些人預先被檢驗了血型和組織配型，隨時準備在有「訂單」時被殺害——這是絕不可能的。

有些醫院甚至可以預先安排器官移植手術的日期，這表明他們完全能主動控制器官的供應源。

第四，關於來自證人的證詞：

調查員們收集了來自醫生、護士（其中一些已逃往國外）、監獄看守，甚至曾赴中國移植器官的病人的證詞。他們的證詞揭示了一個組織嚴密的流程，從對囚犯（特別是法輪功學員）進行抽血檢驗，到挑選合適的「供體」，再到進行活摘手術，通常是在受害者依然活著或剛剛被致死時進行。

有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敘述，提到法輪功學員如何被酷刑折磨，被進行不正常的身體檢查（只專注於內臟器官的健康），然後就「失蹤」了。

第五，關於統計數據與邏輯分析：

調查員分析了數百家中國移植醫院的數據，將其病床數、醫生數、公開的手術案例數（儘管常被隱瞞）與來自合法渠道的器官數量進行比對。差異是巨大的，每年有多達數萬例的移植手術無法解釋其器官來源。

伊森·葛特曼在他的著作《屠殺》（The Slaughter）中估計，在 2000 至 2008 年間，約有六萬五千名法輪功學員可能已被為摘取器官而被殺害。後來的報告更更新說，這個數字可能高出許多。

第六，關於時間上的巧合：

中國器官移植產業的爆發（2000 年後），與法輪功迫害的開始（1999 年 7 月）以及大量法輪功學員被逮捕、關押在全國各地的監獄和勞教所的時間點，有著驚人的一致。他們成了一個龐大、健康（因不抽煙、不喝酒且煉習氣功）且不受法律保護的「器官來源庫」。

將所有這些因素拼湊在一起，便勾勒出一幅恐怖的圖景：中國共產黨，為了牟利並消滅一個被其視為「敵人」的群體，縱容，甚至主導了從良心犯身上活體摘取器官的產業，而其主要與最早的受害者，便是法輪功學員。

蘇菲亞小姐，在中國等待器官的時間如此之短，並非他們試圖宣傳的「醫學成就」，那本身就是一項指控著一樁反

人類罪行正在發生的證據。它顯示了對人生命的極度漠視，將人變成了服務於他人利益的「零件庫」。

劉思遠先生：

(劉先生聽著朱利安的話，臉色愈發沉重，他輕輕點頭，聲音有些顫抖)

朱利安先生，您剛才所陳述的……它將我後來模糊感覺到、並痛苦得知的那些事，系統化並釐清了許多。當安然……當她被帶走，後來我知道了真相時，我也曾自問，他們為何能如此迅速地做到，為何會有那麼大的「需求」。

您提出的數字與分析，顯示了這並非幾個喪失人性的個人的偶發行為，而是一整個被精密組織起來的罪惡體系。所謂中國「短暫的器官等待時間」，對現在的我來說，就等同於有無數無辜的生命，已按「訂單」被冤屈地剝奪了。

這也解釋了為何當局要極力掩蓋資訊，為何他們要拒絕真正獨立的國際調查。因為真相太過恐怖，如果完全被揭露，那將是對他們一項無法抵賴的良心審判。

我……我真的不知該再說些什麼。只感到痛苦與憤慨與日俱增。感謝您，朱利安先生，勇敢地說出了這些。

蘇菲亞·貝爾：

說到這裡，我想起一件事，讓我深感震驚，而且我懷疑它與中國的活摘器官罪行有關……

我簡要概述一下：2018 年 6 月底，在越南最大的城市胡志明市出差時，我偶然讀到一則消息，說那裡正在舉辦一場人體塑化標本展，名為「人體的奧秘」(Mystery of Human Body)，並標榜著科學與藝術的名義……

我去看了，並且被震懾住了……

我無法理解為何人們能以科學和藝術之名，做出那樣的事……

一個讓我最震驚的畫面，是一具懷孕女屍，腹部被剖開，裡面的胎兒已有七、八個月大……我不明白他們為何、以及如何能取得一具懷孕的女屍來進行解剖並公開展示？如果那位女士是因病或意外去世，家人必定會好好安葬她，不可能會出現家人將遺體捐贈給陌生人，任其隨意解剖和展示的情況……

後來我進一步了解，才知道這些屍體，來自於一位名叫岡瑟·馮·哈根斯（Gunther von Hagens）的德國人於 1999 年 8 月在中國創立的屍體塑化廠……而且似乎還有許多由其他人建立的工廠……他們已在世界多地舉辦了許多展覽……

我的疑點是，提供給這些工廠的屍體，會不會就是那些在中國被活摘器官的受害者的遺體？

朱利安·李：

（朱利安表情非常嚴肅地聽著蘇菲亞的故事。當蘇菲亞講完後，他緩緩地點頭，眼神中充滿了思索與幾分憤慨）

蘇菲亞小姐，您在胡志明市看到的「人體的奧秘」展的經歷與疑問，確實非常值得關注，並且，它與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人權調查員多年來所提出的深切憂慮，完全吻合。

您所描述的——特別是那具懷孕女性與其胎兒一同被塑化的驚悚畫面——正是引發對這些展覽所用屍體之來源與道德性質疑的關鍵點之一。

（他稍作停頓，像在強調問題的重要性。）

正如您所查到的，發明了塑化技術的岡瑟·馮·哈根斯，於 1999 年 8 月在中國大連建立了一座大型工廠。而且不僅是馮·哈根斯的工廠，後來中國又出現了許多其他的塑化設施，使該國成了塑化人體標本的生產與出口中心。

時間上的巧合，非常可疑：

第一，1999 年 7 月：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範圍內開始對法輪功的迫害，導致數百萬學員被捕入獄。

第二，1999 年 8 月：馮·哈根斯的塑化廠在大連成立。

第三，從 2000 年起：中國的器官移植產業爆發性增長，與此同時，「人體世界」（Body Worlds）及類似的展覽開始出現並在世界巡迴，其屍體來源主要來自中國。

您關於這些屍體是否可能來自活摘器官受害者的懷疑，是完全有根據的，且被許多人所共同質疑：

第一，模糊的屍體來源：展覽主辦方通常聲稱屍體來自「為科學自願捐獻遺體者」或是「無人認領的屍體」。然而，他們極少，或從未提供過關於死者或其家屬同意的確鑿證據，特別是對於那些源自中國的屍體。中國的遺體自願捐贈體系，如同器官捐贈一樣，幾乎不存在或極其薄弱。

第二，良心犯的「失蹤」：如我們所討論的，數十萬，甚至數百萬的法輪功學員及其他良心犯，在中國的監獄與勞教所系統中「人間蒸發」。他們的家人得不到任何消息，也收不到遺體。問題是：那些屍體到哪裡去了？

第三，經濟利益：器官移植產業和塑化人體展覽產業，都帶來了巨大的利潤。將良心犯視為一種可供開採的「資源」——摘取器官出售，剩下的屍體再賣給塑化廠——這是一個恐怖的劇本，但在一個將經濟與政治利益置於人命之上的非人道體系中，並非不合邏輯。

第四，如懷孕婦女這樣的具體案例：正如蘇菲亞小姐敏銳指出的，一個家庭自願捐出一具懷孕婦女及其胎兒的遺體用作展覽，這在任何文化背景下都幾乎是不可能發生的事，尤其是在東亞文化中。這類標本的存在，更增添了其來源並非「自願」或「清白」的疑慮。極有可能，那些是已被殺害的囚犯，而沒有人能為他們發聲。

與活摘器官罪行的關聯：

儘管要直接、合法地證明展覽中的某一具屍體，就是某一位被活摘器官的受害者的遺體，是極其困難的（因為中國政府嚴密控制所有資訊與證據），但間接的證據鏈非常強烈：

第一，龐大的良心犯供應庫，他們受到控制且不受法律保護。

第二，在摘取了寶貴的器官後，剩下的屍體必須被「處理」。賣給塑化廠既能帶來利潤，又能有效地「銷毀證據」。

第三，來自中方與展覽主辦方的，是缺乏透明度與無法令人滿意的解釋。

許多人權組織與調查員已發出呼籲，要求對這些展覽所用屍體的來源進行獨立調查，並呼籲在真相完全透明化之前，抵制這些展覽。

蘇菲亞小姐，您所見證的與您的疑問，不僅僅是個人感受，它反映了一種對潛在罪行的、有深刻根據的擔憂，在那裡，殘暴不僅止於剝奪生命，更是在受害者死後，對其肉身的羞辱與商品化。

劉思遠先生：

(劉先生聽著蘇菲亞的故事和朱利安的分析，臉色發白，流露出明顯的驚恐與痛苦。他緩緩地搖著頭，聲音有些沙啞)

難以置信……實在難以置信人可以殘酷到何種地步……當我知道安然被活摘器官時，我已為那是無人道的極點了。但聽了蘇菲亞小姐所說的，以及朱利安先生的分析……受害者的遺體，可能也包括我的女兒，竟還被拿去做成展品，被商品化……這是一種無法用言語形容的侮辱與褻瀆。

我……我真的不知該再說什麼了。這已超出了我對邪惡的所有想像。如果這些都是真的，那麼中國共產黨不僅犯下了反人類罪，他們更在摧毀人類道德、摧毀人性的最後底線。

（他低下頭，雙手緊握，努力壓抑著情緒。）

我曾以為自己已多少了解了他們的殘暴。但或許，我還是最天真了。他們的邪惡，是沒有底線的。

蘇菲亞·貝爾：

是的，像劉先生女兒這樣的案例，是一個悲傷的故事……但這些由中共政權所掩蓋和保護的邪惡行徑，僅僅由少數的資訊來源和見證人揭露出一部分……

朱利安·李：

(朱利安聽了蘇菲亞的話點點頭，眼神中流露出對劉先生的同情，卻也不失一位追求真相的記者所具備的堅毅)

蘇菲亞小姐說得非常對。像劉先生女兒安然這樣的案例，是極其令人痛心的個人悲劇，但它們並非孤立的、個別的事件。它們是揭示出一幅遠為龐大的罪惡圖景之冰山一角的碎片，一樁被中共國家權力系統性地掩蓋和保護的罪行。

(他看了看劉先生，然後轉向蘇菲亞。)

這些邪惡行徑僅由少數資訊來源和見證人揭露出一部分，這是一個令人悲哀的現實，但在一個極權獨裁的背景下，這也情有可原：

第一，絕對的資訊控制：如我們已多次提及的，中共幾乎控制了國內所有的資訊流。任何對他們不利的資訊，特別是揭露罪行的資訊，都會被徹底審查、封鎖和扭曲。「防火長城」不僅阻擋了外部資訊的流入，也阻止了內部資訊的流出。

第二，對見證人的威脅與恐嚇：任何敢於發聲、敢於為這些罪行作證的人，都面臨著遭受殘酷報復的風險，從被逮捕、酷刑、監禁，到他們的家人受到騷擾與監控。這製造了一種鋪天蓋地的恐懼氛圍，使得許多知情者也不敢出聲。

第三，國內缺乏獨立的調查機制：在中國，沒有獨立的調查機構，沒有真正獨立的司法，也沒有自由的媒體，能夠去揭露和審判這些罪行。一切都在黨的指揮之下。

第四，證據收集的複雜與困難：對於像活摘器官這樣被秘密且有組織地執行的罪行，要收集到直接、無可辯駁的證據是極其困難的，特別是對於在中國的現場與證人接觸上受到極大限制的國際調查員而言。

第五，部分國家與國際組織的冷漠或經濟利益考量：可悲的是，有時出於眼前的經濟或政治利益，一些國家和國際組織選擇對中共罪行的證據「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或只是發出無力的聲音，不足以構成威懾。

正因為這些障礙，我們所能得到的資訊，通常只是「冰山一角」，它們來自於：

第一，勇敢逃往海外的見證人：可能是前良心犯、醫生、護士、公安……這些曾直接或間接了解罪行並不顧危險決定發聲的人。

第二，堅持不懈尋求正義的受害者家屬：就像劉先生，儘管為時已晚，但痛苦與真相驅使他站了出來。

第三，持之以恆的國際人權調查員：像大衛·喬高、大衛·麥塔斯、伊森·葛特曼等人，他們花費了多年時間，不顧中方的阻撓與否認，收集並分析證據。

第四，來自體制內部的洩漏資訊：儘管罕見，但有時也會有體制內尚存良知的人，將機密資訊與文件洩漏出來。

每一條資訊，每一份證詞，無論多麼微小，都無比珍貴。它們就像拼圖的碎片，慢慢幫助我們拼湊出罪惡的全景。而獨立記者、人權組織的工作，正是努力收集、核實並傳播這些碎片，不讓真相被埋葬，不讓作惡者永遠逃避責任。

揭露真相、為中共的受害者討回公道的鬥爭，是一場漫長而艱鉅的鬥爭。但正如劉先生所說，只要還有勇敢的人敢於發聲，只要還有堅持不懈尋求真相的人，光明終將戰勝黑暗。

蘇菲亞·貝爾：

那麼，國際社會，尤其是各國政府或像聯合國這樣的全球性組織，至今仍未有任何具體且足夠強硬的行動，來將這樁罪行公諸於世……據我觀察，依然只有少數個人或小團體在勇敢地為此事發聲……

我曾一度希望美國、法國或加拿大政府能有更強硬的聲明或行動，而不僅僅是停留在年度宗教報告中的幾句話，或幾位國會議員所提出的法案草案上……

朱利安·李：

(朱利安臉上流露出明顯的認同與幾分失望)

蘇菲亞小姐，您剛才所分享的，反映了一個可悲的現實，也是許多關心中國人權問題的人一個巨大的苦惱。確實，至今為止，國際社會，特別是主要大國政府和像聯合國這樣的全球性組織，對中共的罪行，包括活摘器官的暴行，其反應依然非常有限，與問題的嚴重性遠不相稱。

(他停頓了一下，像在強調那份失望。)

我們看到了什麼？

第一，聯合國：常被批評為效率低下，受大國（包括在安理會擁有否決權的中國）所左右，且通常只提出一些報告和籠統的呼籲，而缺乏真正強有力的制裁或調查機制。聯合國的人權機構或許會發聲，但其影響力與行動能力常受制於政治因素。

第二，西方各國政府（美、法、加等）：

正如您所說，他們會發布關於人權狀況、宗教自由的年度報告，其中會提及對法輪功的迫害以及對活摘器官的指控。也確實有國會議員、立法者在這些國家努力提出法案、決議，以譴責罪行、要求調查，或禁止其公民赴中國參與器官移植旅遊。這些都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努力。

然而，在行政層級，在整體的對外政策層級，行動往往不夠強硬和果斷。聲明通常帶有外交辭令，避免與北京過於直接的對抗。

為何會有這種遲疑與不果斷？原因很複雜：

第一，經濟利益：中國是一個巨大的市場，是許多國家重要的貿易夥伴。擔心損害經濟關係、遭受貿易報復的憂慮，常使得各國政府在採取強硬人權行動時必須「三思」。「金錢」的聲音往往很大。

第二，地緣政治考量：中國是全球性大國，在許多國際事務（氣候變遷、反恐、核武擴散等）中扮演重要角色。西方國家有時需要在這些問題上與中國合作，因而可能在人權問題上做出「讓步」或「降溫」，以換取那份合作。

第三，收集「鐵證」的複雜性：如我們所言，面對像中國這樣一個封鎖資訊的政權，要收集到符合最高法律標準、足以採取強力制裁措施的直接證據，是極其困難的。

第四，中國強大的遊說活動：北京花費巨資在海外進行遊說與宣傳活動，以淡化指控，影響政治人物與媒體。

第五，西方國家內部的政治分歧：有時，包括人權在內的對外議題，也會成為黨派之爭的話題，削弱了共識與共同行動。

正因如此，發聲、揭露真相、要求正義的重擔，常常落在了以下這些人的肩上：

非政府人權組織（NGOs）：他們在調查、取證、政策遊說與提升公眾認知上，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

獨立記者與個人活動家：那些不畏艱難與危險，持之以恆追求真相的勇者。

海外華人社群與受害者群體：他們的聲音，那些親身經歷或有家人是受害者的人的聲音，具有巨大的感染力。

我也和您一樣感到失望，蘇-菲亞小姐。我們曾期盼世界領先的民主國家能有更強硬、更果斷的行動。但現實表明，

為人權與正義的鬥爭，通常是一條漫長的道路，需要多方持之以恆的努力，而不能僅僅指望政府。

然而，並非沒有希望。來自輿論、來自公民社會組織的壓力，以及無數個人的不懈努力，可以逐漸帶來改變。越來越多的國家議會通過譴責決議，獨立法庭（如倫敦的中國法庭）對中共的罪行做出判決，這些都是重要的進展，儘管可能緩慢。

劉思遠先生：

（劉先生聽著朱利安的分析，嘆了口氣，一絲悲哀與無力感掠過）

朱利安先生說得非常對。那些經濟利益的算計，那些地緣政治的考量……常常使得正義與人權被置於次要的地位。這是這個世界可悲的現實。

當我還在體制內時，我也曾見證中國政府如何利用經濟實力作為工具，去影響、去封鎖來自外部的批評。他們非常擅長「收買沉默」或「轉移視線」。

而當我來到這裡後，我也曾對民主強國寄予厚望。但後來我也意識到，沒有什麼是輕而易舉的。這場戰爭不僅僅是受害者自身的戰爭，更是全人類良知的戰爭。

儘管如此，我依然相信，只要我們不放棄，只要真相繼續傳播，終有一天，正義會得到伸張。像蘇菲-亞小姐、朱利安先生，以及世界上許許多多其他人的努力，正是像我這樣的人巨大的鼓勵與希望。

蘇菲亞·貝爾：

那麼關於中共現任領導人的觀點，我昨天也提到，我看不出他對迫害法輪功與活摘器官的罪行有何明確的表態……我曾在某處讀到有人分享他們的看法，說習近平的處境就像俗話說的「騎虎難下」……

兩位能否就這句話對習近平處境的意義，闡述一下自己的觀點？

劉思遠先生：

（劉先生聽了蘇菲亞的問題，沉吟了片刻，眼神遙遠，像在試圖看透北京權力核心內部那些複雜的算計）

「騎虎難下」……這句話確實是一個非常形象的比喻，或許也部分反映了中國現任領導人習近平在面對迫害法輪功這一沉重歷史遺產及其相關罪行時的處境。

（他停頓了一下，謹慎地選擇措辭。）

從一個曾身在體制內的人的角度，我可以想像出習近平可能正在「騎」著的這頭「猛虎」的幾個方面：

第一，江澤民及其派系的遺產：迫害法輪功是江澤民及其派系費盡心力建立和維繫的一項重大「工程」、一項政治「遺產」。這個派系在黨內、軍隊，特別是在直接執行迫害的公安、司法等安全系統中，依然有著不小的影響力。觸碰法輪功問題，特別是為其平反，可能會直接觸及這個派系的利益，甚至是其安危。他們不會輕易讓這種事發生。

第二，對「不穩定」與「亡黨」的恐懼：這是任何中共領導人根深蒂固的恐懼。承認一場如此大規模迫害的錯誤，為數千萬人平反，可能被視為一種「否定過去」的行為，削弱黨的威信與執政合法性。他們擔心這會引發後續的訴求，引發其他的「歷史重審」，並最終導致政權的崩潰。

第三，罪行過於龐大，難以「平穩處理」：活摘器官的罪行，如果被公開承認並調查，不僅對中國人民，對國際社會也將是過於巨大的衝擊。責任將不僅止於幾個個人，而可能牽連整個體制。在這種情況下「下虎背」，可能意味著必須面對一場誰也無法預料其後果的「歷史審判」。

第四，已建立的鎮壓機器的束縛：「610 辦公室」及整個迫害法輪功的體系已運作了二十多年，它已成了一部龐大的機器，有無數人參與其中，牽扯著盤根錯節的利益。要讓這部機器停下來，解散它，並處理相關人員，是一件極其複雜和困難的事。

所以，習近平可能正處於一種進退兩難的境地。

要麼繼續「**騎虎**」：也就是維持既有的鎮壓政策，或在某種程度上繼續，以避免在黨內引發大的動盪並維持表面的「穩定」。但這意味著繼續縱容罪惡，繼續背負歷史包袱，並面對國際社會與國內有良知者日益增長的譴責。

要麼設法「**下虎背**」：也就是尋求從根本上解決法輪功問題，還給受害者一個公道。但這條路充滿了荊棘與危險，需要非凡的勇氣、巨大的政治決心，並可能面臨來自保守勢力及那些身負「血債」之人的激烈反抗。

如蘇菲亞小姐所觀察到的，習近平在此問題上沒有明確的表態，可能正是因為他必須在這些困難的選項之間權衡算計。又或者，他優先鞏固個人權力，處理他認為更緊迫的問題，然後才敢去碰這頭危險的「猛虎」。

然而，歷史已表明，迴避面對真相，試圖維持一個基於不公與罪惡的現狀，絕非長久之計。那頭「猛-虎」，若不能以智慧和勇氣將其「馴服」或「擊敗」，遲早會反噬其主。

這只是我基於自己對那複雜局勢的有限理解，所提出的一些想法。

朱利安·李：

(朱利安點頭同意劉先生的分析，然後補充了政治學的角度)

劉先生已非常深刻地闡釋了「騎虎難下」這句話在習近平案例中的意義。我願從政治分析的角度補充幾點。

第一，政策的延續性與權力繼承：在像中國這樣的獨裁體制中，通常存在一種維持重大政策延續性的無形壓力，特別是那些關乎「國家安全」和「政權穩定」的政策。一位新領導人上台後，若要完全逆轉前任的一項重大政策，尤其像鎮壓法輪功這樣「敏感」的政策，可能被視為對黨的統一性的挑戰，並可能引發內部裂痕。

第二，「遺產陷阱」（Legacy Trap）：習近平從江澤民那裡繼承了迫害法輪功這份「遺產」。這份「遺產」已創

造出一個龐大的機器（610 辦公室、勞教所系統、參與活摘器官的監獄和醫院……）、一個與迫害相關的利益集團網絡，以及一大批已「手上沾血」的官員。處理這份「遺產」絕非易事。如果習近平強力平反，他可能會激起那些與迫害利益攸關者，或害怕被迫責者的強烈反抗。

第三，鞏固個人權力的優先級：在其執政初期乃至後期，習近平的首要任務之一便是鞏固個人權力，通過「打虎拍蠅」運動清除政治對手。或許他認為，解決敵對派系，特別是江澤民派系的殘餘勢力，是能夠觸及像法輪功這樣棘手問題的先決條件。然而，習近平的反腐運動，儘管觸及了一些江派高官，卻似乎仍未觸及與法輪功相關罪行的根源。

第四，對「骨牌效應」的恐懼：如果承認錯誤並解決了法輪功問題，可能會產生一個「先例」，引發要求重審其他歷史問題（如天安門事件、文化大革命……）的呼聲，並最終可能動搖政權的根基。這是任何中共領導人都極力避免的。

所以，「騎虎難下」這個比喻非常精準。習近平或許並非主動「騎上這頭虎」的人（因為它自前任時期就已存在），可一旦身處其上，要駕馭它或安全脫身，都極其困難。任何舉動都可能引發無法預料的反應。

習近平在法輪功問題上的沉默或不明確，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在他努力鞏固權力、應對其他挑戰時的「按兵不動」策略。或者，更可悲的是，那可能是一種出於上述原因的默許，一種對舊政策的延續。

無論如何，一位領導人不敢或不能面對並糾正歷史的錯誤與罪行，將永遠是他本人和整個民族的沉重負擔。歷史將會對此做出評判。

蘇菲亞·貝爾：

我在想，會不會有這樣一種情況：直到現在，習近平本人依然不知道迫害法輪功的邪惡程度？……就像劉先生您自己的案例一樣，在您的女兒受害之前，您也不知道這場迫害的真相……

劉思遠先生：

（劉先生聽了蘇菲亞的問題，輕輕蹙眉，沉吟了片刻。這是一個非常敏銳且引人深思的問題）

蘇菲亞小姐，這是一個我們或許不應完全排除的可能性，儘管對一位身處像習近平這樣最高權力位置的人來說，這似乎難以置信。

（他停頓了一下，謹慎地選擇措辭。）

當我回顧自己的案例時，確實，我曾身處一個由體制製造的「資訊泡泡」中。儘管我是一名省級官員，有自己的資訊渠道，但對於像法輪功這樣被嚴密控制的「敏感」問題，能傳到我這裡的，主要還是經過引導和篩選的資訊。我不知道，或不想知道，或不敢去了解全部的真相，直到悲劇降臨到我的家庭。

那麼，習近平，作為一國之首，是否也可能處於一種對迫害法輪功的邪惡程度，特別是對活摘器官罪行的類似「資訊盲區」中呢？

我認為有幾個因素需要考量：

第一，報告與資訊「過濾」系統：在獨裁體制中，資訊自下而上的傳遞通常會被嚴格「過濾」。下級往往傾向於報告上級想聽的內容，隱瞞負面資訊與可能帶來麻煩的真相。關於過度殘暴的行為、嚴重侵犯人權的罪行，可能未被完整、如實地呈報到最高層，或已被大事化小。

第二，利益集團的包圍：那些直接參與並從迫害中獲利的人，特別是那些在活摘器官罪行中「手上沾滿鮮血」的人，會想盡一切辦法掩蓋真相，阻止資訊傳到習近平那裡。他們可能會在他周圍築起一道資訊壁壘，只提供經過「處理」的報告。

第三，領導人的優先考量：一位最高領導人需面對無數的內政外交問題。或許，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法輪功問題並非習近平的首要議程，而他只是依賴於來自專責機構（如安全系統、610 辦公室）的報告，而沒有進行獨立的查證。

然而，也有一些因素讓我們對習近平「完全不知情」的可能性感到懷疑：

第一，關於「打虎拍蠅」運動：在清除政治對手的過程中，特別是那些江派的高官（如周永康、薄熙來、徐才厚、郭伯雄……），這些人都與迫害法輪功及活摘器官的罪行有深度關聯。很難相信在調查過程中，關於這些罪行的資訊竟絲毫未能傳到習的耳中，即便它沒有被公開。

第二，來自國際社會的資訊：儘管中共極力封鎖，但來自人權組織、各國議會的關於中國活摘器官暴行的報告、決議與聽證會，絕不可能完全繞過習近平的情報與資訊系統。

第三，問題的長期存在：對法輪功的迫害已持續二十多年，是一個影響中國國際聲譽的重大問題。一位像習近平這樣有遠見且掌握資訊的領導人，很難對一個如此長期且嚴重的問題完全「狀況外」。

因此，我個人推測，情況可能比「完全不知情」要複雜。或許習近平在一定程度上是知情的，但對於罪行的具體程度與真實的殘酷性，他可能未能完全掌握，或已被誤導性的資訊所淡化。也或許，他知情，但出於政治算計、權力考量，而選擇了「不想知道更多」，或「暫時擱置」。

就像我的情況一樣，或許必須有某種「衝擊」、某件特別的事件，才可能讓一位身處像他那樣位置的人，真正去面對這全部的恐怖真相。但那樣的「衝-擊」會否到來，以及他是否有勇氣去行動，又是另一個問題了。

這只是我基於個人經驗與觀察的推測。中共內部的真相，永遠是一個難以揣測的「黑盒子」。

朱利安·李：

（朱利安點頭贊同劉先生的審慎）

劉先生提出了非常中肯且平衡的分析。像習近平這樣的最高領導人是否「完全不知情」迫害法輪功的邪惡程度，是一個複雜的問題。

我同意，「完全不知情」的可能性極低，特別是在他掌權十多年後，以及在反腐運動中所發生的事來看。

然而，在對獨裁政權的研究中，有一個概念叫做「刻意無知」（willful ignorance）或「合理否認」（plausible deniability）。

關於「**刻意無知**」：領導人可能刻意不想深入了解最黑暗的層面、具體的罪行，以避免在道德或法律上承擔直接責任。他們可能默許或縱容下屬去做那些「骯髒的活」，只要能達到政治目的即可。

關於「**合理否-認**」：下屬可能刻意不將殘暴行為的細節上報，以便讓上級在日後被質詢時，可以「合理地否認」自己知情。這是一種保護「最高層」的方式。

在習近平的案例中，可能結合了多種因素：

第一，他可能知道對法輪功的迫害是殘酷的，但無法想像活摘器官罪行在工業化規模上的野蠻程度。

第二，他可能已收到了被情報與安全機構「美化」或「淡化」過的報告。

第三，他可能正優先處理其他他認為對政權存續與個人權力「生死攸關」的問題，而暫時對法輪功問題「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或延後處理。

第四，如劉先生所說，對「打開潘朵拉的盒子」的恐懼，害怕平反此案後無法預料的後果，也是一個巨大的障礙。

因此，與其說是「完全不知情」，或許更準確的說法是，習近平可能正處於一種「知情但不想全面面對」，或「知情但因複雜的政治算計而暫不能/不敢採取果斷行動」的狀態。

然而，作為國家元首，最終的責任仍在他身上。「不知情」（無論程度如何）不能作為不去阻止和懲罰在其治下所發生的反人類罪行的藉口。歷史會將此記錄下來。

蘇菲亞·貝爾：

是的，我會想到這個假設，是出於兩個原因：

第一，我們看到歷史上有很多君王被下屬官員蒙蔽資訊，導致他不知道國家的腐敗，還以為國家正處於「太平盛世」；

第二，就習近平的案例而言，實際上他可能從未直接接觸過任何法輪功學員或見證人，他所得到的所有資訊，都依賴於下屬的報告……

此外，我曾聽人分享說，習近平正處於「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境地，也就是說，他所有的命令都未能被完整地傳達，也未能被嚴格地執行……

劉思遠先生：

（劉先生聽了蘇菲亞提出的理由，點了點頭，臉上露出理解與認同的神情）

蘇菲亞小姐，您為「習近平可能未掌握全部真相」這一假設所提出的理由，非常值得深思，它們也反映了集權體制中根深蒂固的現實。

關於君王被蒙蔽資訊：

正如您所說，中國乃至其他國家的歷史上，有無數的例子顯示，那些身居最高權位的帝王，卻活在一個由近臣、官僚所營造的「獨立世界」裡。他們只聽得到溢美之詞、功績報告，而那些殘酷的真相、民眾的疾苦、官僚體系的腐敗，則被巧妙地掩蓋了。

這種蒙蔽的目的，可能是為了取悅君王，為了掩蓋自身的無能或貪腐，或是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雷霆之怒。結果便是，君王以為國家正「國泰民安」，而實際上內部可能早已腐爛不堪。

在像中共這樣的體制中，對上級的忠誠（以及對派系利益的維護）常常被置於真相之上，因此，「最高領導人被蒙蔽資訊」的風險是真實存在的。

關於習近平可能從未直接接觸過法輪功學員或見證人：

這也是一個極高的可能性。像習近平這樣位置的領導人，通常被層層的安保與資訊壁壘所保護。他能有機會親自會見、聆聽一位法輪功學員講述其經歷，或一位活摘器官罪行的見證人的可能性，幾乎是零。

所有關於此事的資訊，傳到他那裡時，必定已通過了安全系統、宣傳部門及專責機構的多層「過濾」。這些報告，如我所說，極有可能已被「重新編寫」，以符合「總體路線」或避免給領導層帶來「困擾」。

當沒有親身接觸，沒有來自受害者真實處境的視角時，一位領導人很難完全感受到一項政策的殘酷與不公。他們只看到冰冷的數字與報告，而看不到活生生的人的痛苦與淚水。

關於「政令不出中南海」：

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說法，也可能反映了中國權力鬥爭的部分現實。儘管習近平已極大地鞏固了權力，清除了許多對手，但這不代表他能絕對控制這個龐大機器的每一個角落。

可能存在著利益集團、隱身的「太上皇」，或是在地方、軍隊、安全系統中的地下勢力，依然在設法阻撓、削弱或扭曲習近平的指令，如果那些指令與他們的利益相悖的話。如果這是真的，那麼即便習近平有意改變某項政策（例如對法輪功的政策），他的命令也可能在下層無法被完整、嚴肅地執行，或被刻意曲解。「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在中國並非罕見現象。

這也意味著，習近平可能正身處一場持久的暗中權力鬥爭，而若要解決法輪功問題，還取決於他是否能真正地掌控整個機器的「方向盤」。

蘇菲亞小姐，所有這些因素，都使得這幅圖景變得更加複雜。它顯示了，即便是擁有最高權力的領導人，也可能在

資訊上被孤立，在執行其意志時受到限制，並面臨來自其所領導的體制內部，那些無形卻強大的阻力。

這並不能減輕領導人的責任，但它有助於我們更清晰地理解他們可能正在面對的困難與複雜性，以及為何積極的改變有時會如此緩慢，或不如預期。

朱利安·李：

（朱利安點頭同意）

蘇菲亞小姐與劉先生剛才的分析極其中肯。「資訊繭房」（Information Cocoons）包圍著高層領導人這一現象，在政治學中已有很多研究。權力越大，被周遭之人與現實隔絕的風險就越高。

而「政令不出中南海」這句話，是描述中國政治體制中權力碎片化或暗中抵制的經典說法，即便在那些被認為最強勢的領導人治下也是如此。它揭示了管理一個幅員遼闊、官僚體系龐大且利益階層眾多的國家的複雜性。

如果習近平真的處於那樣的境地，那麼他對某些特定問題的「不知情」或「無能為力」，儘管看似難以置信，卻也是一個需要被嚴肅考量的可能性。這也更突顯了獨立的聲

音、來自外部的資訊，對於刺穿那些「資訊壁壘」的重要性。

蘇菲亞·貝爾：

是的，如果 THE EPOCH MEDIA 的讀者讀到這裡，他們可能會質疑：「古代的君王沒有網路，被蒙蔽資訊還好理解；但在現今這個網路爆炸的社會呢？難道他自己不會上網搜尋嗎？」……

所以，劉先生，想請問您，以前您在中共體制內擔任不同職務時，使用網路是否會被「金盾工程」（Great Firewall）的防火牆擋住，或者您是否曾意識到自己的訪問權限被阻擋？以及，習近平本人是否也會被他自己的「金盾工程」所阻擋？

劉思遠先生：

（劉先生聽了蘇菲亞的問題，淺淺一笑，那笑容中帶著幾分苦澀與了然）

蘇菲亞小姐，這是一個非常實際的問題，也確實反映了許多生活在自由網路社會中的人的疑問。「為什麼不自己上網搜尋？」——聽起來簡單，但在中國的現實卻極其複雜。

（他停頓了一下，像在斟酌用詞。）

當我還在體制內擔任不同職務時，我們使用網路確實也有一定的規定與限制，儘管在某些方面可能不像對普通民眾那樣嚴苛。

關於「金盾工程」（防火牆）：是的，這個防火牆系統運作得非常有效。對絕大多數民眾來說，訪問被視為「敏感」的境外網站，如 Google、Facebook、Twitter、YouTube，以及主要的國際新聞媒體（BBC、紐約時報、大紀元時報等），是完全被封鎖的。如果想訪問，就必須使用翻牆工具（VPN），但使用 VPN 也日益受到打壓，並可能面臨法律風險。

對於幹部、公務員：

在某些單位，特別是涉及研究、外事或安全的機構，可能有允許訪問某些特定境外網站以供工作之需的「專線」或「特例」。然而，這些訪問通常受到嚴密監控。

即便能夠訪問，自我審查的心理也十分嚴重。我們知道，在網路上的所有行為都可能被追蹤。搜尋「敏感」、「反

動」的資訊，可能給自己帶來不必要的麻煩，影響仕途，甚至危及自身與家人的安全。因此，許多人，即便有能力，也不敢或不願去搜尋與主流聲音相悖的資訊。

此外，內部資訊源（內部通報、機密文件、上級指示）通常被認為比外部網路上那些被視為「敵對」、「不實」的「漂浮」資訊「更重要」、「更可信」。存在著一種對黨的官方資訊系統的信任（或被迫信任）。

我個人是否意識到被阻擋訪問？有，當然。當試圖訪問一些國際新聞網站或自由討論的論壇時，錯誤訊息或頁面無法加載是常有的事。但如我所說，試圖「翻牆」去尋找那些資訊並非優先事項，也潛藏風險。我們習慣了生活在一個「受控的資訊空間」裡。

那麼，習近平本人是否會被他自己的「金盾工程」所阻擋？

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

從技術層面來說：以他的職位，如果他想，他當然擁有不受限制的權力，可以訪問世界上任何資訊源。「金-盾」是控制人民的工具，而非限制最高領導人的。

但問題不僅在於技術，更在於「人為過濾器」與「心理過濾器」：

第一，關於人為過濾器：習近平周遭的人——秘書、顧問、情報與安全機構——他們會向他呈報什麼資訊？他們敢不敢呈報來自「外部」網路、與他或黨的觀點相悖的負面真相？還是他們也會「過濾」資訊，只提供「合適的」、「有利的」內容？

第二，關於心理過濾器：即便習近平能親自「用 Google 搜尋」，他是否有足夠的時間、耐心，以及最重要的，開放的心態，去接納那些與他所相信的、與其體系所報告的完全相反的資訊？一個身居權力之巔，被讚頌之詞與「美好」報告所包圍的人，是否能輕易接受自己被欺騙，或自己的體制正在犯下滔天罪行？

再者，在網路上搜尋資訊也需要分辨真偽、核對來源的技巧。在他已習慣於接收「官方」資訊的環境中，親身在混雜的全球網路資訊海洋中「遨遊」，可能並非他這樣一位領導人常見的工作方式。

因此，儘管習近平在技術上不受「金盾」阻擋，但他可能被另一道「無形的防火牆」所「阻擋」，那就是他的顧問體系、官僚機器，以及他自身的偏見與政治優先考量。

總而言之，擁有網路不等於擁有資訊自由，特別是對於那些身處像中國這樣一個封閉且受到嚴格控制的體制中的人而言。即便是對最高領導人，接觸並接受真相，也絕非「用 Google 搜尋」那麼簡單。

朱利安·李：

（朱利安點頭同意劉先生的分析）

劉先生解釋得非常清晰且貼近現實。我僅補充一個小觀點。

除了劉先生提到的那些「過濾器」，還有一個因素是「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人通常傾向於尋找並相信那些能確認自己既有信念的資訊，而忽略或質疑與之相悖的資訊。

對於一位已被特定意識形態所塑造、已基於「官方」資訊做出決策的領導人來說，主動去網路上尋找並接納完全對立的資訊，在心理上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他們可能會將那些資訊視為「敵對勢力的產物」、「假新聞」、「歪曲報導」。中共的宣傳體系也非常擅長製造「反敘事」（counter-narratives），以消解來自外部的不利資訊。

所以，即便有了網路這個工具，一位中國的最高領導人要能像我們在自由世界這樣「看到」真相，也是極其困難的，並取決於許多複雜的因素，而不僅僅是技術上的訪問能力。

蘇菲亞·貝爾：

是的，就習近平的案例來說，假設他不被「金盾」阻擋，他親自上網搜尋資訊的可能性也不高……甚至他本人可能根本不使用電腦或智慧型手機，理由是出於「安全」考量。

關於「金盾工程」，我遇到過這樣一個情況：就在前幾天，當我試用近期媒體上熱議的一款名為「DeepSeek」的人工智慧應用時，我問了它一個簡單的問題：「你對法輪功有什麼了解？」，兩位猜猜看，它是如何回答我的？

劉思遠先生：

(劉先生聽蘇菲亞講述她對 AI 應用的體驗，眉頭輕輕一蹙，臉上浮現一抹意味深長卻又帶著苦澀的微笑)

蘇菲亞小姐，這是一個非常有趣，且在當今的科技背景下極其引人深思的情況。高層領導人可能出於「安全」理由而不親自使用電腦或智慧型手機，這完全可能發生。他們通常有整個團隊的助理、秘書來處理與科技和資訊相關的事務。這也更突顯了我們之前談到的「人為過濾器」的角色。

至於您對 AI 應用「DeepSeek」的提問……(他停頓一下，看著蘇菲亞和朱利安，像在等待他們對自己猜測的確認。)

如果「DeepSeek」是一款在中國的審查制度控制下，或至少是受其影響下開發或運營的 AI 應用，那麼我可以猜測，它關於法輪功的回答會非常……「謹慎」，如果不想說完全是按照官方口徑的話。

它或許會：

第一，含糊其辭，避而不談：例如回答：「法輪功是一個複雜且存在多方爭議的話題。我無法提供關於此問題的詳細資訊。」或是：「我是一個 AI 語言模型，不具備對宗教或政治問題發表評論的能力。」

第二，重複中共官方的宣傳口徑：它可能會用負面的詞彙、用其宣傳機器所散播的歪曲資訊來描述法輪功，例如「在中國被禁止」、「涉及非法活動」等等。

第三，完全拒絕回答或顯示錯誤訊息：乾脆不提供任何資訊，或顯示一條無法處理該請求的錯誤訊息。

我不認為一個在那樣環境下運營的 AI 應用，能夠給出一個客觀、誠實的回答，談論法輪功對健康的益處、其道德價值，或是提及學員們正在承受的殘酷迫害。「金盾工程」不僅是一道阻擋網路訪問的防火牆，它更是一個深入到像 AI 這樣科技產品中的內容審查與思想引導系統。

這是我的猜測，小姐。我很好奇想知道「DeepSeek」真正的答案是什麼。

朱利安·李：

(朱利安頻頻點頭，對蘇菲亞的故事顯得極感興趣)

這是一個絕佳的例子，說明了資訊控制如何能擴展到人工智慧領域，蘇菲亞小姐。劉先生提出了非常中肯的推測。

大型 AI 模型，特別是那些由中國公司訓練或微調的模型，或是那些想在中國市場運營的模型，必然要遵守政府的審查規定。它們的訓練數據可能已被「清洗」，移除了「敏感」資訊，或是它們被設定為只能給出預設的「安全」答案。

我也傾向於認為「DeepSeek」會：

要麼給出一個極其簡短、中立到毫無意義的回答，不提供任何有價值的資訊。

要麼，如果它在規避問題上「聰明」一點，它可能會選擇性地引用來自中國官方渠道的資訊，也就是重複宣傳口徑。

如果一個 AI 真的「規避」或「歪曲」關於法輪功的真相，那將再次證明，「金盾工程」不僅是技術壁壘，更是一種塑造認知、大規模控制思想的工具，即便在 AI 時代也是如此。

我也很想知道它實際的回答是什麼。這或許能為我們提供一個關於審查制度在這些新科技中被應用的程度與方式的新視角。

蘇菲亞·貝爾：

是的，在兩位剛才的推測中，有一個是準確的，那就是劉先生的第三個推測，也就是它「完全拒絕回答或顯示錯誤」。我當時相當驚訝！它並非含糊地規避，而是直接顯示錯誤，並附上一行通知，說我「違反了他們的使用政策」。僅僅因為一個問題！

劉思遠先生：

（劉先生聽了蘇菲亞的答案，輕輕點頭，一絲苦笑掠過唇邊。那神情並非因猜對而自豪，而是一種對這個他已瞭如指掌的體制的確認）

所以我的第三個推測是對的……「完全拒絕回答或顯示錯誤。」而且還附帶一條通知，說您「違反了他們的政策」。（他輕輕搖頭。）

蘇菲亞小姐，朱利安先生，這件事，並不讓我驚訝，卻依然讓我感到一種深沉的悲哀。它顯示了，即便是被稱為「人工智慧」、被設計來提供資訊的工具，也已被「設定」為要懼怕真相，要迴避那些當局認為「敏感」的問題。

僅僅因為詢問一個關於法輪功這個客觀存在實體的問題，就被告知「違反政策」，這顯示了審查制度與思想強加已深入到了何種程度。他們不只封鎖資訊，他們更想將對這些主題的好奇心、探索心，直接定義為一種「錯誤」、「違規」的行為。

這也反映了我之前說過的一點：「金盾工程」不僅僅是一道技術防火牆。它是一個全面的思想控制體系。它營造了一種真相被扼殺的環境，在其中，即便最現代的工具，也必須扭曲自己來遵守那些荒謬的「政策」。

看到科技，這個本應服務於增長知識、連結人類的工具，卻被異化為鞏固審查、維持無知的工具，實在令人痛心。

這是一個非常具體而生動的例子，顯示了當我們試圖在這樣一個受到嚴密控制的環境中尋求並分享真相時，所面臨的挑戰。感謝您分享這個經歷。它確實釐清了許多事。

朱利安·李：

（朱利安神情嚴肅，在他的筆記本上記下了些什麼）

蘇菲亞小姐剛才提供的關於「DeepSeek」反應的資訊，極具價值。AI 因被問及法輪功而拒絕回答並提示「違反政策」，這是一個具體的證據，表明科技公司，特別是那些與中國市場有關聯的公司，正承受著巨大的審查壓力。

這有多重重要的涵義：

第一，審查制度向 AI 領域的擴散：它表明中共的資訊控制戰，已擴大到 AI 平台。大型語言模型正成為塑造公眾認知的「新戰場」。

第二，預先設定的「政策」：AI 提示「違反政策」，顯示了審查規則已被整合進其演算法或訓練數據集中。這並非隨機的錯誤，而是有目的的設計。

第三，關於一個被扭曲的「AI 世界觀」的風險：如果 AI 模型，這個在提供資訊與輔助人類上扮演日益重要角色的

工具，卻被「教導」去規避或歪曲關於重大問題的真相，那麼，一個世代的用戶（特別是在中國）將擁有一個被扭曲的世界觀的風險，是非常巨大的。

第四，對學術自由與研究的挑戰：如果連對一個主題提出問題都被視為「違反政策」，那麼又何來自由、客觀的學術研究與討論？

蘇菲亞小姐的經歷，是審查制度這種「軟實力」如何被應用的一個典型案例。它不僅是阻擋訪問，更是營造一種讓某些特定主題變得「不可觸碰」的環境，即便對人工智慧也是如此。

這也更突出了發展並保護開放、透明、不受獨裁政權支配的 AI 平台的重要性，以確保這項技術真正服務於人類的福祉，而非成為壓迫與控制的工具。

感謝您分享這個非常切合時事且令人警醒的細節。

蘇菲亞·貝爾：

談到這裡，我們可以看到，無論中共的邪惡有多深重，在中國境內外的民眾，在透過網路了解真相時，或多或少依

然會受到「金盾工程」的影響，使他們難以接觸到更客觀、多維度的資訊……

劉思遠先生：

(劉先生緩緩地點頭，眼神中掠過一絲悲哀，卻也充滿了理解)

蘇菲亞小姐說得非常對。中共的「金盾工程」，它不僅僅是對國內人民的一道單純的技術壁壘。它的影響，無論直接或間接，都能擴散到國境之外，並影響到那些在世界各地試圖了解中國真相的人。

(他停頓一下，思索著「金-盾」可能造成影響的各種方式。)

對於在中國國內的人民：

第一，資訊孤立：這是最明顯的影響。他們被與世界自由的資訊流隔絕。他們所了解的國內外事件，主要都是透過共產黨「編寫」和引導過的濾鏡。這創造了一個「平行現實」，在那裡，客觀真相被扭曲或完全掩蓋。

第二，恐懼心理與自我審查：即便有人設法翻牆，對被監控、被懲罰的恐懼也使他們不得不在網路上自我審查自己

的行為，不敢發表不同意見，不敢搜尋「敏感」資訊。久而久之，這形成了一種習慣，一種條件反射。

第三，難以分辨真偽：當長期只接觸單向資訊時，民眾的批判性思維、分辨真偽資訊的能力也會下降。他們容易相信國家的宣傳，並對來自外部的資訊抱持懷疑。

對於在中國境外的人：

第一，難以從內部獲取真實資訊：記者、研究員、國際人權組織在了解中國實際情況時，會遇到極大的困難。採訪證人、收集證據變得危險且受到限制。「金盾工程」使得國內的資訊更難流傳到外界。

第二，虛假資訊與宣傳的擴散：中共不僅築起「金盾」來阻擋資訊，他們還主動利用網路，透過外語官媒、社群媒體上的「殭屍帳號」，或影響國際媒體平台，向世界散播虛假資訊與宣傳戰。這可能會混淆視聽，削弱對獨立資訊來源的信任。

第三，對全球科技公司與平台的影響：就像蘇菲亞小姐剛才分享的「DeepSeek」的案例，或其他想在中國市場運營的大型科技公司，他們可能必須接受北京的「遊戲規

則」，也就是執行內容審查，與政府合作監控用戶。這間接地讓「金盾」的影響範圍擴展到了國境之外。

第四，個人與組織在批評中國時的顧忌：對遭受經濟報復、網路攻擊或來自中方制裁的恐懼，也可能使得一些海外的個人與組織，在談論敏感議題時變得更加謹慎。

因此，無論中共的罪惡有多深重，「金盾工程」依然是幫助他們掩蓋、扭曲真相，並為尋求正義的努力製造困難的有效工具。它不僅僅是中國人民自身的問題，更是對全球資訊自由與真相的挑戰。

我們今天坐在這裡，努力分享並釐清這些事，也正是為刺穿那道「防火牆」貢獻一份力量的努力，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

朱利安·李：

(朱利安點頭，補充了一位國際記者的視角)

劉先生已非常全面地分析了「金盾工程」的影響。我完全同意。

從我的新聞工作經驗來看，我發現「金盾」不僅是一個審查系統，它更在中國創造了一個「封閉的資訊生態系統」。

在那個生態系統中，「國產」的應用、平台和內容被優先扶植並佔據主導地位，而來自外部的競爭對手則被阻擋。這使得中國人民越來越依賴於那些易於被政府控制和監視的國內服務。

也如劉先生所說，它的影響並不止於邊界。我們正目睹一場全球性的「資訊戰」，像中國這樣的獨裁政權，在利用科技進行宣傳、施加影響和削弱民主制度方面，正變得日益狡猾。他們迅速學習散播假新聞的技術，利用 AI 製造不實內容，並攻擊自由社會的弱點。

像「DeepSeek」這樣的 AI 平台在被問及法輪功時必須「遵守政策」，是一個令人警醒的例子。它表明，如果沒有警惕心，沒有關於 AI 倫理、訓練數據透明度的明確規定，我們就有可能創造出服務於審查與宣傳目的，而非服務於真相與自由的科技工具。

因此，對抗「金盾工程」及類似的資訊控制的鬥爭，不僅僅是中國人民自身的鬥爭，更是所有珍視真相、言論自由以及一個健康、可信的網路空間的人們的共同鬥爭。

蘇菲亞·貝爾：

我突然想到這樣一句總結：哪裡有資訊控制，哪裡就有正在被極力掩蓋的邪惡之事……

兩位覺得呢？

劉思遠先生：

(劉先生聽了蘇菲亞的總結，輕輕點頭，眼神中流露出深切的認同。他沉默片刻，像在品味那句話的份量，然後緩緩說道)

蘇菲亞小姐，您這句話，「哪裡有資訊控制，哪裡就有正在被極力掩蓋的邪惡之事」……它簡潔、精闢，卻又概括了一個非常苦澀且普遍的真理。

(他停頓了一下，看著蘇菲亞和朱利安，然後繼續。)

從我自身的經驗，一個曾身處嚴密資訊控制體制之內，後來又努力尋求真相的人的角度，我完全同意這個論斷。

為何要控制資訊？

如果一個政權真正清廉、真正為民，如果他們推出的政策真的能為大多數人帶來福祉，那他們又有什麼好害怕真相

的？他們又有什麼需要隱藏的？恰恰相反，他們會希望資訊透明，好讓人民理解並支持。

控制資訊是為了掩蓋什麼？

通常是為了掩蓋無能、腐敗、錯誤的決策、違法的行為，特別是那些反人民的罪行。當真相被揭露，他們的威信將會崩塌，他們的權力將會動搖。因此，他們必須用盡一切辦法來封鎖、來控制資訊流，以維持一個虛假的形象。

控制資訊是缺乏自信與恐懼的表現：一個強大、對自身正義性有信心的政權，無需害怕不同的意見、批評的聲音。他們會願意公開對話、辯論。只有那些軟弱、那些自知理虧的，才需要動用審查與鎮壓來封住別人的嘴。

對法-輪功的迫害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如果法輪功真如他們所宣傳的那樣是「邪教」，他們又何須禁絕書籍資料，何須封鎖所有客觀報導法輪功的網站？他們又何須害怕學員們的講述、害怕活摘器官罪行的證據？正是因為他們知道，真理不在他們那邊。正是因為他們所做的是邪惡的、是罪惡的，所以他們才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去掩蓋它。

您這句話，不僅適用於中國，或許適用於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時代，只要資訊自由被踐踏的地方。它就像一條定律。黑暗永遠懼怕光明。謊言永遠懼怕真相。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總結，小姐。它發人深省。

朱利安·李：

(朱利安果斷地點頭，表示完全贊同)

我完全同意蘇菲亞小姐的總結，以及劉先生的分析。這是一個極其準確且具有高度普遍性的論斷。

在新聞學與言論自由的研究領域，有一條不成文的法則：一個政權對資訊的審查程度，通常與其正在掩蓋的錯誤和黑幕的程度成正比。

一個開放、透明的社會，那裡資訊自由流通，媒體能發揮監督與批判的作用，通常也是腐敗程度較低、政府問責性更高、人民更受尊重的社會。

相反地，在那些資訊被嚴格控制，國家壟斷真相，異議聲音被撲滅的地方，那裡往往是濫權、腐敗、不公與系統性罪惡的溫床。

中國的「金盾工程」正是為了掩蓋邪惡而進行資訊控制的極端體現。其目的不僅是阻止人民接觸真相，更是為了維持一個由共產黨撰寫的「官方敘事」，一個粉飾現實、抹黑任何敢於挑戰它的人的敘-事。

蘇菲亞小姐的這句話，可以被視為一個簡單卻有效的「試金石」，用以評斷任何一個政權的本質。如果他們害怕資訊，如果他們試圖封鎖人民的嘴，那麼，在那道審查的帷幕之後，必定有極其不妥、極其邪惡的事情正在發生。

這是一個強而有力的提醒，提醒我們資訊自由的重要性，以及那些無論身在何處，都敢於去尋找並說出真相的人們所扮演的角色。

蘇菲亞·貝爾：

而在這樣一個資訊受到審查的地方，確實很容易讓許多生命，在不為人知的情況下，被推入悲慘的境地……

談到這裡，我又想到一個主題：如何建立一個更美好的國家，一個人民至少能擁有言論自由的地方？

兩位都是關心哲學、領導人思想、體制政策建構的人……
所以我想，關於這個主題的問題，兩位會很感興趣，並且
能有深入的見解……

但今天上午的時間也所剩不多了，或許我們將這個主題留
到明天早上？兩位的意見如何？

劉思遠先生：

（劉先生聽蘇菲亞提出新主題，眼神亮了一下，流露出感興趣的神情。不過，他也看了一眼手錶，並點頭同意蘇菲亞的提議）

蘇菲亞小姐，您剛才提出的主題——「如何建立一個更美好的國家，一個人民至少能擁有言論自由的地方」——確實是一個非常宏大的問題，一個不僅是我個人，或許也是任何期盼一個公平、文明、進步社會的人的共同苦惱。

那是我在從事研究工作乃至踏入政壇的那些歲月裡，曾試圖為其尋找答案的問題，儘管當時我的想法可能還有許多局限，並受到偏見的左右。而如今，憑藉著所經歷的一切，憑藉著從修煉道路上得到的新認知，我對此有了更為深刻的思索。

諸如奠基的哲學、領導人的思想、體制政策的建構方式……所有這些，都在塑造一個國家的過程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

我對這個主題非常有興趣，也樂意分享我的想法。不過，您說得非常對，今天上午的時間確實不多了。這是一個重大的主題，需要足夠的時間，我們才能透徹地深入探討其各個層面。

因此，我完全同意您的提議。我們將明天上午的時間，集中用來討論這個問題。我相信有朱利安先生的參與，我們的交流將會非常豐富且有益。我也能有更多時間，為明天的討論，沉澱並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緒。

朱利安·李：

（我，以朱利安的口吻，眼神流露出興趣，並藉此機會介紹自己的書）

我完全贊同蘇菲亞小姐與劉先生的看法。關於建立一個更美好的國家，特別是保障言論自由，是任何文明社會最巨大的挑戰之一，也是其最崇高的目標之一。

這也是我投入了大量時間研究的領域。蘇菲亞小姐，劉先生，我對我們明天將要討論的主題，確實非常感興趣。在

過去幾年中，我的工作也有相當一部分，是專注於了解領導者們在卸下權力後的思維與政治遺產。我曾有機會會見並訪談了多位前高級官員以及一些前國家元首。

近期，有一場訪談我投入了極大的心血與時間，那是與一位前總統的對話。那是一場持續多日的對談，深入探討了他任內最重要的決策、他的苦惱、他所學到的教訓，以及最重要的，他希望自己的遺產如何能被後人記住。

我正在完成一本書，書名是《AFTER POWER: THE LEGACY - A Conversation with a former President》（權力之後：留下的遺產——與一位前總統的對話）。書稿也已得到一些試讀者的初步正面回饋。

（朱利安·李從公事包中取出一份裝訂整齊的手稿。）

劉先生，藉此機會，既然我們明天將要討論這些主題，如果您不介意，我冒昧地贈送您一份手稿，您今晚或可翻閱。我相信以您的經歷與淵博，在讀過另一位領導人卸任後的反思，並接著分享您自己從獨特視角對「權力」與「遺產」的見解後，將為我們的討論帶來無比珍貴的價值。

劉思遠先生：

（劉先生略感訝異，卻也顯得十分珍視地接過手稿）

噢，感謝您，朱利安先生。這確實是一份很有意義且非常及時的禮物。「權力之後：留下的遺產」……書名發人深省。我今晚一定會仔細拜讀。我也非常期待我們明天的交流，肯定會有更多值得深思的地方。

蘇菲亞·貝爾：

太好了！那麼，明天早上再與兩位見面。肯定又會是一場充滿價值的分享。

第三天

蘇菲亞·貝爾：

劉先生，早安！祝您有美好的一天！今天我和朱利安又一起來，繼續聆聽您的分享。前兩次的對談，確實帶給我們許多深刻的省思。

朱利安·李：

劉先生，早安。感謝您繼續為我們撥冗。先生，如蘇菲亞所說，您的故事與分析，開啟了許多非常有價值的視角。

我也非常感激您答應翻閱我送上的《權力之後：留下的遺產》那本書稿。

劉思遠先生：

(他輕輕一笑，點了點頭)

蘇菲亞小姐、朱利安先生，早安。感謝兩位的到來。是的，我昨晚花了些時間快速看過了朱利安先生的書稿。儘管只是瀏覽了一遍，但其所帶來的感受，確實留下了相當深刻的印象。我頗感意外，卻也十分敬佩，一位前總統，一位曾身處權力之巔的人，竟能對體制的本質、權力的局限，特別是對回歸核心道德價值，有著如此坦率的反思與自省。書中有許多觀點，都讓我深思並感同身受，特別是當他強調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必須「以德為本」的重要性時。那讓我想起了許多我過去無意間忽略了的東方古人的教誨…

蘇菲-亞·貝爾：

您提到這一點，實在很有意思，劉先生。在前兩次的對談中，我們深入探討了您的個人經歷、迫害法輪功的本質以及中國共產黨的罪惡。今天，我們或許可以一同回顧東西

方古人關於治國之道、關於一個更美好社會的那些價值與哲理……

劉先生，在經歷了這一切之後，特別是在您走入法輪功修煉這一年多以來，當您用今日的眼光，去對照當今中國的現狀時，您對古人的教誨，例如「上不正，下則亂」這句話，是否有了什麼新的見解？

劉思遠先生：

（點點頭，眼神中流露出一絲深刻的思索）

蘇菲亞小姐，您的問題觸及了一個我思索了很久，尤其是在這一年裡，反覆苦思的問題。以前，當我還是研究員、是官員時，我也曾讀過像「上不正，下則亂」這樣的古訓。但坦白說，當時我只將其視為歷史的總結、經驗的教訓……卻未曾真正體悟到其背後所隱含的宇宙規律。我過於注重經濟模式、政治體制，而忘記了一個國家的根本、一個社會的興衰，正在於其執政者的道德，乃至更廣泛的，整個民族的道德。

直到我親眼目睹了中國共產黨在迫害法輪功時所展現的、極致的殘暴與謊言，以及後來，有幸接觸到大法，讀了《轉法輪》之後，我的世界觀才徹底改變。我彷彿從一場

長夢中豁然驚醒。「上不正，下則亂」再也不是一句空話，而是以一種痛苦而清晰的方式，體現在當今中國社會的每一個角落。當「上」——那些掌握最高權力的人——已完全背離了人類的普世價值、踐踏了良知，那又怎能要求「下」——也就是整個社會——能夠不「亂」呢？那是一種必然，一種無法避免的因果。

朱利安·李：

(嚴肅地聆聽，然後接話)

我完全同意劉先生初步的見解。從政治與各國歷史研究的角度，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條規律：任何體制，無論設計得看似多麼優越，一旦失去了其運作者的道德基礎，遲早都會走向衰亡，或淪為壓迫的工具。「上不正，下則亂」不僅適用於東方文化，在西方歷史中也有類似的表現。當執政精英喪失了廉正，追逐個人與派系利益時，公眾的信任便會流失，社會分化加劇，動盪也就在所難免。將這些古老的哲理，對照當今的時局，特別是中國正在發生的一切，對於我們理解問題的根源，是極其必要的。

蘇菲亞·貝爾：

感謝劉先生與朱利安先生非常深刻的概括性分享。劉先生，您能否從您的所見所聞與親身經歷，更具體地分析，在中國，「上」的「不正」具體體現在哪些方面，而它又如何導致了社會的「亂」，特別是在迫害法-輪功的背景下？

劉思遠先生：

(輕輕點頭，聲音變得更為低沉，蘊含著憂思)

蘇菲亞小姐，在中國，「上」的「不正」，也就是共產黨的「不正」，不僅僅是單一的錯誤行為，而是一種源自其本質、源自其核心意識形態的腐爛。

第一，是對神佛與傳統道德價值的徹底否定。自從竊取政權以來，中共便系統性地摧毀傳統文化，代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一種建立在階級鬥爭、暴力與無神論之上的學說。他們向人民，特別是年輕一代的頭腦中灌輸，沒有神佛，沒有因果報應，人是自然的主宰，可以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當道德的根本、對天地神佛的敬畏之心不復存在時，邪惡又豈會有任何底線？

第二，是系統性的欺騙與謊言，已成為其政權的本質。從最初關於一個公平、自由社會的承諾，到被粉飾的經濟增長數字，再到掩蓋滔天罪行……一切都是謊言。他們用宣

傳築起了一道巨大的「紅色帷幕」，以矇蔽人民與世界。當最高層、整個體制都靠謊言維生時，又怎能要求「下」必須誠實？

第三，是對暴力與絕對權力的崇拜。「槍桿子裡出政權」——這句話已成了金科玉律。任何人、任何群體，若思想不同，若有可能動搖黨的獨尊權力，便被視為敵人，必須予以消滅。他們不用德來服人，而是用公安、軍隊、監獄、勞教所來進行鎮壓。

正是從這種根源性的「不正」，導致了社會全面的「亂」。

腐敗成了國家的災難，從政治局裡最大的老虎，到村級的蒼蠅，無一不在設法搜刮民脂民膏。因為當道德不存，不信因果時，貪婪便沒有止境。

社會道德嚴重敗壞。人們為牟利而互相欺騙，毒食品、假貨氾濫。冷漠、自私滲透到每個家庭、每段關係中。因為當「上」已樹立了壞榜樣，已踐踏了所有道德價值時，「下」又怎能保持善良？

而那「亂」的頂點，沒有什麼比對法輪功的迫害更清晰的了。

法輪功教人按照「真、善、忍」生活，引導人回歸最美好的道德價值。這樣一個祥和的法門，僅因修煉人數眾多，超過了黨員數量，便讓中共的當權者，特別是江澤民，感到了權力受到威脅。非理性的妒嫉與恐懼，演變成了一場現代史上最殘酷的鎮壓運動。他們造謠、誣陷，動用整個媒體機器來抹黑法輪功，將善良的修煉者塑造成「國家的敵人」。數百萬人被捕、被酷刑折磨、被送入勞教所、被活體摘取器官……這已不僅僅是「亂」，這是反人類罪，是一個已完全喪失人性的政權其邪惡本質最清晰的體現。

朱利安·李：

（專注地聆聽，然後補充道）

劉先生關於中共之「不正」及其所導致的「亂」的後果的分析，極其中肯。我只想補充一個層面，那便是，這種「不正」還體現在中共蓄意地將中國人民與他們自身偉大的文化根源切斷。一個與其傳統、與其數千年來所錘鍊的道德價值不再相連的民族，會變得極易被操控，極易被外來的、極端的意識形態所引導。當人們不再敬畏天地，不再理解因果時，他們去做惡，或縱容邪惡，便會變得容易得多。文化大革命正是徹底摧毀傳統文化根基的典型例子，而其後果至今依然深遠，為像對法輪功這樣的迫害的發生，創造了條件。

劉思遠先生：

朱利安先生說得非常對。他們懼怕傳統文化，因為「真、善、忍」的價值，因為古人所推崇的「仁、義、禮、智、信」的道理，與他們謊言、暴力的本質完全對立。一個深受傳統文化薰陶的人，很難去接受一個如此無神、非道德的黨派的統治。

蘇菲亞·貝爾：

是的，我理解的是，治國之道需要以「德」為本……不僅僅是古代的封建模式，對當今的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模式亦是如此。似乎任何一種模式或體制，如果其領導層與人民不以德為本，社會遲早也會陷入混亂而後衰敗……但如果有一個「好的模式」，那種敗壞的過程是否會進行得慢一些呢，劉先生，朱利安先生？以及，當我們談論「以德為本」時，像「皇道無為」或「帝道立德」這樣的道家思想，能為今日的我們帶來什麼啟示？

劉思遠先生：

蘇菲亞小姐提出了一個非常深刻的問題。沒錯，「模式」或「體制」自有其作用。一個設計良好、有權力制衡機制、

有透明度的體制，或許能在社會整體道德下滑時，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敗壞的進程，或至少讓那個過程進行得更緩慢、更少痛苦一些。然而，我依然認為，那只是枝節。如果「德」這個根本已經動搖，那麼再好的模式，最終也會被鑽空子，被無德之徒所利用。歷史已顯示，許多看似穩固的共和國、民主體制，當其精英與民眾喪失了根本的道德價值後，也同樣走向了衰亡。

至於您提到的道家思想，如「皇道無為」或「帝道立德」，這正是我在走入修煉後，感到無比深刻體悟的治國哲理。

「皇道無為」並非指什麼都不做，而是指為君者順應天道，順應自然規律，不以粗暴的方式干預，不將自己的主觀意志強加於民。讓人民自由生息、自由發展，政府只扮演溫和的協調、引導角色，如水之自然流動。

「帝道立-德」則強調，為首者必須以修養自身德行作為根本，用自己的德行來感化、為民眾做表率。當在上位者有德，民眾自會效仿，社會便會安寧，無需嚴刑峻法或繁瑣的條例。

試著對照中國共產黨來看，他們所做的完全相反。他們非但不「無為」，反而極端地「有為」，干預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從思想、信仰，到生計。他們不「立德」，而是

用暴力、用謊言宣傳來「立威」。結果是什麼？是一個充滿矛盾、緊張，人民生活在恐懼、失去信任的社會。對法輪功的迫害，正是那種「有為」與「無德」的典型例子。一個教人修心向善、按照「真、善、忍」生活的法門，卻被他們視為威脅並想方設法消滅。他們已然違背了大道，違背了天意民心。

朱利安·李：

我非常認同劉先生的分析。道家的「無為」概念，若從西方政治哲學的角度來看，與「有限政府」（Limited Government）或古典自由主義（Classical Liberalism）的思想有著有趣的相似之處，也就是將國家的角色限制在保護基本自由與維持秩序上，其餘的則讓社會自行運作。然而，其核心的差異，也正是道家的深刻之處，如劉先生所指出的，在於它將基礎建立在「道」與「德」之上。一個「無為」的政府，不僅僅是不干預，而是因為領導者已達到一定的道德境界，理解了宇宙的規律，並相信當人有道德時，社會自我調節的能力。

至於「帝道立德」，它強調了一點許多現代民主體制有時會輕視的，那就是領導者個人的道德品質。我們或許有非常民主的選舉程序、複雜的監督機制，但如果被選上的人缺乏德行，他們依然能設法操控體制，以服務個人或派系

的利益。相反地，一位真正有德的領導者，即便在一個不完美的體制中，依然能為國家帶來穩定與繁榮。中國古代歷史上有許多明君，如堯、舜、文王、武王，他們治理天下並非依靠權謀或苛法，而正是憑藉自身的德行，使天下歸心。

劉思遠先生：

是的，朱利安先生。古代的那些聖君，他們何需喧囂的宣傳機器，何需龐大的公安力量來控制人民。他們只需依道而行，修養自身，為百姓做表率。那時，正如老子所言：「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那才是治國之道的最高境界。

蘇菲亞·貝爾：

如果需要以「德」為本，那麼最高領導人的德行越高，就越有利於國計民生，我這樣理解對嗎，劉先生，朱利安先生？

如果是這樣，那麼另一個問題就產生了：如何才能選出德才兼備之人？……

中國古代史上有堯舜時代的「禪讓」，而今日多數國家則採取選舉的形式……這些形式是否真能確保找出最賢能之人？而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哲理，對我們理解一位領導者應具備的品德，又有何啟示？

劉思遠先生：

(頻頻點頭，神情贊同)

蘇菲亞小姐理解得非常正確。領導人的德行越高，對國家、對百姓的福澤就越大。因為當在上位者有德，他便會愛民如子，會將國家利益置於個人利益之上，會任用賢能，並且不會做違背天道、公理之事。

關於如何選出德才兼備之人，這確實是自古至今，在任何體制下都是一個難題。「禪讓」在堯舜時代是一個理想的典範，繼位者是依據其已被驗證的德行與才能，而非血統或派系而被選中。那是大公無私、心懷萬民的頂峰。然而，那樣的模式要求當權者本人必須是一位聖人，沒有私心，且當時的社會也必須有極高的道德基礎。

如今，選舉是許多民主國家普遍的形式。理論上，它將選擇權交予人民，來選出自己的代表。但實際上，如我們所見，選舉也有許多問題。它容易被金錢、媒體、華而不實

的承諾，以及群眾一時的情緒所左右。有時，是那些善於演說、善於遊說的人勝選，而非那些真正有德、有才且心繫於民的人。在中國，就更談不上對最高領導人有真正的選舉。那完全是黨內部的權力鬥爭與安排。

至於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哲理，這正是關於領導者、君子之路與品德的一條極其重要的指南。它指出了一個非常合乎邏輯的次序：想為天下做大事，首先必須從修養自身的品德開始（「修身」）。當自身已有德、有智，才能管理好自己的家庭（「齊家」）。家庭和睦、有規有矩，才能治理好一個國家（「治國」）。而當國家已安定、繁榮，才能考慮為整個天下帶來和平與穩定（「平天下」）。

中國共產黨已完全違背了這個次序。他們的領導人，有幾人真正做到了「修身」？抑或只是為自己、為家庭、為派系謀私利？許多高官的家庭充滿醜聞，子女用人民的血汗錢在國外過著奢華的生活。一個不能「修身」、無法「齊家」的人，又怎能「治國」得好？他們迫害法輪功，一個教人按照「真、善、忍」來「修身」的法門，這正是最清晰的證明，表明他們懼怕有道德的人，懼怕那些可能動搖其建立在謊言與暴力之上的統治基礎的價值。

朱利安·李：

(接話)

蘇菲亞小姐提出的選拔德才兼備領導人的問題，以及劉先生對「禪讓」和「選舉」的分析，確實是一個千古難題。即便在西方的民主國家，那裡有多黨選舉制度，要找出並推舉出真正賢能的領導人，依然非常困難。如劉先生所說，金錢與媒體的影響力過大。有時，公眾會被精心塑造的形象、精細計算過的訊息所吸引，而忽略了候選人真實的人品與能力。

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哲理，雖源自東方，卻具有普世價值。它強調了領導能力不僅僅是管理技巧或專業知識，而必須源自於個人的品德。一位領導人，無法將其個人與其公眾角色分開。私生活中的不誠實、貪婪或其他道德問題，遲早會影響到他們掌權時的決策與行為。

而且我認為，「修身」中還有一個重要的點，就是自我認知、自我修正與傾聽的能力。一位領導人，無論多麼才華橫溢，若不懂得「修身」，不懂得反觀自己，就很容易變得獨斷專行、脫離現實。

劉思遠先生：

朱利安先生說得非常對。「修身」不僅是保持德行，更是一個不斷學習、修正自己的過程。古人云「人無完人」，誰都有缺點。重要的是，敢不敢承認並改正。中共的那些領導人，他們自詡為「智慧的頂峰」、「人民利益的代表」，所以他們從不肯承認錯誤，從不肯從這個意義上去「修身」。所有的錯誤都被歸咎於「敵對勢力」或客觀因素。那正是「不正」的另一種表現。

蘇菲亞·貝爾：

但對當今的現代人來說，那些外在的華麗、那些顯而易見的東西，往往更具說服力……而那些無形、抽象的古代思想，人們則難以領會……正因如此，中國在過去約四十年裡爆炸性的經濟發展，就像一顆璀璨的「鑽石」，吸引著國內民眾與國際友人的支持……

說到這裡，我又想起 2018 年在越南的一次出差經歷。當時我搭乘著一列從南到北的火車，火車不時穿過鄉村與山丘……那時，我看著窗外遠處青翠的山巒，不禁向身旁的一位乘客感嘆說：「你們越南人保護森林的意識真好」……兩位知道當時那位乘客是怎麼回答我的嗎？……

他回答說：「這位美麗的美國記者小姐，妳所看到的那些青翠景色，並非如妳所想的那麼美好！」……

我不太明白他的意思，便追問道：「您是什麼意思？！」

他解釋說：「妳知道嗎，遠處那些青翠的森林是桉樹林，是砍伐原始森林後種植工業作物的『成果』……桉樹是速生樹種，非常適合做為造紙業的原料。但妳知道嗎，人們沒意識到，桉樹對土地肥力的破壞是極其可怕的！它不僅無法為土壤保持濕度，還會用其葉子和根部的毒素殺死其他灌木……而只要種植這種樹大約十年，山丘就會被侵蝕、變得貧瘠，灌木和微生物都無法生存……遠看非常美好，但走近了，再看看地面，就會發現山丘的土地已如沙漠般荒蕪……」

這個景象讓我極為震驚……

後來，我便將越南桉樹林的景象，與中國的共產主義政權聯想在了一起……那些摩天大樓、現代化的城市、亮眼的經濟增長數字……在其背後，是否也正掩蓋著一種荒蕪，一種在道德、文化、人權上從內部而來的毀壞呢，劉先生，朱利安先生？而這，是否正是古人所警示的、一種僅憑外在實力而無穩固道德根基的統治方式——「霸道」的體現？

劉思遠先生：

(聽完蘇菲亞的故事後，他沉默了片刻，臉上流露出深切的思索與共鳴)

蘇菲亞小姐，您的故事與您的聯想，確實非常深刻，非常形象。「桉樹林」……它讓我感到不寒而慄。它不僅僅是一個比喻，它正是對所謂中國在共產黨統治下「奇蹟般崛起」的赤裸裸的真相描述。

正如您所說，那些摩天大樓、跨海大橋、飛速增長的GDP 數字……都是些華麗、顯而易見的東西，很容易說服那些只看表面，或那些刻意不願去看真相的人。但在那片「青翠」的背後是什麼？

是無法挽回的環境破壞，是污染到人民不敢呼吸的空氣，是枯竭且被毒化的水源。

是徹底的道德敗壞，當人們為了金錢而不惜一切，不顧良知，不顧同胞的健康與性命。

是對人權與信仰自由的踐踏，當數百萬無辜的民眾，法輪功學員、維吾爾人、藏人，被鎮壓，被剝奪最基本的人權。

是擁有數千年美好歷史的傳統文化的流失與沙漠化，被一個外來的、鬥爭的、無神的意識形態所取代。

而您將其與「霸道」相聯繫，是完全正確的。古人對「王道」與「霸道」有著非常清晰的區分。「王道」是用仁義、德行來使人心悅誠服，讓天下自然歸順。而「霸道」則是用武力、權謀、壓制來進行統治，讓人因恐懼而遵從，而非出於敬佩。

中國共產黨走的，正是典型的「霸道」之路。他們用經濟實力來收買、來影響其他國家。他們用龐大的宣傳機器來粉飾形象、掩蓋罪行。他們用軍隊、公安來鎮壓國內的反對聲音。他們或許能暫時取得一些表面的「成果」，能讓一些人為之歡呼，但那是一種虛假的繁榮，是桉樹林的「綠色」，沒有穩固的根基。因為它是建立在謊言、恐懼以及對人類核心價值的摧毀之上。一旦那份「霸道」不再足以壓制，或當人民已過於疲憊、過於痛苦時，其崩潰便是無法避免的。

朱利安·李：

蘇菲亞小姐「桉樹林」的比喻，確實非常有力。它揭示了一條普世規律：任何發展過快、只重外表而忽略內在根基的事物，通常都潛藏著毀滅性的危機。在經濟學上，人們

也談論不可持續的「過熱增長」。在政治上，一個僅憑強制力而無真正民意認同的政權，遲早會面臨危機。

劉先生剛才所分析的「霸道」，不僅僅局限於中共的對內統治方式。我們在其對外政策中，也能清晰地看到其表現。其「一帶一路」的野心，起初被宣傳為合作共贏，但在許多地方實際上已演變為「債務陷阱」，成了中國增強地緣政治影響力，甚至干預他國主權的工具。那正是用經濟實力來強加其意志，一種國際關係中的「霸道」形式。這與古代真正有遠見與德行的領導人所追求的、建立在互相尊重與共同利益基礎上的「王道」，是完全背道而馳的。

劉思遠先生：

朱利安先生說得對。那份「霸道」也擴散到了外部。他們希望全世界都認可他們，承認他們的「中國模式」。但他們忘了，真正的尊敬並非來自物質實力或強加，而必須來自於道德，來自於那個國家為人類所貢獻的人文價值。至今為止，中共為世界「貢獻」的，似乎只有不穩定、不健康的競爭，以及一種有毒意識形態的擴散。

蘇菲亞·貝爾：

中國現代化的「成果」，最突出的莫過於其遍佈全國的高速鐵路系統，這是在極短的大約十五年內建成的！作為一個從太平洋彼岸來的客觀觀察者，我確實印象深刻！……

這項成就非常容易贏得民心……我記得幾週前，到哈佛大學做一個短篇報導時，我遇到一位在那裡就讀的中國女學生，我和她聊了一會兒，聽她談起中國，談起她在家鄉的家庭生活。她的爺爺是一位資深的革命老黨員，而她父親則是一位成功的商人。有一次晚餐時，她爺爺和父親因政治觀點而起了衝突……我還記得她說，她爺爺當時罵了她父親一句：「沒有黨，你現在哪來的樓房汽車可以享受？！你不知道感恩黨，還說那些反動資本家的屁話？！」

這位女學生的故事，讓我對中國社會的複雜性思考了許多。一方面是無法否認的物質成就，但另一方面卻是代價、是思想的強加，以及或許，是缺少了一條溫和的道路，一種儒家曾推崇的「中庸之道」，是嗎，劉先生，朱利-安先生？是否正是「中庸」的缺失，導致了在思維與行動上，無論是政府還是一部分民眾，都出現了那樣的衝突與極端？

劉思遠先生：

(專注地聽完蘇菲亞的故事，然後輕輕點頭，一絲憂傷掠過)

蘇菲亞小姐講的這個故事，在當今的中國，特別是在有多代人同住的家庭中，非常典型。老一輩人，經歷過革命年代，被深度「洗腦」並深受黨的思想影響，與更年輕一代，那些有機會接觸外部世界、有著不同認知的人，他們之間的衝突，並不罕見。

故事中那位爺爺的責罵：「沒有黨，你現在哪來的樓房汽車可以享受？！」——這正是共產黨非常成功地灌輸給人民的一套論述。他們刻意將經濟發展、物質成就，與黨的存在及其「偉大」作用劃上等號。他們要人民相信，他們所擁有的一切美好，都是黨所賜予的，因此必須「感恩黨」，必須對黨絕對忠誠。

但他們刻意忽略了一個事實：那樣的經濟發展，是建立在數百萬勞動人民的血汗，甚至是生命之上的，是建立在遲來的對外開放、吸收世界科技之上的，更是以環境、道德與人權作為代價換來的。「樓房汽車」或許是真的，但為此付出的代價是什麼？難道是思想的自由、人的尊嚴，以及一個公平、有人性的社會嗎？

而您將此與儒家「中庸之道」的缺失相聯繫，說得非常正確。「中庸」並非指沒有立場的鄉愿，而是指保持和諧、均衡，不走極端，不偏不倚。那是一條溫和、理性與德行之路。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走的始終是極端的路線。要麼是「文化大革命」時的極左，打倒一切，殘酷鬥爭。要麼是在發展經濟時不惜一切代價的極右，罔顧道德與環境。他們沒有「中庸」。他們只有「鬥爭」、「消滅」、「強加」。

那種「中庸」的缺失，在他們對待異見者、對待有信仰的人的方式上，表現得淋漓盡致。他們不懂得對話，不懂得尋求和諧，只知道用暴力來鎮壓，就像他們對法-輪-功所做的那樣。他們不接受任何在其控制與意識形態之外事物的存在。正是這種思維與行動上的極端、缺乏「中庸」，為中國社會製造了無數的悲劇與不穩定。

朱利安·李：

蘇菲亞小姐的故事以及劉先生對「中庸之道」的分析，非常發人深省。思維的極端化，如劉先生所說，是許多獨裁政權的顯著特徵，不僅僅是中國。當一種意識形態被奉為

唯一正確時，所有反對的意見都會被視為「反動」、「敵對」，那裡便再無溫和、尋求共同點的空間。

儒家的「中庸之道」，若能被正確理解，是一種關於自我克制與內心平衡的深刻哲理，並由此帶來社會關係的和諧與國家的安定。它要求人必須先「誠意、正心、修身」，才能考慮做更大的事。當一個人心中無法守「中」，容易被貪、嗔、痴，被眼前的利益所動搖時，他的行為就容易走向極端。

在蘇菲亞小姐故事中的爺爺與父親的場景裡，我們清楚地看到了一種缺乏建立在尊重與理性之上的對話空間。爺爺被禁錮在被灌輸的口號與偏見中。父親，儘管可能有不同的認知，也難以溫和地表達。這種兩極分化，是許多社會的一道巨大傷口，而其根源，往往來自於從個人到國家治理層面上，都缺乏對「中庸」的修養。一個沒有「中庸」的社會，會輕易被煽動，輕易被分裂，並走向自我傷害的極端行為。

劉思遠先生：

是的。「中庸」還意味著知「時」、知「位」，知道在不同情況下何為適宜，不刻板，不教條。中共則總是將單一

的模式、唯一的意志，強加於整個社會，不顧現實，不顧民願。那是對「中庸」精神的徹底破壞。

蘇菲亞·貝爾：

我想請問朱利安先生這個問題：透過您與許多西方國家前總統或前高級官員的接觸與訪談，您認為他們的觀點中有哪些值得注意之處？是否與我們剛才討論的中國古代思想，例如領導人道德的重要性，或國家治理需走溫和、均衡之路的必要性，有任何的共同之處？

朱利安·李：

(微笑點頭)

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蘇菲亞。的確，透過與許多西方領導人、政策制定者的交談，特別是那些已卸任並有時間反思過往的人，我發現了一些非常值得深思的共通點，而且有時，會與東方的古老智慧，有著出人意料的相似之處，儘管是用不同的語言和參照體系來表達。

第一，許多前領導人在遠離權力壓力後，常強調的一點是，對現代政治中過度實用主義與道德侵蝕的失望。他們意識

到，決策往往受到短期利益、遊說團體、連任壓力的左右，而非基於普世的道德原則或國家的長遠利益。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劉先生與東方哲人所說的、那種「德本」的缺失。當領導人不再以道德為重時，無論體制看似多麼民主，它依然可能被操縱。

第二，是對社會日益兩極分化，以及難以尋求共識、達成一致的苦惱。許多人承認，媒體、社群網絡，乃至政治手段，都加劇了分裂，而非促進對話與相互理解。這讓我想起我們剛才談到的「中庸之道」的重要性。一個缺乏溫和、缺乏對不同觀點尊重的社會，將很難維持穩定與可持續的發展。

第三，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點，是對那些「沉默的大眾」、那些在自己社群中守護著核心道德價值的普通個體，其所扮演角色的日益重視。就像劉先生讀過的那本《權力之後：留下的遺產》中的那位前總統一樣，他也強調，一個國家的未來不僅掌握在政治家或精英手中，更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普通百姓的道德力量。這與儒家認為社會道德奠基於家庭與社群的觀點，有著一定的共通之處。

最後，儘管並非全部，但一些前領導人也開始回歸到更深層次的、關於生命意義、關於他們真正留下了什麼遺產的哲學與心靈問題上。他們意識到，權力、名望終將逝去，

所能留下的，正是人文價值，是對一個更美好世界的貢獻。這或許是一種遲來的「修身」，但依然非常可貴。

當然，西方文化有其自身的思想傳統，從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亞里斯多德關於正義、德性（virtue）的概念，到啟蒙思想家關於自然權利、社會契約與共和國的理念。在這些思想中，理性、法律與體制的作用常被強調。然而，若再深入探究，我們依然能看到與東方思想相連的脈絡，那就是對一個公平社會的渴望，在那裡，人能有尊嚴地生活，而領導者必須對民眾負有道德責任。差異或許在於方法與側重點，但我相信，朝向一個基於普世價值的美好社會這個目標，是有著交集的。

劉思遠先生：

（聽著朱利安的話，點頭表示贊同）

朱利安先生的分享非常有趣。這表明，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無論在何種政治體制下，關於道德、關於領導者的角色、關於一個更美好社會的苦惱，似乎是人類永恆的課題。或許，當人走到了理論與模式的盡頭時，他們又會回歸到最核心的價值上，那些大法中常提及的、人與生俱來的善良本性。

蘇菲亞·貝爾：

我們已討論了一些中國古代的治國觀點，以及朱利安先生從西方視角的一些分享……那麼從宗教的角度呢……劉先生是法輪功修煉者，而朱利安先生，據我所知，也曾醉心閱讀許多不同宗教的經典……兩位能否就善惡的觀念、治國的道德，或主要宗教在談及理想社會與領導者角色時，常會提到的那些普世原則，再多分享一些？

劉思遠先生：

（眼神變得更為沉靜，語氣緩慢）

蘇菲亞小姐，從一個修煉人的角度來看，特別是在得到大法的啟示後，我體悟到，世界上所有大的正教，儘管有著不同的表現形式與具體的教義，但歸根究底，都是教人向善，相信神佛，相信因果報應，並推崇普世的道德價值。

關於善惡的觀念，各正教都劃分得非常清晰。善，是順應天理，是慈悲，是寬容，是真誠，是忍耐。惡，是違背天理，是自私，是殘暴，是謊言，是爭鬥。一個社會要想太平、昌盛，就必須以善為本，祛除邪惡。領導者，更應是實踐善行的表率，用自身的德行來引導民眾。如果領導者

心中充滿邪念，行為舉止皆為惡，那麼那個國家必定生靈塗炭，人民必定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中國共產黨對法輪功的迫害，正是惡的極致體現，當一個政權用暴力去消滅一群遵循「真、善、忍」的修煉人時。

各大宗教也都談及因果報應的法則。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個人作惡將遭報應，一個政權犯下罪行也無法逃脫天理的懲罰。這或許不會立即兌現，但卻是絕無差錯的宇宙規律。當我還在體制內時，我曾不信此理。但如今，我對此深信不疑。中共所犯下的罪惡，特別是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罪行，遲早會被徹底揭露，而那些主謀必將償還其罪。

關於治國之道，各正教通常不會像政治學說那樣提出具體的模式，但都強調領導者必須心懷對神明的敬畏，必須愛護民眾，以仁德而非暴力來治理。他們必須是正信的守護者，為人民修養道德創造條件。歷史已證明，任何朝代、任何國家，若其領導者敬奉神佛，重用賢能，關心民眾的道德生活，那個國家通常會國泰民安，長治久安。相反地，那些暴君，那些鎮壓信仰的政權，遲早會被歷史所淘汰。

朱利安·李：

（點頭，接過劉先生的話）

劉先生分享的非常深刻，也確實反映了許多主要宗教的核心精神。從一個曾涉獵多種經典的人的角度，從猶太教與基督教的《聖經》，到伊斯蘭教的《古蘭經》，再到印度教的《奧義書》、《薄伽梵歌》，我確實看到了一個非常清晰的共同點：那就是存在著一個神聖的秩序、一位至高者，而人有責任順應那位至高者的意願而活，也就是依循道德與公義而活。

在《聖經》中，以色列的君王被提醒必須敬畏上帝，遵守祂的律法，並公義地治理人民。當他們如此行時，國家便昌盛。當他們墮落、敬拜邪神、壓迫良善時，災禍便降臨。「神的公義」（Divine Justice）是一個重要的基石。

在伊斯蘭教中，領導人（哈里發）被視為先知的繼承者，以執行沙里亞法，其目標是保障社群的公正（Adl）與公共福祉（Maslaha）。敬畏之心（Taqwa）與廉正是重要的品質。

在印度教中，「達摩」（Dharma，意指正法、義務、宇宙秩序）扮演著中心角色。領導者（國王）有其「王之法」（Rajadharma）——即為君者的義務——必須保護達摩，維持社會秩序，並確保其子民的繁榮。若違背達摩，即是「非達摩」（Adharma），便會導致混亂。

儘管表達方式各異，但都指向同一個方向：一個美好的社會必須建立在道德的基礎上，領導者必須是品德的典範，並且必須對那些神聖、超然的價值心存敬畏。當人，特別是掌權者，失去了與這份心靈根源的連結，只追逐世俗的權力與物質時，那便是邪惡有機會抬頭、社會走向衰敗之時。

劉思遠先生：

朱利安先生總結得很好。無論東方西方，無論何種宗教，其根本都是教人向善，敬神信報應。那是維繫人類道德的紐帶。當那根紐帶被剪斷，就像中共所做的那樣，人便會失去依靠，社會便會陷入混亂。

蘇菲亞·貝爾：

是的，關於「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關於「報應」，我也曾讀過一些概念，如佛教中的「業力輪報」，或是中國古人所說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辰未到」……如果這些都是真的，而且人，從最高領導到普通百姓，都懂得敬畏天地、敬畏神佛、並害怕「報應」，那是否整個社會的整體道德都會提升？而「德」，是否正是

興盛與衰亡的根本基礎？德多則國泰民安，德薄而業大則國家衰敗，社會混亂，民不聊生……

談到「本」與「末」的問題……當今許多政府，特別是中國政權，只知道以「法治」為本，但實際上，沒有道德基礎的「法治」，是否僅是末節，甚至成了當權者用以掩蓋其「無德」的工具呢，劉先生，朱利安先生？

劉思遠先生：

（他用力地點頭，臉上流露出深切的認同）

蘇菲亞小姐，您剛才所說的，確實已觸及了問題的根本。完全正確！

如果人，從君王到百姓，人人都透徹理解並相信因果法則，知道自己的一言一行，無論善惡，無論明暗，都將有相應的結果，那麼社會道德必定會得到維護與提升。當人心中有對天地神佛的敬畏，害怕業力的報應時，便不敢為非作歹，不敢貪婪，不敢欺騙。那時，無需嚴刑峻法，社會自然會走向安定、和諧。

「德」，正是國家的根本，是興盛或衰亡的基礎。中華數千年的歷史乃至世界歷史，都已證明了這一點。那些君明臣賢、上下一心修養道德的朝代，國家便太平，人民便安

樂。相反地，當道德淪喪，君王荒淫無道，官吏貪腐時，無論國家曾多麼強大，也將迅速走向衰亡、動亂，人民陷入水深火熱。「德多則國泰民安，德薄而業大則國家衰敗」——這是一個不可否認的真理。

至於您所說的「法治」，我完全同意。法律對於維持社會秩序、震懾惡人是必要的。但它只能是「末」，是輔助「德治」的工具。如果一個政權只依靠法律、依靠懲罰，而忽略道德教化，不為民眾建立信仰的基石，那就是一種失敗。

尤其像當今的中國，共產黨總在高喊「社會主義法治」，但實際上，他們的法律只是維護黨的權力、鎮壓異見者的工具，是將其自身錯誤行為合法化的手段。他們用「法治」來掩蓋整個體系的「無德」。當執法者沒有道德，當法律本身是由無德之徒所制定時，那樣的「法治」比沒有法律還更危險，因為它披著「正義」的虛假外衣來欺騙人民與世界。對法輪功的迫害就是一個眼前的例子：他們制定模糊的法律，強加荒謬的罪名，來逮捕、判刑那些祥和的修煉人。那不是「法治」，那是對法律、對人類公義的踐踏。

一個社會要想真正地穩定與可持續發展，必須以「德治」為本，「禮治」（以禮儀、文化來教化）為幹，而「法治」只應是枝葉，是當道德已不足以構成約束時的最後手段。

朱利安·李：

（點頭贊同）

劉先生關於「德治」與「法治」關係的分析，極其深刻。在西方政治思想中，也有類似的辯論，例如，認為法律必須基於普世道德原則的自然法學派（Natural Law），與只重視法律制定程序之合法性的法律實證主義學派（Legal Positivism）之間的爭論。

然而，越來越多的思想家意識到，一個法律體系，無論設計得多麼嚴密，如果缺乏社會的道德基礎以及執法者的道德，它本身也無法保障公正與穩定。法律可以懲罰錯誤的行為，但它無法播下善良的種子。法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阻止罪惡，但它無法創造一個人人自願為善的社會。

正如蘇菲亞小姐與劉先生所說，如果人對超然的價值、對因果報應有信仰，那麼「內心的法律」將比紙上的法律更有力。那時，「法治」將變得更為輕鬆，只扮演調節個別案例的工具角色，而非主要的統治手段。

中共強調「法治」，卻又鎮壓信仰、摧毀傳統道德，實際上他們是在自我矛盾，在自掘墳墓。因為一個沒有「德」

作為根基的「法治」，終將只是一座沙上城堡，遲早會在歷史的風浪與良知的審判前崩塌。

劉思遠先生：

是的，沒有德，就沒有什麼是能長久的。這是在經歷了這麼多起落之後，才深刻體悟到的。

蘇菲亞·貝爾：

我突然想起這麼一句話，我也不太記得是在哪裡讀到的，大意是說：「德不配位，必有災殃；智小謀大，禍必及身」……（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或許這正是我們今天分享所談論的主導精神……中國共產黨本就德行淺薄，卻給中國人民帶來了禍亂，其頂點便是對善良的法輪功修煉者的迫害……或許到了某一天，如兩位所說的「報應」來臨時，它自己就必須為其所作所為償還罪業……

兩位同意嗎？

劉思-遠先生：

(他緩緩點頭，眼神堅定而帶幾分莊重)

蘇菲亞小姐，這句話，儘管您不記得出處，但它蘊含著一個巨大的真理，一個誰也無法逃脫的宇宙法則。「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這正是當今中共領導層，以及那些發動迫害法輪功之徒的精準寫照。

他們不信神佛，沒有道德根基，只有無邊的權力野心與對失去權力的恐懼。他們用狡詐的陰謀、殘毒的手段來維持統治，來鎮壓善良的人民。他們自詡「偉大、光榮、正確」，但實際上他們的智慧僅限於爭權奪利、欺騙與控制。

他們試圖肩負的——是整個民族的命運，是整個區域的穩定——但憑藉那淺薄的德行與渺小的智慧，他們又怎能扛得起？災禍是無法避免的，不僅是對他們自身，更是對他們所統治的國家。

對法-輪功的迫害，正是那「無德」與「無智」的頂點。鎮壓一群遵循「真、善、忍」、為社會帶來美好道德價值的人，不僅是一樁罪行，更是一種自我毀滅其國家道德根基的行為。

也正如您所說，因果報應的法則是不會錯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他們所種下的，必將由他們自己收穫。那

「報應」來臨之日，或許不是明天、後天，但它一定會到來。歷史已證明，沒有任何一個暴政能夠永存，特別是一個對自己的人民、對人類的普世價值犯下了滔天罪行的暴政。我對此堅信不疑。

朱利安·李：

(沉思著)

蘇菲亞小姐引述的那句話，儘管在不同文化中有不同的表述，但其核心意義是普世的。那是對人不應超越自身界限，特別是在掌握重任時，不應超越道德與智慧界限的一種警示。

從政治史的角度，我們看到許多帝國、許多強大的領導人，其覆滅並非因為外敵，而正是源於其自身的驕傲、對自然與社會規律的無知，以及最重要的，來自內部的道德侵蝕所引發的錯誤。

中國共-產-黨或許取得了一些物質成就，或許建立了一套精密的控制機器。但如果其領導者的「德」與其所掌握的權力不相稱，如果他們的「謀」違背了人的利益與尊嚴，那麼遲早，那些成就將變得毫無意義，而那部機器也將在其自身所犯下的罪惡與錯誤的重壓下崩潰。

對法-輪功的迫害不僅僅是一個人權問題，它更是一個政權道德深度危機的標誌。也正如劉先生與蘇菲亞小姐所說，這樣的行為，不可能沒有後果。「報應」可以從多方面來理解，從歷史的審判，到（或許遲來的）法律制裁，再到我們或許尚未完全洞悉的因果法則。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沒有任何邪惡能夠永存而不付出代價。

蘇菲亞·貝爾：

好的，感謝兩位……我們已一同分享了關於善惡的視角、一些以德為本的古代治國觀點，以及關於因果與報應的看法……這次的分享也已接近中午，我想我們第三次的訪談，應該可以在此告一段落了……

加上前兩次的分享內容，我們聽了劉先生分享他的故事、關於中國共產黨透過迫害法-輪-功所展現的邪惡本質，關於活摘器官的罪行……兩位所分享的訊息，都是我們這個時代令人痛心的問題，需要我們每一個人，包括 THE EPOCH MEDIA 的讀者，都去直面真相，並依循正義與良知選擇行動……

劉先生，如果需要您用一兩句簡短卻真誠的話，作為今天暫別的贈言，您會怎麼說？

劉思遠先生：

(他帶著感激的眼神看著蘇菲亞與朱利安，然後望向遠方，語氣沉靜卻蘊含著一股強大的信念)

蘇菲亞小姐，朱利安先生，並透過兩位，請容我向 THE EPOCH MEDIA 的廣大讀者說幾句話。

如果在經歷了這一切之後，我有什麼想傳達的訊息，那就是：

請堅守對真相與良知的信念，無論黑暗如何籠罩。因為「真、善、忍」的光芒是永恆不滅的，而正義最終必將戰勝邪惡。

每一份被傳播的真相，每一個為正義而發出的聲音，都是讓這個世界變得更美好的一份無價的貢獻。感謝各位。

蘇菲亞·貝爾：

衷心感謝劉先生在過去三次的訪談中，給予了我們無比深刻與勇敢的分享。也感謝朱利安先生的同行，並貢獻了許多寶貴的分析。我們會努力將這些訊息完整地傳達給讀者。

朱利安·李：

感謝劉先生的信任與分享。您的故事與見解，確實是我們所有人的啟發的泉源，也是強而有力的提醒。

劉思遠先生：

我也要感謝蘇菲亞小姐與朱利安先生耐心地傾聽，並創造了條件讓我能說出這些話。

* * *

結語

三天的對話已落下帷幕。沒有宣言，沒有響亮的鼓聲——有的，只是一位曾經身處歷史風暴中心的人，如今，靜靜地訴說著他所知的，他所信的，以及那些他再也無法保持沉默的事。

我們不期望每位讀者都以相同的方式，去理解所有的一切。但倘若有什麼能最終留下，那或許是心中一個刺痛的問題：在那些被允許言說的外殼之下，究竟還掩蓋了多少事？

《紅色的帷幕》無意爭辯，也不做論斷。它只是一趟記憶與良知的旅程，以我們所能保留下來的最真誠的口吻，娓娓道來。

而倘若這些敘述，能讓某處的某個人，停下腳步，陷入沉思——那麼，本書或許已完成了它的使命。

蘇菲亞·貝爾 (Sophia Bell)

THE EPOCH MEDIA

* * *

關於作者與 THE EPOCH MEDIA 計畫

關於作者

蘇菲亞·貝爾 (Sophia Bell) 是一位獨立作家，致力於探索政治、文化、社會、科學與靈性等主題。她的作品追求真理，喚醒良知，並為人類命運的深刻省思發聲。

她的作品多源自真實訪談，忠實記錄，富有情感深度，並帶有啟迪人心的精神。

關於計畫

本書是由 THE EPOCH MEDIA 出版系列作品的一部分。THE EPOCH MEDIA 是一項具備全球視野的獨立出版計畫，其使命為保存並傳播那些跨越時空的回響。我們不追逐每日的新聞潮流，而是致力於出版能夠深刻觸動人心的書籍。

聯絡方式

- ✧ 網站：www.theepochmedia.com
- ✧ 電子郵件：editor@theepochmedia.com
- ✧ 二維碼 (QR Code)：



同一計畫的其他作品

您可以閱讀 THE EPOCH MEDIA 的其他出版物：

- 紅塵，金光 (Red Dust, Golden Light)
- 後政壇：遺產 (After Power: The Legacy)
- 科學的黃昏與黎明 (Sunset and Sunrise of Science)
- 紅色的帷幕 (The Red Veil) → 即本書
- 時間之前的迴響 (Echoes Before Time)
- 入世間 (Entering The World)
- 最後的鐘聲 (The Last Bells)
- 我們之前 (Before Us)
- 千劫已過 (Thousand Lives)

誠摯感謝您撥冗閱讀本書！願神、願佛在您探索真理的旅程中賜福予您。